

MAKESIHEPULUDONG

# 马克思 和蒲鲁东

朱进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和蒲鲁东

朱进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和蒲鲁东/朱进东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ISBN 7-214-02685-6

I.马… II.朱… III.马克思主义-蒲鲁东主义-对比研究  
IV.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338 号

书 名 马克思和蒲鲁东  
编 著 者 朱进东 著  
责任编辑 杨建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江苏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2 万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685—6/B·46  
定 价 18.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

孙伯铤

进东的这本题为“马克思和蒲鲁东”的书就要出版了，他让我写个序言，我欣然同意了。进东选定这个题目撰写他的博士论文，我是很赞成的。虽说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早已成为往事，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却永远值得人们借鉴和回味。

蒲鲁东一生中最引起轰动的著作大概要算《什么是所有权》(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又译为《什么是财产》)这部书了。它之所以能起到那样“划时代”的作用，与其说是由于内容新颖，不如说是由于它在论述这个问题时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大家知道，在蒲鲁东之前，法国以及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把“所有权”当作批判研究的对象并且从理论上空想地加以“废除”了。所不同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大都是从人道的立场批判私有财产，而蒲鲁东一开始就是从法律公平的角度切入财产问题。仅就这一点来说，他的理论的起点也是低于他的空想主义的前辈们的。正像马克思指出的，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相比，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

正因为法学意识是蒲鲁东的初始意识，因而平等观念也就构成他的全部经济理论的基石。他不是把法的观念置于经济事实之上，而是把经济事实置于法的观念之上，这就决定了整个蒲鲁东主

义的实质不过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法学幻想之上的“法学唯心主义”。他一面从与商品经济相适合的法权关系中提取法的原则(平等观念),一面又想用这个原则来摧毁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的财产关系,这就使他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和二律背反之中。为了摆脱这种矛盾,他乞求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然而通向辩证法的道路,对于蒲鲁东来说,却成了他学术生涯中的真正陷阱。由于蒲鲁东并不真正懂得黑格尔,加之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们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使他无法理解科学辩证法的真正奥秘。而只能根据永恒的法权观念把它们区分为体现公平原则的好的方面和否定公平原则的坏的方面,通过相关范畴的相生相克,使好的方面保存下来,而坏的方面则被消除和克服。这样一来,他用来克服资产阶级经济矛盾的办法不过是在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法学家的观点之间来回跳跃。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相比,他最多不过是用法学家的空谈取代伦理的空谈。

蒲鲁东思想的典型特征,是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救命的跳跃。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sup>①</sup>这就好比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化学问题,却要按照人们想象出来的所谓“自然性”和“亲和力”这些永恒观念来改变物质变换的规律。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如何评价他所做的一切呢?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就表现在他始终一贯地停留在法学幻想的圈子里转来转去,表面上他似乎也从经济事实出发,但临到要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总是求助于永恒公平的法权幻想。对于蒲鲁东来说,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2页。

的客观经济规律是不存在的,永恒公平的法权观念才是主宰历史的惟一动力。只要一旦实现了永恒公平,“千年王国”就会降临。但是,像康德的“自由意志”一样,蒲鲁东的“永恒公平”也只能是人类理性“彼岸”的事情。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原则不是出发点。无论是人道原则,还是公平原则,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生地。科学社会主义惟一地、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自己的理论基础,从而反对任何道德说教与法学空谈。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任何法权形式都是以私有制的存在为前提的。人们只有以私有者的身份互相对待,他们之间的关系才可能以法权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所谓法权,最本质的是所有权,它在任何地方都是以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基础的。因此,如果一方面要实现永恒公平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保存所有制的好的一面,这就像化圆为方一样是永远做不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当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时,为了力求避免使用法学用语,把“占有”与“所有”这两个概念作了精确的区分。马克思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sup>①</sup> 1894年,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也坚持同样的观点,他说:“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5页。

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彻底打破了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的历史狭隘性。从资产阶级的法学观点看来,土地、资本等等社会财富,不为个人所有,就为社会所有,它们必然要从属于某个权利主体,不属于任何主体的物质财富是不能想象的。因而,离开了法学公式便不能表述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一旦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也就同时消灭了任何所有权。在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个人或社会都不会确立对物质财富的所有权,他(它)们仅仅是占有者,就像人们占有空气和阳光而不需要经过法律认可的所有权一样。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要和蒲鲁东及其门徒作不懈斗争的真实意图了。今天,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得不纳入到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旧轨道,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法权意识势必要成为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主导意识。“由于竞争——这个自由商品生产者的基本交往形式——是平等化的最大创造者,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决战口号。”<sup>②</sup> 但是,如果有人根据这种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而作出的战略调整,要求放弃或改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那就是大错而特错的了。

进东的这本书详尽、系统地搜集、整理、对比和分析了马克思和蒲鲁东彼此交往、分歧和论战的全部史实和思想资料,给予了客观公正的阐释和评价。我深信,它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的法学思想的深入领悟和探究。

1999年6月14日于南京大学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3~5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6页。

## 前 言

在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交往关系是一个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课题。蒲鲁东的理论逐渐演化成蒲鲁东主义。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的交锋贯穿于马克思整个理论研究过程之中。蒲鲁东主义是 19 世纪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它关注的是社会,在其理论表现形态上,既有哲学、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宗教、文化。从总体上看,蒲鲁东主义的集中指向是社会主义。蒲鲁东本人的历史形象主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就决定了,研究马克思与蒲鲁东的理论关系不能仅仅定位于哲学史,或经济史,或社会主义史的研究,而应基于思想史的视域展开研究。搞清楚这一点,对蒲鲁东在上述诸研究领域几乎成了回避的对象这一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蒲鲁东一样,马克思的思想基点也是社会。应该说,二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从而导致其理论的殊异。蒲鲁东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而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在哲学方面,蒲鲁东的社会哲学带有浓厚的黑格尔浪漫理性主义的思辨色彩,而马克思则通过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方面,蒲鲁东反映着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愿望,而马克思科学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蒲鲁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面世,在工人阶级中有着各自的代表。直到《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马克思主义才在理论上取代了蒲鲁东主义。其后,马克思恩格斯仍在与实践中的蒲鲁东主义作不懈的斗争。总结、



研究这段思想史,对今天不但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且在实践方面也有很高的价值。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同理,任何历史的批判都具有当代的价值。

马克思和蒲鲁东这个课题是一个系统性的研究课题。我自始至终是在我的导师孙伯鍤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进行该课题研究的。从笔者所涉猎的中、外文资料来看,尚未见有系统的研究。在探索中能走出一条路,当然是令人欣慰的。本书依据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文本,以马克思为主线,展开了对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多重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部分,在文中有着系统的反映。本书还穿插论述了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经过艰苦的跋涉之后,回顾、总结整个的研究,笔者觉得有以下一些新的收获:

本书首次将马克思与蒲鲁东的理论演进关系分为六大历史阶段:1841年以前,共具哲学视域阶段;1842年至1846年5月,社会主义交往阶段;1846年6月至1848年2月,首次公开论战阶段;1848年2月至1857年6月,革命及其对革命分析阶段;1857年7月至1867年,马克思在理论上深入批判蒲鲁东阶段;1868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者交锋阶段。

在哲学与宗教的关涉方面,马克思并不满足康德的批判和黑格尔的证明。蒲鲁东则不满意装饰着费尼隆雄辩词藻的笛卡尔哲学。蒲鲁东创造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的完整的体系,并设想借助科学和哲学实现道德和精神上的进步。马克思的哲学视野则聚集于实践。由于二者哲学视野的殊异,预示着实践观念将成为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概念,而蒲鲁东必然沉醉于康德的“应当”式的道德幻想。

马克思与蒲鲁东不仅仅是批判关系,而具有多重关系。在《贫困的哲学》出版之前,马克思把蒲鲁东当作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加以接受。在完成向唯物主义转变之后,他仍然视《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为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宣言,但蒲鲁东只是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文学总汇报》上的《蒲鲁东》一

文,是马克思首次对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对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都基于《蒲鲁东》一文的框架。

马克思与蒲鲁东1846年5月间的通信内容证明,由于革命志向的不同以及理论上的分歧,预示着已经创立唯物史观的马克思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的分道扬镳。再者,马克思与蒲鲁东论战的倾向性,主要是因为蒲鲁东攻击正式得到承认的经济学家,批判蒲鲁东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体现者是为了给科学社会主义扫清道路。这就否定了西方学界所流行的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感情沟壑说,《哲学的贫困》中犀利的、近乎残酷的用语也就可以得到正确理解了。

在蒲鲁东生前为何未撰文公开反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他的批判这一问题上,学界长期以来见仁见智。在证伪种种谬说之后,本书认为这是由于马克思的批判击中了蒲鲁东的要害,令其难以公开反驳,固蒲鲁东只能在读《哲学的贫困》时所做的批注中作出反应。

在《哲学的贫困》之后,除了1865年1月马克思以致施韦泽信的方式批判蒲鲁东外,本书认为马克思在1851年3月完成的《反思》一文既体现了该时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状况,又反映了马克思在较深的理论层面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观点的批判。这一批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1857—1858年手稿》)中得到具体的展开。马克思在评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时把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概括为:竭力反对资本;社会清算只是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手段;银行是赖以实现一切目的的手段。

本书首次论述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影响。蒲鲁东主义由于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不得不改变其自身的理论存在形式。革命导师关于物质生产是决定性的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等的

论点,有很大一部分被蒲鲁东接受了。蒲鲁东从法译本《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中吸收了许多重要思想。马克思也认为蒲鲁东从他那里剽窃了一些思想。

本书首次系统地考察了《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中对蒲鲁东的批判。该批判涉及劳动货币、无息信贷、贷放货币的资本家、所有权、生产过剩、工人与自己产品的关系、劳动的价值、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等方面的内容。本书在马克思对待历史哲学的态度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取代了蒲鲁东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住宅、政治、权威、政府等问题上继续与蒲鲁东主义展开斗争。本书指出,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续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问世之后,蒲鲁东又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担负起了批判蒲鲁东的社会改良方案的任务。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把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变成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关系的错误观点。

由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中所受到的启发在于,从实践和理论方面多维度地思考社会主义与哲学的关联:科学与价值的关涉;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与哲学。准确地定位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功能,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显得刻不容缓。科学地阐释、界定主体性、价值、自由之类人的问题有赖于此。

本书最后还提出了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理论走向问题。其中包括蒲鲁东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蒲鲁东与女权运动、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影响等问题。

#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与青年蒲鲁东	(1)
第一节 马克思的少年时代	(1)
1. 家庭环境对少年马克思的影响	(1)
2. 中学时期的思考	(2)
第二节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及其对哲学的研究	(6)
1. 《给父亲的信》	(6)
2. 最早的哲学笔记	(8)
3. 《博士论文》及附录	(11)
第三节 青年蒲鲁东的哲学构想	(13)
1. 家庭和青年时代	(13)
2. 《报考信——致贝桑松大学的先生们》	(16)
3. 第三种社会形式:自由	(18)
4.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哲学视野分析	(21)
第二章 马克思把蒲鲁东作为社会主义者接受时期	(24)
第一节 马克思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24)
1.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	(24)
2. 《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26)
3.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	(29)
4. 恩格斯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32)
第二节 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宣言	(35)

1.《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构成 .....	(35)
2.蒲鲁东著作对马克思的影响 .....	(37)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蒲鲁东经济学的评价 .....	(39)
4.马克思结识蒲鲁东 .....	(42)
<b>第三节 马克思对《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分析 .....</b>	<b>(44)</b>
1.从《文学总汇报》到《神圣家族》 .....	(44)
2.对《什么是所有权》的一般评价 .....	(45)
3.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功绩及局限性 .....	(46)
<b>第四节 马克思邀请蒲鲁东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b>	<b>(50)</b>
1.《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一书中的系列辩证法 .....	(50)
2.马克思写给蒲鲁东的一封信 .....	(53)
3.蒲鲁东给马克思的回信 .....	(56)
<b>第三章 马克思与蒲鲁东的首次公开论战 .....</b>	<b>(59)</b>
<b>第一节 与蒲鲁东论战的序幕 .....</b>	<b>(59)</b>
1.《贫困的哲学》一书的出版 .....	(59)
2.恩格斯在巴黎揭开与蒲鲁东论战的序幕 .....	(60)
3.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与蒲鲁东论战的倾向性 ..	(64)
<b>第二节 马克思的批判与蒲鲁东的反应 .....</b>	<b>(66)</b>
1.经济范畴理论批判 .....	(66)
2.价值理论批判 .....	(68)
3.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得到的两点启示 .....	(73)
4.蒲鲁东对马克思的批判作出的反应 .....	(75)
<b>第三节 《共产党宣言》中对蒲鲁东社会主义理论的定位 .....</b>	<b>(79)</b>
1.《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的附录 .....	(79)
2.《贫困的哲学》: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	(80)
<b>第四章 1848年革命中的马克思和蒲鲁东 .....</b>	<b>(83)</b>
<b>第一节 革命中的蒲鲁东 .....</b>	<b>(83)</b>
1.蒲鲁东与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事件 .....	(83)

2. 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 .....	(86)
第二节 蒲鲁东在革命中及革命后所发表的著作 .....	(89)
1. 《社会问题的解决》 .....	(90)
2. 《一个革命者的自白》 .....	(93)
3. 《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	(98)
第三节 马克思对革命的分析以及对蒲鲁东的批判 .....	(107)
1. 革命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	(107)
2. 对法国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	(109)
3. 《反思》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	(114)
4. 评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	(116)
5.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影响 .....	(120)
6. 恩格斯对蒲鲁东的批判 .....	(122)
7. 蒲鲁东的“经济学圣经” .....	(128)
第五章 马克思在理论上深入批判蒲鲁东时期(上) .....	(130)
第一节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著述 .....	(130)
1. 《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 .....	(130)
2. 《联邦的原则》 .....	(137)
3. 《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 .....	(140)
4. 马克思一生最为重要的理论研究时期 .....	(148)
第二节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蒲鲁东的批判 .....	(153)
1. 经济关系的历史起源 .....	(153)
2. 劳动货币 .....	(158)
3. 价值理论 .....	(161)
4. 无息信贷 .....	(164)
5. 生产过剩的原因 .....	(172)
第三节 蒲鲁东在方法论上的错误 .....	(176)
1. 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与黑格尔的绝对方法 .....	(176)
2. 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具体方法方面的错误 .....	(179)
3. 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	(181)



第六章 马克思在理论上深入批判蒲鲁东时期(下)·····	(188)
第一节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蒲鲁东的批判 ·····	(188)
1. 关于贷放货币的资本家·····	(188)
2. 竞争的规律与现代土地所有权·····	(191)
3. G—G': 无中介过程的主体批判·····	(194)
4. 批判蒲鲁东商品等于资本的观点·····	(198)
5. 批判蒲鲁东工人不可能买回自己产品的观点·····	(200)
6. 批判蒲鲁东所有权非经济起源的理论·····	(204)
7. 蒲鲁东式的聪明·····	(207)
第二节 《资本论》中对蒲鲁东的批判·····	(210)
1. 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的实质·····	(210)
2. 蒲鲁东的定理·····	(212)
3. 蒲鲁东的集合力理论·····	(215)
4. 劳动的价值·····	(218)
5. 价值形式的特殊性·····	(220)
第七章 马克思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者的交锋·····	(223)
第一节 马克思在通信中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223)
1. 批判民族问题上的蒲鲁东主义立场·····	(223)
2. 决定出版《资本论》法译本·····	(228)
第二节 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的批判·····	(231)
1. 关于住宅问题: 恩格斯与米尔柏格论战的概况·····	(231)
2. 《论住宅问题》第一、三部分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232)
3. 恩格斯的《蒲鲁东的〈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摘录》·····	(239)
第三节 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	(243)
1. 政治与蒲鲁东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	(243)
2. 哲学与社会主义·····	(247)
结束语·····	(252)
主要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58)

# 第一章

##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与青年蒲鲁东

年长马克思 9 岁的蒲鲁东有着与马克思不同的童年。前者的童年生活在田园诗般的法国乡村,后者的童年是在具有深厚文化氛围的德国特利尔城度过的。然而,在马克思过了弱冠之年、蒲鲁东刚过而立之年时,这两位学人的思想发展起点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 第一节 马克思的少年时代

#### 1. 家庭环境对少年马克思的影响

“1818 年 5 月 7 日下午 4 时,三十七岁的特利尔高等上诉法院律师亨利希·马克思先生,向本人(特利尔市政管理局负责特利尔区民政事务的官员)出示一名男性婴儿并申报,该婴儿于 5 月 5 日凌晨二时在特利尔出世。生于特利尔律师亨利希·马克思先生及其妻子罕丽达·普勒斯堡家。他们拟给这婴儿取名为卡尔。”<sup>①</sup> 这是卡尔·马克思出生证书上的记载。

童年的马克思喜欢户外游戏,投身大自然的怀抱。他在孩子们中间通常是领头的,并以其极其丰富的想象力赢得了同龄人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17 页。

钦佩。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产生深刻的影响。亨利希·马克思是特利尔市颇有名望的律师,学识渊博,精通法学,富有哲学素养。他熟悉牛顿、莱布尼茨、洛克、康德、莱辛等人的著作,深受启蒙精神的影响。根据卡尔·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回忆,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是地道的18世纪法国人,能够背诵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在思想上倾向理性主义、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的亨利希·马克思,以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开明的自由精神培育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与性格。

在少年马克思的视野中,母亲罕丽达·马克思是一位卓越的母亲,因为母亲的存在是爱和忠诚的象征。卡尔·马克思深得双亲的钟爱,在全家八个孩子中,马克思是双亲的宠儿。母亲称他是万事如意的幸运儿。父亲希望才华横溢的儿子日后成为一名大法官,一名备受世人尊敬的、富有理性精神的律师。

精神上对马克思产生较大影响的另一个人是他父亲的好友和邻居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他的女儿燕妮(马克思未来的妻子)是卡尔的姐姐索菲亚的朋友。男爵知识渊博,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浪漫主义文学造诣颇深,能背诵荷马的作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马克思后来酷爱莎士比亚作品与此有关。

在马克思求学的特利尔中学,有一批民主派的优秀教师对马克思也产生深刻的影响。教历史和哲学的是校长维登巴赫。他是一个康德学说的拥护者,力倡理性主义的教学原则。像这样的优秀教师还有数学教师施泰宁格尔、希伯来语教师施涅曼。同时,法国革命以及汉巴赫大会等社会事件的余波也不时冲及到马克思的生活中来。

良好文化环境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强烈的自由主义气氛的熏陶,对马克思最初思想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2. 中学时期的思考

1830年,12岁的马克思入特利尔中学读书。同年爆发了法国

七月革命。到 1835 年,马克思完成了中学学业。马克思所受文化环境和自由主义气氛的影响主要就在这一时期。少年马克思对社会、人生作出了独立的思考。这反映在其中学作文中。现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中学时期的作文共有七篇。这是马克思最早的著作。

《论宗教问题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 15 章第 1 至 14 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教员居佩尔在马克思的这篇中学考试作文上写了如下评语:“思想丰富,叙述精采有力,值得赞许,不过文内所涉及的一致的实质并不明确,一致的原因也只是从一个方面谈到,而它的必要性论述得也不够充分。”<sup>①</sup>显然,评阅者是基于教义的观点作出上述评价的。而马克思是将宗教置于道德之上,从道德方面理解一致的基础。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论述人神结合的原因在于人的本质。古代圣哲柏拉图力求做到与神的结合,在于人永远企图用不断提高道德的办法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基督教的道德远胜伊壁鸠鲁的道德和斯多葛派的道德,因为基督教道德比前者更为纯净、深刻,比后者更近情理、温和。

《拉丁文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是一篇关于历史的作文。该文把前两个时期和奥古斯都时期作了比较,论述奥古斯都时期的人们不仅在民政和军事方面普遍表现了极其伟大的美德,同时还创造了最高的文化。国家里供职的都是些英勇和智谋卓著的人物,“奥古斯都所确立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符合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因为,如果百姓都柔顺亲密,讲究文明风尚,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了,——那么统治者倒会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至于文学和艺术,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这样繁荣过;在奥古斯都时代里有许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49 页。

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几乎所有民族从中汲取教益的源泉。”<sup>①</sup>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自由命题的德语作文最为充分地体露马克思的思想特点。在这里,马克思首次表述了社会关系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与完全依赖自然生活条件的动物不同,人总是力图借助于自由活动来驾驭这些条件。“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超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

会得到提高的地位。”<sup>②</sup>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的自由。而慎重地选择职业、明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青年人的首要责任。人既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又不是完全自由的。选择职业在客观上要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sup>③</sup> 这体现出马克思主张青年在选择职业时应采取客观现实的态度。虽然马克思在作文提到了“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但他还承认神,其基本思想还是启蒙主义的。

马克思在中学时期最有价值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生志向和幸福的认识。马克思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把自己的存在与人类的幸福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写道: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sup>①</sup>

17岁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幸福的所属的。马克思崇高而伟大的理想为他后来的实践所实现。中学毕业时的马克思把个人的职业与全人类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献身人类事业的忘我精神境界。然而,他此时的理想还缺乏确定的社会内容,强调的是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实现。他所憧憬的是深入生活本身的职业,或是研究抽象真理的职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年轻的马克思后来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首要的是在于他是一个最崇高的人,把为共同目的而劳动看作是幸福的人。人们自身的完善只有通过为全人类幸福而劳动才能达到。马克思为之而奋斗一生。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 第二节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及其对哲学的研究

### 1.《给父亲的信》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波恩大学攻读法律。第一学期,他决定同时听九门课程,表现得非常勤奋。在这学期,特利尔籍的大学生选他为同乡会的主席。他对诗歌创作的兴趣愈来愈浓。由于当局对自由主义的镇压,马克思的政治不满情绪日益增长。1836年夏,马克思和燕妮订了婚约。但与燕妮的曲折爱情更加深了马克思的苦恼,似乎只有在艺术和诗歌的世界中,他才能找到精神的寄托。他在三个月内写了三本献给燕妮的诗集,56首诗只有一个标题——“致燕妮”。马克思曾写有这样一首14行诗:

“燕妮!笑吧!你定会觉得惊奇:

为何我的诗篇只有一个标题,

全部都叫做《致燕妮》?

须知世界上惟独你

才是我灵感的源泉,

希望之光,慰藉的神。

这光辉照彻了我的心灵,

透过名字就看见你本人。

燕妮这名字——个个字母都神奇!

它的每个音响都使听觉着了迷,

它的音乐,借助金弦三角琴

委婉的音响,随处向我唱吟,

像玄妙的神话里的善神,

又宛如春宵月色荡波心。”<sup>①</sup>

就马克思当时的心情而言,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亨利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儿子这样下去恐难完成学业,于1836年秋把马克思转到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时期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在他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是马克思学生时代保存下来的惟一的也是最早的一封信,是研究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珍贵文献。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学期,亨利希·马克思给自己的儿子写了17封信,而19岁的马克思只是在学期末回了一封信,这就是《给父亲的信》。通常,马克思信写得很短,但这一封却写很长,而且是在烛光下分两次完成的,足见其重要。他在该信中提到的许多问题,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sup>②</sup>

这封信既是马克思爱的心曲,又是其思想转变过程的真实写照。展现在马克思面前是一个新的世界,“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sup>③</sup>,父母的心是“爱的太阳”。爱诱发马克思行动起来、有所作为,使他“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然而抒情诗“是纯理想主义的”。这在马克思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中得到了反映。马克思由诗转向了法学和哲学。认为“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因为我应该研究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此时的马克思既受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又深为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所感染。他在哲学观点上基本上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也应看到,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已开始认识到:“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8~559页。

②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早期文本》,纽约1972年版,第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sup>①</sup>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既不是费希特的理想主义，也不是康德的“应当”，它体现的是黑格尔的思想方法。马克思对父亲这样写道：“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sup>②</sup> 尽管马克思不喜欢黑格尔哲学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但他的哲学思考的最后的命题仍未能超越黑格尔体系的开端。马克思发现法学是和哲学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没有哲学，则无法从事法学研究。马克思在患病期间，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在他看来，自己和“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对黑格尔的崇敬，构成了马克思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可以说是科学共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起点。

从马克思的这封信中，可见其思想发展轨迹：从诗歌转向科学，在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选择中，又走向了黑格尔。1839年，马克思开始做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接着写出了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

## 2. 最早的哲学笔记

从目前国际上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来看<sup>③</sup>，《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七个笔记》（Hefte zur epikureischen Philosophie. Heft 1—7）为马克思最早的哲学笔记。这是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 2）第4部分，第1卷，柏林1976年版。

之前所做的笔记。在 1842 年以前,马克思还有两个笔记本:柏林笔记本和波恩笔记本。前者是马克思《关于古典哲学著作的摘录》(Exzerpte aus Werken klassischer Philosophen),后者是《关于艺术和宗教史的摘录》(Exzerpte zur Geschichte der Kunst und Religion)。在古典哲学方面,马克思摘录了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休谟、斯宾诺莎和罗森克朗茨的著作。关于艺术和宗教史方面,马克思注意到了意大利语研究、希腊人的绘画,对奥克斯特·布梯格的《艺术神话学的理念》和克里斯托芬·马因内斯的《宗教的一般批评史》以及本杰明·孔司坦特的《论宗教》和查因·巴比拉克的《论天主教教父的道德》(Traité de la morale des pères de l'église)作了摘录。从这些摘录中,马克思最早的哲学旨趣可见一斑。这里,主要分析马克思最早的哲学笔记——《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七个笔记》中的哲学理论走向。

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的关注,还是处于黑格尔主义意义上的,但这也显露出马克思思想新的发展趋向。在伊壁鸠鲁对精神本质、国家的看法中,马克思重视伊壁鸠鲁关于正义在互相交往中存在、正义在人们交往的相互关系中被证明是有益的东西的论述。人们把黑格尔哲学对生活的关系同苏格拉底进行比较,斥责黑格尔哲学,这是荒谬的。哲学发展中存在关节点,这在哲学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关节点,它们使哲学在自身中上升到具体,把抽象的原则结合成统一的整体,从而打断了直线运动,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时刻: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这是哲学的狂欢节;它像犬儒主义者那样装出一副狗相,像亚历山大里亚派哲学家那样穿起祭司的法衣,或者像伊壁鸠鲁

派那样披上芬芳的春装。”<sup>①</sup> 这里透露了马克思对哲学与实践关系的论述,哲学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创造世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在把握了整个世界之后进而反对现象世界。

在笔记五中,马克思写有这样一段:“虽然哲学被封闭在一个完善的、整体的世界里面,但这个整体的规定性是由哲学的一般发展所制约的;这个发展还决定了哲学在转变为与现实的实际关系时所采取的形式。因此,世界的整体性一般地说是内部分离的,并且这种分离达到了极点,因为精神的存在是自由的,其丰富达到普遍的程度,心脏的跳动在其内部,也就是在作为整个机体的具体形态之中形成了差别。只有当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是整体的时候,世界的分裂才是完整的。所以,与本身是一个整体的哲学相对立的世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因而这个哲学的能动性也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而哲学的生命就存在于这些主观形式之中。但是不应对这场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出现的风暴,感到惊慌失措。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当暴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sup>②</sup>

这一段可以说是马克思所写过的东西中最晦涩的部分之一。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段与黑格尔哲学有关,马克思的论述是针对历史必然性的。适度并非是绝对精神的正常表现。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们的许多尝试是毫无价值的。

马克思在笔记本中还论述了哲学史家的任务,他指出:“编纂哲学史的任务,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个性理解为好象是他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理上的琐屑小事和卖弄小聪明。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1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

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哲学史应该把那种像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sup>①</sup> 哲学史家要辨别本质的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只有这样，才不沦为缮写员。

从最早的哲学笔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显然是为一部大的哲学著作作准备。马克思既视黑格尔为大师的存在，又在进行着自己的哲学思考。这一思考的成果集中地体现在其《博士论文》中。

### 3.《博士论文》及附录

《博士论文》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结晶。马克思把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献给了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因为他的纯正的理想主义和对于真理与进步的深刻向往为马克思所钦佩。马克思说：“我希望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sup>②</sup>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构成，原文用德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于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间写成。马克思借助于对希腊哲学历史的批判考察来探索和确定黑格尔以后哲学发展的方向。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体系是希腊哲学发展的完成，因而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揭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来纠正人们轻视和曲解伊壁鸠鲁等希腊后期哲学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



在马克思看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是不同时代精神的表现。作为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体现了希腊自由精神,而伊壁鸠鲁哲学则为自由的希腊精神走向衰落时期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德谟克利特哲学以自然为中心,强调人对自然必然性的服从和追求,而伊壁鸠鲁哲学则渴望确立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强调人对现实世界的独立与自由。马克思在肯定伊壁鸠鲁哲学克服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在探索意识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建立了哲学的新起点的同时,批评了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把哲学的兴趣完全引向人的内心生活。

马克思还从细节上论述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主要是从原子的运动、原子的质、本原和元素、时间以及天体现象等方面加以论述的。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应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伊壁鸠鲁的偏斜运动。“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偶然出现的规定性。反之,偏斜运动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了整个伊壁鸠鲁哲学。”<sup>①</sup>与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已用矛盾的观点来把握原子的质。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是这样规定一切特质的,即认特质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反之,德谟克利特再也没有从原子本身来考察其特质,也没有把那包含在原子的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客观化,而他的整个兴趣乃在于根据那必然是由质构成的具体自然来说明质。”<sup>②</sup>把作为始基和元素、原理和基础的原子区别开,这乃是伊壁鸠鲁的贡献。在“时间”问题上,显示出伊壁鸠鲁的辩证思考。马克思在“星辰”中突出地说明了伊壁鸠鲁哲学的反神学的革命性质。

在对黑格尔学派的批评中,马克思论述了对待黑格尔哲学的科学态度。与老年黑各尔派对待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态度不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科学。作为黑格尔的学

---

①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1 页。

②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6 页。

生,就是要阐发黑格尔哲学的内在本质即辩证法,而扬弃其保守的结论。“一个哲学家由于这种或那种的适应会犯这样或那样的显然的不一贯的毛病,是可以理解的;他本人也许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是:这种表面适应的可能性其内在根源在于对他的原则本身的不充分或没有充分掌握。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家真正适应了,那末他的学生们就应该根据他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是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外在的意识形式的东西。”<sup>①</sup>马克思企图用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则来改造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及其对哲学的研究,是他企图冲破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最初尝试。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对这一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考述,旨在与青年蒲鲁东的哲学思想加以比较研究,而这又需要对蒲鲁东的早期哲学思想发展作一论述。

### 第三节 青年蒲鲁东的哲学构想

#### 1. 家庭和青年时代

比·约·蒲鲁东(Pierre -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 1809年1月15日生于法国贝桑松市一个亦农亦工的家庭里。蒲鲁东是家里第五个孩子,他的父亲是农民也是木桶匠,后来他的父亲改行开了啤酒店,由于为人正直,生意做得很糟(蒲鲁东认为这是由于店里不肯接待举止轻浮的姑娘所致)。蒲鲁东颇为重视自己的农民出身。他在国民议会的一次发言中面对一位出身显贵的贵族宣称:“我的14代先人皆为庄稼汉,请你给我那怕仅举出一个有这样高尚先人的家族来。”蒲鲁东在自传里称他有一个少见的优越之

<sup>①</sup>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4页。

处：他生来就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他已经会理解是什么东西把人民创造成现在这样的，他始终是人民。他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木桶匠，有子女五人……十二岁以前，蒲鲁东的生活是在田野里度过的，有时作些轻微的农活，有时放牛。五岁时他就作了赶牛者。”

蒲鲁东在 12 岁那年，获得了贝桑松中学走读生的奖学金，自此开始正规的学习。1827 年，他当上了印刷厂的排字工和校对员。1829 年，他回到了贝桑松，在出版传教士著作的戈蒂埃出版社当排字监工，这使他学会了希伯来文，熟读了《圣经》。蒲鲁东在 1858 年曾这样回忆这段生活：“在我十二岁到二十岁那段时间里，我可能显得有点桀骜不驯。这不能怪我脾气不好，而要怪一味颠倒是非和压抑本能的基督教，它的一套做法就是要人以伪装面目出现，并用虚假的感情去代替天然的感情。”<sup>①</sup>

出身农民的蒲鲁东，对农民有着自己的理解。在蒲鲁东看来，“农民是最少浪漫气息和最少理想主义的人。农民沉浸在现实之中，他和所谓趣味是格格不入的，因而他决不会花三十苏去习一张美丽无比的风景画。他爱自然就像孩子爱自己的乳母一样，尽管他对自然的美并非无动于衷，但他注意的不是自然的迷人景色，而是它的肥沃富饶。面对罗马的乡村，农民决不会为那威严的轮廓和壮丽的远景而出神凝视；像平凡的蒙台涅一样，农民所看到的将只是荒芜的土地、发臭的水坑和瘴疠的蔓延。当他们触景生情，为饥饿、疾病和死亡担忧的时候，他们不能想象还有诗和美的存在：他们在这方面同古代的田园歌手是一致的，当田园歌手歌颂富饶大地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像现代的干瘪诗人那样认为这里面有什么反诗意的成分。农民热爱自然，因为自然有丰满的乳房，有洋溢的生气。农民不象艺术家那样轻轻地触摸自然，他们像雅歌中的情人那样热情拥抱自然，啊，大自然的乳房多么迷人，他在大自

---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9 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1 ~ 42 页。

然的怀抱中痛饮乳汁。”<sup>①</sup>

1836年,蒲鲁东和他的两个伙伴合资经营了一所印刷厂,但他同他父亲一样不会做生意,企业未维持多久就盘给了别人。但蒲鲁东一直坚持自学,博览群书。这在他的写作方面却形成了一个毫无系统的风格。蒲鲁东认为受到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手段。当他25岁时,还认为《爱弥尔》中的家庭教师实即家庭教师的标本,就其对自然的感情而言,只是钟表匠的平庸的儿子。蒲鲁东对自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这样写道:

“过去,我在繁茂的草丛中打滚,有时真想像我的牛一样,啃上几口青草;我打着赤脚,沿着篱笆在平坦的小路上奔跑;我在绿色的玉米地里培土,双腿深深地陷进新鲜的泥土,这一切是何等快乐呀!在六月天炎热的早晨,我曾不只一次脱掉衣服在草地上洗露水澡。老爷,您对这种和泥土打交道的生活该说什么呢?我向您保证,这种生活造就不了虔诚的基督教徒。那时我对我和非我不太清楚。我,就是我能用手摸到、用眼睛看到以及对我有点用的东西;非我,就是一切有害于我或和我作对的东西。在我的思想里,我的人格和我的福利合二而一,我根本不想在这些观念中寻找无边际的、非物质的本质。我整天吃桑椹、豌豆、烤玉米以及各种野生浆果,如野李、山楂、野樱桃、野葡萄等等。我吃的那一堆半生不熟的东西,足以把一个娇生惯养的小资产者撑死,而这一切对我的胃所起的作用,无非是使我晚上有惊人的食欲。自然女神不给她的子民以痛苦。”<sup>②</sup>

青年蒲鲁东对贫穷有过愤怒,他感到只有通过竞赛去发展智力,才能挤身幸福者的行列。通晓就意味着占有,学术就是财富和资本。蒲鲁东的愤怒并非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愤怒,而是地位低下的、贪求占有但又感到在现在条件下占有是他所不能作到的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43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页。

这样一个人的愤怒。事实上,发财致富又是蒲鲁东从未作到的。蒲鲁东的愤怒表明了其对周围现实所持的某种态度。青年蒲鲁东的遭际对他的著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什么是所有权》和《贫困的哲学》这两部著作。

## 2.《报考信——致贝桑松大学的先生们》

如果说马克思的《给父亲的信》真实地反映了大学时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话,那么年长马克思9岁的蒲鲁东的《报考信——致贝桑松大学的先生们》则表露了蒲鲁东的哲学构想。

蒲鲁东的《报考信》写于1838年。这一年,蒲鲁东向贝桑松大学申请该校为帮助经济困难的中学毕业生继续深造而颁发的“苏阿尔奖学金”(每年1500法郎)。从这封信中可知,蒲鲁东在一年前曾寄过一本书给贝桑松大学的老师们。蒲鲁东写道:“在1836—1837年间,长期患病迫使我中断了在工场的劳动,我又开始从事写作。由于写了几篇还算满意的评论文章和有关神圣哲学的文章,我又提起对写作的兴趣,并决定了今后要进一步研究哲学。我利用发烧的失眠之夜和养病的空闲期间对语法进行了一些研究,我以为这些研究成果相当重要,值得送请你们审阅。我的作品已一式两份寄给你们;可是,你们至今没有作出评断,恕我冒昧猜测,这也许是贵学府工作繁忙的缘故。”<sup>①</sup>蒲鲁东在这里所提到的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是他的《论通用文法》一书。

《论通用文法》(Essai de grammaire générale)是蒲鲁东的第一部著作。这是一部既是神学的、也是社会经济学的著作。马克思称其为蒲鲁东的幼稚之作,该书“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sup>②</sup>在1838年以前,蒲鲁东所读的主要是宗教内容和神学内容的书籍,世俗问题在他那里都带有神学的色彩,甚至他在思考经济问题时也未能脱离神学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页。

思维。他后来在《贫困的哲学》一书的序言中宣称,如不假定上帝存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蒲鲁东在《论通用文法》中,认为通过语言的研究可以确定人类的共同性以及所有各部族都起源于犹太民族;语言可以提供上帝存在这种主张的论据。在《报考信》中,蒲鲁东阐述了语法研究与哲学的关系,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得到贝桑松大学先生们的支持。“为心理学开辟新的领域;为哲学寻找新的法则;通过人的最明显、最可捉摸的官能,即说话来研究人的精神的本质和结构;根据语言的起源和方式确定人类信仰的源泉的支脉。一句话,把语法运用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并实现智慧深邃的天才们为之感到苦恼的、法罗曾专心研究过的和波蒂埃正继续研究的思想:先生们,如果你们给我书和时间,这些就是我赋予自己的任务;特别是要书!时间我从来没有缺少过。”<sup>①</sup> 这就是蒲鲁东对贝桑松大学先生们许下的诺言。

蒲鲁东把《论通用文法》一书提交贝桑松大学申请奖学金,这使得笃信上帝的大学先生们非常为难。蒲鲁东在书中运用证明人类起源的共同性这一手段,来说明平等原则的根据,从而为劳动者辩护。神学的思辨又的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蒲鲁东似乎也意识到了书中的矛盾。他在信中这样希求到:“如果已经呈现给你们的拙作尚堪寓目,如果我的管窥之见尚属正确,如果先生们希望看到我完成这一崭新的和前程远大的研究工作,那么,能否允许我这个等待你们的评判已经一年之久的人指望得到诸位更多的宽容,不要让我对自己的才能空怀希望,也不要让别人因我的极度贫苦而给予照顾。”<sup>②</sup> 蒲鲁东虽然没有得到奖学金,但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获得了 1500 法郎的助学金。正是这笔助学金使他有可能从事著述活动。蒲鲁东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兴奋地写道:人人都祝贺他,他们看到,他现在能够青云直上,并且在得到荣誉和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9 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5 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9 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4~65 页。

辉煌地位以后还能够比得上若夫鲁亚等人,甚或超过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他说:蒲鲁东,你必须忠于穷人的事业,必须忠于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必须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你的同胞们在看着你。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酬劳你,但是他们的谢忱要比金币贵重。你要吃苦,并且必要时成仁,但对人民要说真话,要维护孤儿。蒲鲁东似乎要去完成伟大的使命。

### 3. 第三种社会形式:自由

1839年,蒲鲁东发表了第一篇重要的社会批评方面的论文——《论星期日举行宗教仪式对于卫生、道德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好处》(De l'utilité de la célébration du dimanche considérée sous les rapports de l'hygiène publique, de la morale, des relations de famille et de cité)。在蒲鲁东看来,问题正是要去发现并证实经济法则,那些为了维持地位之间的平等而限制所有权和分配劳动的经济法则。在该文中,他提出“社会问题”的本质在于“发现一个社会平等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既不是公社,也不是专制政府、计划政府以及无政府,但这样的国家旨在有秩序的自由和个体的独立。”<sup>①</sup>蒲鲁东后来的著述,进一步拓展了这篇论文中的思想。

1840年2月,蒲鲁东开始了他著述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他在给贝尔格曼的信中和盘托出了他的著述构想:

“请看我工作的简要进程:全部著作的主题:确定正义的观念、它的原理、它的性质和它的公式。

方法。确定所有权中的正义观念;并且1.关于占用权,我通过分析证实了哲学家、法学家等等所想象的一切理论都不言而喻地把平等当作是必要的。平等是必然的定律,绝对的形式;在一切关于所有权的学说中,所有的人,甚至在背离它的时候,都不知不

---

<sup>①</sup> 克·斯梯芬·文森特:《比·约·蒲鲁东与法国共和社会主义的兴起》,牛津1984年版,第60页。

觉地在服从着它。

2. 确定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中合乎正义的东西。我用同样的分析方法证明,经济学家们所谈的劳动权,无论他们对它具有何种方式的理解,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论据,它的结果是平等。但是现在平等并不存在,甚至有人主张它是不可能的。我却证明不可能的是所有权本身;它的不可能不是因为它被滥用了(per abusus rei),而是由于它的本质(in se);我证明所有权是荒谬的、毫无价值的,它在它的名词中包含着矛盾,它导致无数的形而上学的胡说和不可能的事;总之,它是事实上的,但它是是不可能的。

这里是:按照以上所获得的一切真理,关于社会性、平等、自由、正义和法权的原理所作的陈述。

随后是:通过那种方法而得到的形而上学的定律或公式在政治经济学、民法、政治学上的应用以及对这些科学的批判。

最后是:对历史哲学和人类进程的研究。

第一次在哲学上采用了一种真实的方法并且用一种适当的分析方法真实地说明了用直觉或摸索所永远找不到的事理,因为直觉和摸索是什么也不能证明的。

总之,在这一切之中,我一点也没有把属于我的东西放进去;我寻觅,并且为了寻觅得更好,我给我自己造成了一个工具,给我自己制造了一个向导,在我将深入到它里面去的迷宫的门上,我系上了一根线。然后,我绝不争论,我对谁也不加驳斥,我认可一切的见解,我但求找到这些见解中所含有的东西。而在所有这些见解中所必然都含有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真实的原理、一个定理;我就在一个生理上的或者自然界的事实中去确实地找出这个原理的理由,然后我就从这个原理出发,以我起先曾经为了确定那个原理而从事归纳时的同样严格精神,从事推理来进行我的科学研究。

……至于这本著作的写作方式,虽然我绝对抽象地(in abstracto)来推论一切事物,可是我希望文体和理论的发挥既不至于



缺乏生气,也不至于失去独特性。这一切,在一个为大家所热烈讨论的问题上,必然会造成一本奇特的著作。”<sup>①</sup>

蒲鲁东在信中所谈到的著作,就是在1840年问世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他因该书而博得了很大的声望。但写此信时,该书尚正在酝酿之中。当蒲鲁东写完第一章时,他对自己的著作有这样一种感觉:“著作的文体将是粗犷的、激烈的;这种文体将使人感到过多的讽刺和愤怒;这是无可救药的毛病。当狮子饿的时候,它是会吼叫的。此外,我要尽可能避免掉到雄辩和文雅的文体中去;我推论、我总结、我区别、我驳斥:我不必再求助于修辞学,主题本身必然会引起一切人的兴趣,即使是万事不关心的人也会如此,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在哲学上,毫不存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但愿所有权遭到不幸!遭殃吧!”<sup>②</sup> 在1840年5月3日,蒲鲁东在给贝尔格曼的信中对自己已完成的著作感到非常满意。他写道:“你在看到我这样非常的自信时,你大概会发笑吧。我的朋友,这是因为我觉得,在科学上,从来没有一个发现,能够产生像读了我的著作所产生的那种效果。我并不是说只要它能被人领会,我仅是说只要它被人阅读,旧社会就从此完蛋。”<sup>③</sup> 马克思曾对该书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我们在下一章中将对此作专门论述。

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所极力推崇的是第三种社会形式。在他看来,“这第三种社会形式,即共产制和私有制的综合,我们把它叫做自由。”在规定自由的性质时,蒲鲁东反对对共产制和私有制折衷主义的态度。追求的是这两种所有制中人类社会的天

---

① 《蒲鲁东通信集》第1卷,巴黎1860年版,第177页;转引自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页。

② 《蒲鲁东通信集》第1卷,巴黎1860年版,第183页;转引自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页。

③ 《蒲鲁东通信集》第1卷,巴黎1860年版,第213页;转引自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页。

然形式的适当表现,这也就是自由。蒲鲁东对自由的内容作了如下具体规定:

“自由就是平等,因为自由只能存在于社会状态中;如果没有平等,就没有社会。

自由就是无政府状态,因为它不容许有意志的统治,而只容许有法律、即必要性的权力。

自由就是无限的多样性,因为它在法律范围内尊重所有的意志。

自由就是相称性,因为它给与功绩的进取心和荣誉的竞争心以一切发展的自由。”<sup>①</sup>

在蒲鲁东那里,人的社会性演变为正义、公道。以自由作为公式的人的社会性构成道德的基础和人们一切行动的原则。它也是哲学、宗教和纯粹的理智所永远不能替代的普遍动力。而蒲鲁东的自由并不反对继承权和遗嘱权;鼓励竞赛而不加摧毁;赞成自我牺牲精神;本质上具有组织性。

#### 4.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哲学视野分析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和青年蒲鲁东都非常关注哲学,哲学在他们的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始自哲学。在马克思大学时代的那封信中、最早的哲学笔记以及《博士论文》及其附录中,充分地表现了他的哲学思维过程。这一时期,马克思所探讨的一些哲学问题对其后来的理论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蒲鲁东也试图用哲学的方法阐述经济的法则。他晚年走向了社会哲学的研究。蒲鲁东的社会哲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其三卷本的《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中。

在哲学与宗教的关涉方面,马克思并不满足康德的批判和黑格尔的证明。而蒲鲁东则不满意装饰着费尼隆雄辩词藻的笛卡尔

---

<sup>①</sup>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92 页。

哲学。根据马克思的看法,黑格尔曾经把关于神的存在的这一神学证明弄颠倒了,“他推翻了这一证明,以便替它作辩护。”在神学证明中,神是偶然世界存在的根据。而黑格尔在否定了偶然事物存在的同时肯定了神或绝对者的存在。在黑格尔之前的中世纪,对神的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当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证明神存在的各种方法的批评也无济于事,因为康德所举的100塔勒的例子反而会加强本体论的证明。“要是你把纸币带到一个不知道纸币的这种用途的国家里去,那每个人都会嘲笑你的主观表象。要是你把你所信仰的神带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国家去,人们就会向你证明,你是受到幻想和抽象概念的支配。”“真正的证明必须倒过来说:‘因为自然安排得不好,所以神才存在。’‘因为无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神才存在。’‘因为思想不存在,所以神才存在。’但这岂不是说:谁觉得世界是无理性的,因而谁本身也是无理性的,对他来说神就存在。换句话说,无理性就是神的存在。”<sup>①</sup> 在这方面,马克思较为肯定谢林的观点。

蒲鲁东从童年时代就牢固地树立了上帝存在的观念,但他在一本用以证明上帝存在的书里只找到了牵强附会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推理似乎为一种较为简便的假设,而不是确切可靠的科学理论。这是蒲鲁东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像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蒲鲁东是一位无神论者,但他是一位基督教无神论者。他对上帝曾作过著名的谴责:“上帝是愚昧与怯弱;上帝是伪善与谎言;上帝是暴君与苦难;上帝是邪恶。”<sup>②</sup> 这表明蒲鲁东是公开的无神论者。他曾带着铺盖和哲学笔记去南方。经过长期的思考,蒲鲁东创造出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的完整体系:“早在人类出现前,就存在着一种哲学或原始宗教,这种哲学或原始宗教虽然在所有历史时代以前已经被歪曲,但在各民族的宗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

② 《蒲鲁东全集》第2卷,巴黎1923年版,第384页。

信仰中,却全部保存着这种哲学或原始宗教的真正的、相同的遗迹。基督教的大多数教义就是这些可以被证明的命题的简单表述;通过对各种宗教体系的比较,通过对语言形成的仔细研究,而丝毫不求助于任何其他启示,人们就能看到天主教徒所必须信仰的、虽然自身是不可解释的、但却能够为悟性所接受的真理的现实性。在这一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得出完全成为一门实证科学的传统哲学。”<sup>①</sup> 蒲鲁东的这一哲学构想,是他把哲学变成一门科学的尝试,这也是他自儿童时代以来的追求。蒲鲁东通过科学和哲学旨在谋求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进步,并在志同道合者之间播撒道德世界规律的理论种子。

与蒲鲁东对道德世界的关注不同,马克思的哲学视野聚集于实践。马克思说:“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但在哲学方面重要的是,应该更突出地勾画出这些方面的特点,因为从这种转变的一定方式就可回溯到一种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的性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这种哲学的生活道路的最集中的表现及其主观尖锐性。)不过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从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而且它的这种矛盾的本质在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且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sup>②</sup>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到后来成为他的思想核心的实践概念。这一概念最初发轫于奥古斯特·冯·希茨柯夫斯基,他认为行动和社会活动将压倒哲学。从对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哲学视野分析中,不难发现,二者的分歧点多于其共同点,其理论发展的殊异不可避免。

---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

## 第二章

# 马克思把蒲鲁东作为社会主义者接受时期

在1842年至1846年5月这一时期,马克思是把蒲鲁东作为社会主义者接受的。继《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之后,蒲鲁东于1842年又发表了《对产业主的警告》,该书是《什么是所有权》的续编。1843年,蒲鲁东出版了《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一书。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颇大。马克思在完成向唯物主义转变之后,开始思考哲学与社会主义的深层结构关系。这一时期,蒲鲁东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对马克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第一节 马克思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 1.《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

1842年1月1日,《莱茵报》在科伦创刊。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至次年3月任《莱茵报》主编。在这期间,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问题的辩论以及莱茵省总督就摩塞尔谷地的农民状况同《莱茵报》记者展开的论战,成为促使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并转向唯物主义的最初动因。在五个月的时间中,马克思连续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十篇文章。

在《莱茵报》的文章中，马克思批判了书报检查制度，阐述了精神自由。马克思指出，新书报检查令的自由主义是虚伪的自由主义，只是在给精神施加暴力。而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它不能只有一种存在形式。“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惟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sup>①</sup> 马克思对精神自由的阐述主要是从客观精神和理性出发，还不是从主体或个人出发。在国家观方面，马克思也表现为理性主义。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古代国家不是以古代宗教为基础，古代宗教却是以古代国家为基础的。马克思在批判海尔梅斯对现代国家任务的理解时指出：“实际上，国家的真正的‘社会教育作用’就在于它的合乎理性的社会的存在。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sup>②</sup> 可见，构成国家基础的东西应该是哲学的理性而不应该是宗教。宗教只不过是根本反对一切体系的哲学，哲学才是惟一真正的科学。此时的马克思的理性主义国家概念中寄托了他对社会改造的理想和希望。

1842年10月10日，马克思任《莱茵报》主编。这标志该报开始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把共产主义的实际运动和它在理论上的表现区别开来。而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碰到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开始动摇了他对国家和法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8页。

理性主义的幻想,意识到真正的方法过程并非由理性自由规律所支配,而是为物质利益所决定的。

## 2.《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决定查封《莱茵报》,3月17日马克思声明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他决心退回书房,以便重新探索继续前进的道路。3月13日,他在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和他商谈打算在施特拉斯堡(或者瑞士)创办《德法年鉴》的问题,信中谈到了费尔巴哈。马克思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惟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16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sup>①</sup>

5月10日,马克思从科伦移居莱茵省的小城克罗茨纳赫。在研究大量的历史著作过程中,马克思写下了厚厚的五本笔记,即《克罗茨纳赫笔记》。这是马克思当时面临着批判地审查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的需要。在居住在克罗茨纳赫的五个月的时间内,马克思在广泛研究各种历史著作的同时,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在马克思所读的二十多部著作中,绝大部分都做了详细的摘录和评注。这些历史著作包括海因利希的《法国史》(Geschichte von Frankreich)、拉克雷泰尔的《自复辟以来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a restauration)、约翰·卢塞的《英国政府和宪法史》、施密特的《法国史》、格耶的《瑞典史》、菲斯特的《德国史》以及汉密尔顿的《北美合众国风土人情》等。<sup>②</sup>

马克思在笔记中第一次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初步形成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443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 2)第4部分,第2卷,柏林1981年版,第9—282页。

了“事物”决定“逻辑”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在摘录了L·兰克《论法国的复辟》的一段文字之后写下了一段评述,这也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最长一段评述。马克思在这段评述中写道:在下一革命中决定者与被决定者将互易其位。“黑格尔将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体,并把旧国的存在(die alten Staatsexistenzen)变成谓语,而在历史的现实中则与此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谓语;他借助此法只是讲明了时代的普遍性质——时代的政治神学。他的哲学——宗教的泛神论的情况也是如此。一切非理性的形式借助此法变成了理性的形式。但在宗教中一般是将理性当作关键之物,在国家中是把国家观念当作关键之物。这种形而上学是反思的形而上学的表述,即旧世界——作为新世界观(der neuen Weltanschauung)的客观实在——的形而上学的表述。”<sup>①</sup>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的上述观点做了相同的批判。在读施密特的《法国史》时,十分注意所有制的变化和政治设施之间的关系。在考察封建社会的变化时还特别注意到“市民阶层的兴起”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从英国史方面的著作中摘录了不少关于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力量日益增长的资料,这使他有可能认识到市民阶层的兴起及其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必然会对国家制度和法律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马克思认识到了要实现真正的人类平等,必须消灭私有财产,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转向共产主义的立场。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从与这部著作有联系的、马克思在1843年春夏写给卢格的几封信件来看,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显然已经立足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立场了。马克思从现存的非理性的现实中引出理性的东西作为“理想使命”。这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 2)第4部分,第2卷,柏林1981年版,第181页。



里的理性已由原来抽象的自我意识变成自觉的人类意识。虽然马克思在历史观上主要还表现为唯心主义,但他在具体分析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却得出不少近似唯物主义的结论,表现出对费尔巴哈的超越。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sup>①</sup> 马克思在这里虽然明确地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但尚未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他在谈到民主制国家的实质时,直接运用了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方法。“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sup>②</sup> 这里的表述显然是费尔巴哈主义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还分析了私有财产和国家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难道国家制度的支柱不是国家制度的基础的基础吗,不是第一性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吗?”<sup>③</sup> 当然,马克思这里是指封建国家,而封建国家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国家。真正的政治国家应该是公共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者。政治国家应该摆脱私有财产而独立,私有财产和私人利益不应当成为政治国家的本质内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9页。

的性质。”<sup>①</sup>可见,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过程中,由于力图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国家和法的问题,显示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但其根本观点还停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范围内。

### 3.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

1843年10月中旬,马克思离开德国前往巴黎,以便在那里同卢格等人一起出版《德法年鉴》。《德法年鉴》预定自1844年1月开始每月出一期。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杂志只是在1844年3月出版了一期合刊。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主要有两篇:《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是马克思为批判布·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而写的。鲍威尔在这两篇文章中,从抽象的宗教观点大谈犹太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观点时,涉及到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以及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依据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新观点,超出并深化了费尔巴哈的观点,并在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异化的新思想。

马克思的批判以费尔巴哈的观点作为出发点。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费尔巴哈由于忽视了政治而不懂得人也生活在社会中,因此,马克思的任务就是把费尔巴哈的批判推向前进。马克思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所以批判完宗教之后必然要对国家、社会进行批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页。

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sup>①</sup> 马克思的批判显然已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自然和宗教的范围,进入了政治和法的批判的领域。

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马克思借批判德国的现在的国家制度来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现代国家即民主制国家,是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领域,而市民社会则纯属私人利益的领域,是彻底实现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目的,而人的活动、劳动等等则不过是手段而已。在现代国家中,民主制体现的进步仅仅是形式上的,国家利益只是在形式上被当作人民的真正利益,而实质上它只不过是脱离市民社会的一个抽象,一个虚幻的存在。可以说,民主制国家完成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它使市民社会的成员在政治方面脱离了自己的私人等级。只是在民主制国家中,市民社会的成员作为国家成员和社会生物才获得人的意义,获得他作为人的规定。“正如基督徒在天国一律平等,而在人世不平等一样,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sup>②</sup> 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完成这种分离,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在于它仅仅满足于市民社会的成员在政治上的解放。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类解放。鲍威尔正是把二者混为一谈。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其实就是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因为人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也就是把宗教从公法范围内驱逐出去,转到私法范围。宗教从此虽不再是国家精神,但它却依然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我们不要在政治解放的限度方面欺骗自己。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4页。

分为公人和私人的这种二重化,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并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个别阶段,而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灭人的实际的宗教观念,而且它也不想消灭这种观念。”<sup>①</sup>

在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的产物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是一致的。但马克思所理解的人不仅是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是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人;人的自我异化首先是表现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异化实际上构成了宗教异化的基础。在政治中,人把自己的本质转移到政治国家中去丝毫不能减轻自身的苦难。政治解放的结果仍然不是把身为公民的人,而是把作为市民社会一分子的人当作“本来的人”、“真正的人”。这表明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已远远地超过了费尔巴哈。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初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在该文中宣布要向德国制度开火,这已不是诉诸理性的批判,而是诉诸武器的革命。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的先决条件决定于哲学的发展和批判的水平,德国哲学对德国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 *ad hominem*[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 *ad hominem*[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证明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sup>②</sup>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461页。

正是在这种带有浓厚费尔巴哈色彩的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前提下,马克思第一次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sup>①</sup> 在无产阶级的自己身上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它才能恢复自己。在德国,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所以具有实际的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sup>②</sup> 正是在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阐述中,包含了许多后来所进一步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思想。可以说,马克思在初步批判了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观点和方法,并且经过费尔巴哈完成了向唯物主义转变之后,他已经意识到,要真正理解市民社会,还必须首先研究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马克思把蒲鲁东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加以批判性地接受。

#### 4. 恩格斯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在马克思与蒲鲁东交往过程中,恩格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诞生在莱茵省巴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页。

市一个保守、信教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狂热而专横的老头。”他要求子女绝对无条件地相信《圣经》，并把恩格斯送进教会学校读书。1834年10月，恩格斯进入当地条件良好的爱北特理科中学。由于刻苦钻研，恩格斯在中学时代打下了全面发展的基础。他在中学时就能阅读和翻译难度较大的外国古典原著，后来能用二十多种语言直接与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通信。根据父亲的旨意，恩格斯1837年10月提前在中学结业，以便实习经商。1838年7月至1841年3月，他在不来梅实习期间，一边工作，一边如饥似渴地吸吮各种有益的精神养料。他借助实际生活经验而摆脱宗教蒙昧主义，参加到社会政治运动中。

1839年年底，恩格斯通过施特劳斯实现了向黑格尔哲学的转变。1841年秋，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同时作柏林大学的旁听生，听了谢林、米希勒和马尔海涅克等人的哲学和神学课程。在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人著作的影响下，恩格斯越过了施特劳斯的泛神论观点，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先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以及《谢林——基督哲学家》等三篇哲学论文。恩格斯批判谢林的文章，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写成的，意在“保卫伟大导师的陵墓”，因为只有黑格尔哲学才反映了时代精神，体现了历史进步的要求。恩格斯强调黑格尔哲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它的“深邃的非静止的辩证法”。“强有力的辩证法，内部动力，似乎觉得自己对观念的各个范畴的不完善和片面性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不断地推动它们走向新的发展和复兴，直到它们作为具有永世不衰的纯洁无瑕之美的绝对观念最后一次从否定的坟墓中复苏。”<sup>①</sup> 由于谢林不懂辩证法，因而陷入了烦琐神秘的思维方式。

恩格斯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标志着他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开始。从1842年3月开始，恩格斯成为《莱茵报》的撰稿人。到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9月,他已在《莱茵报》上发表10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继续从理性主义的观点出发,发表了他对政治、法律、自由和国家等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在1842年4月发表的《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一文中,恩格斯批评南德意志自由主义者虽有与实践相结合的优点,但却缺乏明确而彻底的理性基础。不久,在《一个旁听者的日记》中,恩格斯又批判了法的“历史学派”关于国家和法只能从先前的历史中产生的反动主张,坚持认为彻底摆脱中世纪历史的羁绊是普鲁士国家获得发展的先决条件。1842年5月,恩格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时文评注》一文,标志着他和青年德意志的最后决裂。7月,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题为《评亚历山大·荣格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的文章,进一步批评青年德意志的哲学和政治观点。这一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是9月恩格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集权和自由》一文。在该文中,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显示了“自由主义”的虚弱本质。“国家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绝对自由的实现……而仅仅是客观自由的实现。”<sup>①</sup> 这表明,在国家问题上,恩格斯已远远地超出了黑格尔主义的观点,尽管他还没有完全抛弃抽象自由的观点。

1842年11月下半月,恩格斯动身前往英国,到欧门—恩格斯公司在曼彻斯特的纺纱工厂实习经商。赴英途中,恩格斯访问了科伦的《莱茵报》编辑部,和马克思初次见面。在英国,恩格斯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五篇文章。这些文章反映出恩格斯的思想已开始向着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逐渐认识到经济因素在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德法年鉴》时期,恩格斯也完成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并开始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已经超越了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的经济理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7页。

## 第二节 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宣言

### 1.《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构成

1840年至1842年期间,蒲鲁东就所有权问题发表了三篇论文。在1840年6月问世的第一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什么是所有权”的问题。其回答是:“所有权就是盗窃。”这一公式并非蒲鲁东的发明,而是他从布里索那里抄袭过来的。蒲鲁东自己却认为这个原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他说:“财产就是盗窃!几千年来还没有人使用过这样两个字。除了这个关于财产的定义以外,我在世间别无其他的财产;不过,我把它看得比罗斯采尔德的几百万家产还要宝贵,而且我敢说,这个定义的提出将是路易·菲力浦治下意义最重大的事件。”<sup>①</sup> 1841年4月1日,蒲鲁东在巴黎以致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的信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所有权的第二篇论文。后收入《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重印本中。

蒲鲁东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后,遭到了他的“那些社会和政治科学的赞助人怒斥。”多亏了当时蒲鲁东还未曾相识的布朗基先生在同事、大臣面前为其辩护,蒲鲁东才免遭牢狱之苦。早在1840年8月29日,布朗基关于蒲鲁东论文向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提出的报告上就写有这样的结论:“简言之,我们曾经注意地阅读了这本使人产生一种激动的好奇心的著作。根据它的哲学研究、它的措辞和它的逻辑,如果它不是专向一些有高度智慧的人或有文化修养的人提出的话,那么我们看来就好像具有危险性了。看到把这样高深的学问用来发挥这类怪僻的理论是可悲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虽然这篇著作具有科学上的价值,但我们不能对它所申论的内

---

<sup>①</sup>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57页。



容表示同意。”<sup>①</sup>这显然是一个聪明的结论。

布朗基先生在接到蒲鲁东的第二篇论文——《给布朗基先生的一封信》之后，他在给蒲鲁东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所有权就是盗窃！这是一个多么生硬的命题。倘使您坚决要保持它的那种简单直率的笔调，那么这个命题就甚至会使那些不根据外表下判断的严正的人也厌恶您那本著作的。但如果您已使形式趋于温和，您依然可以忠实地说明您的学说的实质；并且虽然承您建议要我分任提倡这种危险理论的工作，我也不能接受这种协作，因为就才华方面来说，这种协作的确对我是个光荣，可是在其他一切方面，它都会使我受到牵累。”布朗基坦率地写道：“只有在一件事情上，我的意见和您一致；这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类的所有权被滥用的情况实在太多。但我不能从滥用所有权作出废除所有权的结论，这个猛药和可以治愈一切病害的死亡太相像了。我还愿意更进一步。我愿意坦白说，在所有的弊端中，我认为最可恨的就是所有权的流弊；但是再重复一遍，有一种救药可以医治这个祸害而不必对它实施强暴，尤其是不必加以消灭。”<sup>②</sup>蒲鲁东后来在给马克思的一封回信中，明确表示要“用火把私产烧掉”。

布朗基先生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您发表了两篇卓越的宣言，第二篇比第一篇较为慎重；如果你写出比第二篇更加慎重的第三篇文章来，您就会在科学界占据崇高的地位，而科学的首要要求则是沉着和大公无私。”<sup>③</sup>1842年，蒲鲁东写出了第三篇论文，《对产业主的警告或就保卫财产的问题致〈法朗吉〉主编孔西得朗先生的一封信》。信中对协会学派的首领维克多·孔西得朗的攻击进行了反驳。根据马克西姆·勒鲁瓦的观点，蒲鲁东在这几篇论文中集中思考了如何建立正义和平等，以便把过去的一系列革命进行下

①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1页。

②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33页。

③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5页。

去。《圣经》中确立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16世纪和17世纪确立了在知识和理性面前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在经济事实面前确立人人平等，蒲鲁东必然要宣布可能导致垄断的所有权为盗窃。

## 2. 蒲鲁东著作对马克思的影响

1842年10月至1843年初，马克思研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卡贝、德萨米、比勒鲁、孔西得朗、蒲鲁东等人的著作。1842年11月，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初识恩格斯。恩格斯也几乎在同一时期阅读了蒲鲁东的著作。此时，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在欧洲读者群中形成一股强烈的冲击波。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称蒲鲁东的著作为智慧之作。他说：“‘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之作（das scharfsinnige Werk），则断不可据浅薄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经过透彻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sup>①</sup>《奥格斯堡报》第284号称“《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频送秋波的妇人。”马克思在反驳“奥格斯堡长舌妇”时指出，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空想的性质，但在批判这些空想家的著作，尤其是蒲鲁东的著作时，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甚至要到柏拉图那里去寻找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马克思在此首次表示要研究和批判蒲鲁东，并且在该文中首次对法国社会主义作出反映。<sup>②</sup>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柏林1981年版，第108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3—134页。

<sup>②</sup>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早期文本》，纽约1972年版，第44页。

1843年9月,马克思在巴黎“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致卢格的信中这样写道:“要对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而且我指的还不是某种想象中的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除了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别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sup>①</sup>不只是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人所主张的那种共产主义没有摆脱其对立面私有制的影响,蒲鲁东的社会主义也没有摆脱私有制的影响,马克思后来在《神圣家族》中对此作了论述。在马克思看来,包括蒲鲁东在内的社会主义的原则还只是涉及到真正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还应把宗教、科学等这些属于人的理论生活的内容也当作批判的对象。与其说用世界应该实现的主观理想来同世界对立,倒不如说应该首先对现存的一切进行彻底的、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还把蒲鲁东与魏特林相比,并认为关于所有权的札记是法国社会主义最优秀的著作。<sup>②</sup>1843年,恩格斯在为《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所撰的《大陆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对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共产主义者用法文写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哲学意义的作品,在所有法文书籍中间,我特别希望能把这本书译成英文。作者在揭露私有制以及这一制度所引起的后果——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上,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

现了非凡智慧和真正科学研究精神,这种把智慧和科学研究精神二者结合在一本书里的范例,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sup>①</sup> 1845年3月,马克思仍把蒲鲁东列入外国杰出社会主义者的行列。<sup>②</sup>

###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蒲鲁东经济学的评价

《1844年手稿》大约写于1844年6月至8月这段时间内。它是马克思运用当时的哲学观点概括其经济研究成果的最初尝试。在《1844年手稿》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利用费尔巴哈的一些主要原则和范畴,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同时又根据政治经济学所确认的事实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要素彻底发挥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从而开辟了通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道路。在这种大的理论背景下,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作出了评价。

评蒲鲁东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无产者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而“细节上的改良主义者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sup>③</sup> 马克思这里讲的是蒲鲁东为了确保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平等并排除资本主义的发展,想把产品的交换限制在一般的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定额上。蒲鲁东认为:“只要劳动者联合起来,他们就是平等的;如果一个人所得的报酬比另一人多,就会引起矛盾。因为,既然只能用一个劳动者的产品来偿付另一个劳动者的产品,如果两个人的产量不相等的话,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3~5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那么较多的产品与较少的产品之间的余数或差额,就不归社会所得;因而它既然不被交换,也就不会妨碍工资的平等。”<sup>①</sup> 这表明蒲鲁东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家。马克思指出:“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同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sup>②</sup> 这是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在论述资本主义关系基础上的“平等”观时所持的基本观点。“工资的平等”既暴露了蒲鲁东仍然视劳动为一种谋生活动,又暴露其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想。

关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矛盾关系。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私有财产的结论。”<sup>③</sup> 国民经济学家倒果为因,认为“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而实际“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外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一旦生成,二者就相互作用。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主张否定所有权,这是他高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处,因为“国民经济学家只不过是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异化的核心不在于作为固定范畴的所有权。蒲鲁东用工人对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来代替所有权,劳动的异化仍然无法扬弃,因为商品生产关系仍然是基础,交换价值仍然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惟一调节者。正如马克思后来在《神圣家族》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蒲鲁东只是在异化的范围内克服异化,换言之,他根本没有克服异化。

平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马克思说:“平等不过是德国人的公式‘自我 = 自我’译成法国语言即政治语言罢了。平等,作为共产

---

①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4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0 页。

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同德国人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以此来论证共产主义,是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由于政治的原因是平等,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蒲鲁东应该从这一点出发来加以批判和承认。”<sup>①</sup> 马克思肯定了蒲鲁东等法国社会主义者把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政治论据、平等要求扬弃异化的观点。根据蒲鲁东的观点,“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社会、正义和平等是三个相等的名词,三个可以互相解释的用语,它们的互相代替使用是永远合理的。”<sup>②</sup> 蒲鲁东由此得出结论:“用我们的生产品去换取别的生产品,这是一种需要。得到等值的交换,这是一种权利;既然我们先消费,然后才生产,所以,如果事物是由我们来决定的话,那么我们在消费之后,必须立即从事生产,这是一种义务。”<sup>③</sup> 蒲鲁东证明,资本主义所有权是对平等的不断侵犯。因为它想无中生有;那里存在着所有权,那里的生产品的生产成本就会高过它的价值;有了一定的资本,生产是随劳动而不是随所有权发生变化的;它是暴力杀人的行为,暴政的根源;它的存在会使社会自趋灭亡;它否定了平等,它没有反对所有权的力量等等。

蒲鲁东对社会、正义、平等关系的论述以及对所有权的分析,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肯定蒲鲁东的。《1844年手稿》中对此还未作详细的批判。但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他后来具体地阐明了蒲鲁东的批判中所包含的缺陷。马克思指出:“同时,这里也暴露了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9页。

②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6页。

③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3页。

的理想),他们证明,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断言,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他们,例如蒲鲁东,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它们的虚假历史的真正秘诀。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详尽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这些先生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另一方面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而观念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这种现实的映象。”<sup>①</sup> 马克思这里的批判,击中了蒲鲁东社会主义理论的要害。

从总体上来看,《1844年手稿》中对蒲鲁东的评价主要是从社会主义方面,此时的蒲鲁东仍然被马克思视为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1844年手稿》中对蒲鲁东的评价与在《文学总汇报》上和《神圣家族》中对蒲鲁东的评价有密切的联系,本章还要专门论述。

#### 4. 马克思结识蒲鲁东

1844年下半年,马克思在巴黎结识了蒲鲁东。蒲鲁东居住在巴黎的时期是1844年2月到4月和1844年9月到1845年2月。他主要是同卢格、巴枯宁、格律恩和马克思交往。马克思视蒲鲁东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1~202页。

为当时法国最大的社会主义者。

蒲鲁东常常同马克思就黑格尔哲学展开争论。在此之前,蒲鲁东对黑格尔哲学已有所了解。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在论述所有权的起源时说:“如果平等是社会的必要条件,共产制就是最初的一种奴隶制。”“如果用黑格尔的公式来说明这个思想,我就要说:共产制——社会性的最初表现——是社会发展的第一项,即正题;与共产制相反的私有制是第二项,即反题。当我们已经发现第三项即合题时,我们就可以得到所要求的解答。要知道,这个合题必然是从用反题来纠正正题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必须通过最后一次对于它们两者的特点的研究,来消灭那些与社会性相抵触的特征。两个剩余部分的结合将给予我们人类联合的真正形式。”<sup>①</sup> 蒲鲁东在 1844 年至 1845 年秋冬这段时间,同马克思的关系非常密切。

马克思在给蒲鲁东讲解黑格尔哲学时,主要是向蒲鲁东解释黑格尔哲学的基础——辩证法。马克思在致施韦泽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1844 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掺假’《Sophistication》(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上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sup>②</sup> 蒲鲁东后来的著述表明,他只是学得了黑格尔哲学的词句,而未能真正掌握黑格尔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巴黎与蒲鲁东相识时,二人已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此时的马克思正处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前夜。已经表现

①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7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0~31 页。



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并提出以共产主义社会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要求,这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而蒲鲁东却和马克思相反,他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利益的保卫者,并不想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幻想对资产阶级社会加以改良,实质上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蒲鲁东力图使现存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去适应中等阶层的需要,以便使中等阶级既不被大资本所消灭又不致无产阶级化。在蒲鲁东看来,“在私有制或共产制以外,谁也没有认为可能有其他的社会。私有制的所以存在,正是由于这个永远是可悲的谬误。共产制的缺点是这样的明显,以致那些批评家为了使人们厌恶它,从来也不必施展很多的辩才。”<sup>①</sup>他还认为:“共产制是不平等的,但这和私有制的不平等的意义是相反的。私有制是强者剥削弱者;共产制是弱者剥削强者。”<sup>②</sup>由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理论基点各异,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在哲学上的争论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就预示着后来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与蒲鲁东的公开彻底决裂。

### 第三节 马克思对《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分析

#### 1. 从《文学总汇报》到《神圣家族》

马克思《神圣家族》第四章第四节中的“蒲鲁东”部分,最初刊载于1844年4月出版的《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 - Zeitung)第5期上。5个月后,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

《文学总汇报》是青年黑格尔派布·鲍威尔主编的德文月刊,于1843年12月至1844年10月在沙洛顿堡发行。德国思辨唯心主

<sup>①</sup>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70页。

<sup>②</sup>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72页。

义哲学的幻想和滥言在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总汇报》中达到了顶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sup>①</sup> 鲍威尔兄弟对蒲鲁东大加歪曲，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创造出“批判的蒲鲁东”，即“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或“蒲鲁东第一”。马克思对鲍威尔兄弟的恶劣做法进行了批判，并评价了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

## 2. 对《什么是所有权》的一般评价

马克思在分析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时，虽仍以费尔巴哈为出发点，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已被大大地超过了。具体来说，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已开始被关于现实的人的历史考察所代替，而且一度被用来解释历史的异化史观也逐渐被实践的观点所代替。这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马克思科学地评价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理论。

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主旨是批判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说：“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同样，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也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批判。”<sup>②</sup> 由于蒲鲁东的写作动机不同于“批判家”们的写作，所以，“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而比起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的作品来,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sup>①</sup>从经济学的意义而言,“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正如同西哀士的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sup>②</sup>

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重要性,一直是予以肯定的,直到蒲鲁东逝世的1865年,马克思在致施韦泽的信中仍然承认蒲鲁东的有关所有权的著作的重要性:“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划时代的作用……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特性激动了读者,并在初次出版时留下了强烈印象的。”<sup>③</sup>这是21年后马克思对《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评价。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评价的话语有所改变,但马克思对蒲鲁东敢于挑战政治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还是一直予以充分肯定的。

### 3. 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功绩及局限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蒲鲁东首先承认原则的对象的客观性。在驳斥“批判的蒲鲁东”时,马克思指出:“群众的蒲鲁东之所以谴责社会,并不是因为社会尊重这个原则本身,而是因为社会尊重这个由于我们无知而伪造出来的原则……伪造的原则的实质是我们的虚妄观念的结果,而这个原则的对象(objet)却是真实的,这正象炼金术和占星术的实质是我们臆想的结果,而它们的对象(天体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29页。

行和物体的化学属性)却是真实的一样。”<sup>①</sup> 在对待私有制的态度方面,蒲鲁东超过了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以往的经济学家把私有制当作既定的事实,“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sup>②</sup> 由于批判的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得出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而蒲鲁东则得出否定私有制的结论。蒲鲁东的批判,“对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sup>③</sup> 根据贫穷和所有权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蒲鲁东要求废除所有权,以便消灭贫困。

蒲鲁东使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进入了一种自觉状态。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视私有制为合乎人性和合乎理性的关系,结果不断地与自己的基本前提即私有制发生矛盾,如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关系的矛盾、价值与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益的矛盾、工资的数额与自由的矛盾等。马克思说:“有时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揭露这些矛盾成了他们之间的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攻击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某些个别形式斥责为本来合理的(即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业的伪造者。”<sup>④</sup> 斯密、特拉西和西斯蒙第就是这些政治经济学家的代表。尽管他们感觉到了矛盾,但又总是不自觉地在矛盾中徘徊。而“蒲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认真地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待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并把它和经济关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因此,蒲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澈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sup>①</sup>显然,在蒲鲁东那里,私有制的实质问题被视为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的根本问题。

在规定劳动时间问题上,蒲鲁东恢复了主体的地位。劳动时间与生产费用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某物的生产费用意味着它价值几何。在生产费用的构成方面,经济学家们常常把劳动时间、劳动材料、地租、利息、利润视为其内容。而根据蒲鲁东,生产费用应由劳动时间和预支费用构成。马克思说:“蒲鲁东既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量度,因而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旧政治经济学中决定性的因素则是资本和地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蒲鲁东恢复了人的权利,虽然还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因而也是矛盾的形式来恢复的。”<sup>②</sup>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蒲鲁东尚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还没有把私有制的各种进一步的形式看作私有制的形式。具体说来,他还没有把工资、商业、价格、货币等看作是私有制的各种进一步的形式,而是用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来反驳经济学家。马克思认为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超越了蒲鲁东的批判,因为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分析,恩格斯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私有制关系是反人类的、非人道的;二是正是由于这些关系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革命。再者,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前提的支配。马克思肯定了蒲鲁东视不拥有为最重要的思考对象是正确的。不拥有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人的最完全的非现实,是人完全脱离了他的实物性,是极其实实际的拥有,如饥饿、寒冷、疾病、罪恶、屈辱、愚钝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和违反自然现象的拥有。“蒲鲁东想消灭不拥有和拥有的旧形式的愿望,和他想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想消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经济表现的愿望是完全同一的。但是,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物世界的重新争得。”<sup>①</sup>这表明蒲鲁东并非是以拥有来反对不拥有,而是以占有来反对拥有的旧形式,即私有制。占有作为社会的职能,其中的利益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发挥出来。显然,蒲鲁东是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

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这是马克思在评价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时所加以论述的一个重要思想。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二者由私有制世界产生并构成一个统一体。富有即有产阶级。有产阶级是统一体的肯定方面,而无产阶级是统一体的否定方面。马克思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显然,在对立统一体中,有产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sup>②</sup>当然,这不是无条件的,其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无产阶级最终解放是消灭私有制和自身。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体并不是神。恰恰在于无产阶级在私有制条件下自身“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观”；无产阶级在理论上意识到了在自己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贫困迫使无产阶级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sup>①</sup>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为明显地预示着无产阶级的目的及其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初次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之后，又一次清楚地论述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状况及其革命任务。马克思就统一体内部的对立所作的论述已远远超越了黑格尔式的思辨，思辨的唯心主义成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马克思紧紧围绕社会历史、现实的个人展开辩证的论述。

#### 第四节 马克思邀请蒲鲁东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 1.《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一书中的系列辩证法

1843年，蒲鲁东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论人类秩序的建立》(De la création de l'ordre dans l'humanit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该书有所论及。蒲鲁东在这本书中试图通过改造傅立叶的“系列方法”而建立一门综合的社会科学。该书是蒲鲁东的一部哲学著作。他自称书中包含着“新的、有益的、并非德国的形而上学”。他在1843年11月23日给阿克尔曼的信里谈及该书时这样写道：“我在第三章中分析了范畴并解决了著名的实在性问题。该书是我的全部著作中最具特色、最新和最基本的，并且是无懈可击的。但愿这一部分将在哲学领域掀起的革命胜于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sup>②</sup>

蒲鲁东的新的形而上学融入了实证主义的一些内容。他显然是吸收了实证主义认识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实证主义者孔德认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② 《蒲鲁东通信集》第2卷，巴黎1860年版，第89页。

自己“发现了一条伟大的根本定律”，这就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sup>①</sup>这三个阶段也可以由个人智力的发展得到证明。他说：“我们每一个人追忆自己的历史时，岂不是记得自己在主要的看法方面，曾经相继地经过三个阶段，在童年时期是神学家，在青年时期是形而上学家，在壮年时期是物理学家吗？”<sup>②</sup>蒲鲁东则根据实证主义者孔德的三个阶段说提出了宗教阶段、哲学阶段和科学阶段。蒲鲁东说：“论断意味着按系列分配。不能归入正确系列的判断是错误的判断、诡辩主义。但为了开辟系列的理论（théorie sérielle），人类的智慧必须经过我们在科学演进过程中所看到的三个时期：宗教、哲学和科学时期。”<sup>③</sup>

在科学时期，人类“按系列分配”的能力达到完善的地步。系列既为认识的方法又为存在的原则。自然界的系列与人类活动中的系列存在差异。蒲鲁东说：“在自然界中，系列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但当人出现并视自己为自然界的主人时，便借助系列的换置而于创造本身的内部进行第二次创造。人工系列的益处是无庸置疑的……当人工系列否定自然系列之助并想取代其作用时，人工系列就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sup>④</sup>蒲鲁东又从系列推出平等。这表明他的“新的形而上学”构成了他的“平等要求”的哲学根据。事实上，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正是根据系列的方法建立起来的。他在两年后出版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真正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时，曾对蒲鲁东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一书中的系列辩证法

①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25 页。

②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27 页。

③ 蒲鲁东：《论人类秩序的建立》，巴黎 1927 年版，第 170 页。

④ 蒲鲁东：《论人类秩序的建立》，巴黎 1927 年版，第 177 页。



作过评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对于唯物史观的发现,并且第一次做了系统的阐述。这标志着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诞生。马克思已站在全新的高度来评价蒲鲁东的方法。在他看来,“蒲鲁东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这一著作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 *dialectique sérielle* [系列辩证法],即试图提供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将以思维的过程来代替各个单独的思想。蒲鲁东从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寻求实际上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辩证法。因此,同黑格尔的密切关系在这里是实在的,而不是幻想的类似。所以,对于已经批评过黑格尔辩证法的人来说,要批评蒲鲁东的辩证法是不难的。”<sup>①</sup> 马克思非常重视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不同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认为“蒲鲁东及其整个的 *dialectique sérielle* [系列辩证法]只不过是假装学者”的看法。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关系作了透切的分析。不过蒲鲁东在其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是康德的“二律背反”的方法,蒲鲁东自认为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最重要的几节里模仿了康德的“二律背反”。在《贫困的哲学》中,当蒲鲁东试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体系时,他以黑格尔的矛盾作为发展的手段取代了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

在《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中,蒲鲁东自认为实现了形而上学的革命。但他还是被人们指责为滥用康德的“二律背反”,正如他后来被马克思指责滥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在蒲鲁东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出版两年后的 1845 年,麦克斯·施蒂纳出版了他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利己主义经典之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施蒂纳不赞成《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中的道德主义。蒲鲁东则称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627 页。

蒂纳的这本书为“学生习作的摘要”或“无知者习作的摘要。”<sup>①</sup>

## 2. 马克思写给蒲鲁东的一封信

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以便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为建立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准备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共产主义时这样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sup>②</sup> 他们为了在伦敦、巴黎和德国各地成立通讯委员会，努力动员欧洲各国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在伦敦曾经成立了通讯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以及以沙佩尔为首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成员。在德国，通讯委员会与工人保持联系。科伦的共产主义者与马克思恩格斯保持经常的通讯。马克思恩格斯打算动员卡贝、蒲鲁东和其他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尽管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理论上与蒲鲁东的分歧，但他认为同蒲鲁东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范围内的合作，有可能促使蒲鲁东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超出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于是，1846年5月5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给在巴黎的蒲鲁东去了一封信，邀请他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里将马克思的这封信全文引出：

“亲爱的蒲鲁东：

我自离开巴黎以来，就常常想给您写信；但是，一些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使我一直耽搁到现在。请您相信我，我没有

---

<sup>①</sup> 亨利·德·卢帕西：《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研究》，纽约1948年版，第8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

写信的惟一原因,就是事务繁忙,同时由于搬家引起了一些麻烦等等。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谈正事!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菲利浦·日果(他们两人都在布鲁塞尔)一起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活动,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在德国,人们可以用这种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在行动的时刻,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对外国情况了解得像本国情况一样清楚。

除了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以外,住在巴黎和伦敦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将参加我们的通讯活动。我们已经同英国建立了联系;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您知道,到目前为止,英国人和德国人比您自己的同胞更看重您。

总之,您可以看到,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末,不论寄给您的信件还是您寄给我们的信件,邮资全由我们这里支付。在德国进行的募捐本来就是为了支付通讯费的。

来信请寄本市博登布罗克街8号菲利浦·日果先生。从布鲁塞尔发出的信件也将由他署名。

这全部通讯活动您要绝对保守秘密,这是我无须再告诉您的;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行事,才不至于发生危

险。

请马上给我们答复,并请相信我对您的非常真诚的友谊。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又及:我希望您提防一下巴黎的格律恩先生。他无非是一个文字冒险家,一个妄想利用现代思想从中取利的骗子手。他企图用傲慢和狂妄的词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空话连篇只不过使他自己成了笑柄。除此以外,这个人很危险。他靠着自己的厚颜无耻去同一些有名的作者结识,他就滥用这种关系,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垫脚石,从而使这些作者在德国读者的眼中丧失威信。他在他的一本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书里,就胆敢自称为蒲鲁东的老师(讲师——德国的一种学位),他妄称,他把德国科学最重要的原理传授给了蒲鲁东,并且对蒲鲁东的著作加以讥讽。您要留神这个寄生虫。以后我也许还会再次谈到这个家伙。”<sup>①</sup>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他们之间的友谊依然存在。马克思在信中,主要向蒲鲁东说明通讯活动的目的、邀请蒲鲁东作为法国的代表参加通讯委员会以及提醒蒲鲁东注意格律恩这个骗子手。

在马克思的这封信里还有恩格斯的附笔。恩格斯在附笔中这样写道:

“至于我,我只能表示希望,您,蒲鲁东先生,一定会接受我们向您提出的建议,并且乐于同意参加我们的活动。

您可以相信,您的著作使我对您怀着深切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sup>②</sup>

显然,恩格斯也是盛情邀请蒲鲁东参加通讯委员会。这里的“您的著作”主要指的是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4~4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6页。

### 3. 蒲鲁东给马克思的回信

1846年5月17日,蒲鲁东给马克思写了一封回信。就马克思建议他参加通讯委员会一事,蒲鲁东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在信中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实际上,蒲鲁东是拒绝参加这一活动的。现把蒲鲁东回信的主要内容引述如下: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我有心同意加入您们的通信(être un des aboutissants),我认为这种通信的目的和组织是十分有用处的。但是我不能答应您们多写或常写: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天生的懒惰使我不能作一个勤勉的通信者。我还冒昧地提出几个附带条件,这是由于您们信里的某些话语而不得不这样的。

首先,虽然我对组织问题和实行问题的看法到目前可以算是完全确定的了,但是我认为我自己以及每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是把批评性的形式或者说疑门(dubitative)的形式再保留一个时期;一句话,我好像公开信奉经济学上的绝对反教条主义。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共同寻找社会的活动规律,寻找实现这些规律的方法,寻找进步程序;对进步程序加以观察,我们就能发现这些规律;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不要在一切教条主义消灭之后又想起使人信奉某种主义(endoctriner le peuple);我们不要陷入您的同国人马丁·路德的矛盾里,他在推翻天主教的神学以后立即借着开除教籍的办法创立了新教徒的神学。整整三个世纪以来德国完全忙于揭掉马丁·路德的这块新泥皮。我们也不要再制造麻烦事,为的是不再给人类添累赘。

我衷心地赞成您的意见——把现有的一切意见都弄清楚;我们要从事光荣而正直的论战;我们要给全世界作出科学的(savante)和预见性的容忍态度的榜样;但是我们在领导运动的时候不要领导新的固执,也不要扮演新宗教的圣徒,尽管这是逻辑的宗教、理性的宗教。我们要接受(Accueillons)并鼓励任何抗议,我们要开始痛斥任何特殊性、任何神秘主义;我们要永远不认为问题已经最后解决,我们要从头做起,在说明理由时要利用一切论据,如

果必要就连神秘主义也利用，并且要运用雄辩和讽刺。照这样的条件我就参加您们的团体，否则我就不参加。

还想谈一下您在信里所用的行动起来的时候这个说法。您可能仍然抱着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出其不意的攻击(*sans un coup de main*)，如果没有早先被称作革命而实际简直是乱动(*secousse*)的那种东西，就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实现。我理解这个看法，我能替它找到辩护的理由，我愿意以后对这个题目加以讨论，我自己也在很长时期里同意过这个看法；但是，老实说，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见完全改变了。我认为，为了取得胜利根本不需要这样，因此我们也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faire rentrer dans la société par une combinaison économique les richesses, qui sont sorties de la société par une autre combinaison économique.)

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以便产生您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们称之为共产主义(*la communauté*)而我在目下只称之为(*je me bornerai à appeler*)自由、平等的那种东西。我想，我懂得在短时期内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据我看来，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我的即将问世的一部著作(正在印刷中)将会使您详细地认识到我的观点。

亲爱的哲学家，目前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希望它不是错误的(*sauf à me tromper*)，如果您要责打我(*s'il y a lieu à recevoir la fessée de votre main*)，我是要报复的。同时，法国工人阶级的心情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无产者渴望着科学的知识，他们对于劝他们只去喝血

(n'a boire que du sang)的人们会给予十分不好的对待……”<sup>①</sup>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蒲鲁东反对教条主义和暴力革命。当然,蒲鲁东不是一般地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他在向马克思所提出的附加条件中把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宣传与教条主义混为一谈,还暗示马克思不要成为德国的马丁·路德的重蹈覆辙者,不要像路德那样以新教神学代替天主教神学。而革命在蒲鲁东心目中成了“诉诸强力、诉诸横暴”,他以“自由、平等”代替共产主义。因此,蒲鲁东认为“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封信表明,蒲鲁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决不可能通过交换意见的办法来产生出统一的革命理论。蒲鲁东有条件地同意参加通讯委员会,旨在通过一个辩论的场所,用小资产者所喜欢的革命词句把空气振动起来。无产阶级思想上的团结就是“强使人民信奉共产主义”。而马克思旨在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认清它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着和斗争着以及这种斗争必然和将会得到什么结果。这封信使马克思相信,把地位和无产阶级接近的蒲鲁东吸收到共产主义组织方面来已经不可能了,必须从理论上批判这位在法国颇具影响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出版,为马克思提供了这一契机。

---

<sup>①</sup>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说史》第3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17~219页。

## 第三章

# 马克思与蒲鲁东的首次公开论战

从 1846 年 6 月至 1848 年 2 月,这是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史上的第二个时期。《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与蒲鲁东的首次公开论战。在论战中,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初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政治经济学。本章着重研究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决裂。

### 第一节 与蒲鲁东论战的序幕

#### 1.《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出版

1846 年 10 月 15 日,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一书在巴黎出版,共两卷。该书就是蒲鲁东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所说的“正在印刷中”的那部书。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是在他的《什么是所有权》这部著作于 1840 年问世之后为解答他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结果。

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共由 14 章组成,分别具体论述了经济学、价值、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和捐税、人和上帝在矛盾规律下的责任、贸易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人口、概述和结论。蒲鲁东按照自己的主观设想来排列经济范畴的发展顺序,并



根据这种顺序把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十个阶段：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捐税、贸易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和人口。蒲鲁东批判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是乌托邦主义者，谴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他论证道，现存的经济制度由于其自身内部的矛盾必然会产生剥削和穷困。这样一些矛盾不能够通过点滴的改革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创造一个更高的合题——互助主义——来解决。蒲鲁东在后来出版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中提供了这一互助主义选择的最为详细的方案。

1847年，格律恩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Philosophie der Staatsökonomie oder Nothwendigkeit des Elends, 中译为《政治经济学的哲学, 或贫困的必然性》), 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广为传播, 并由于格律恩的大肆渲染, 在工人阶级中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首先感到这种混乱的是恩格斯。

## 2. 恩格斯在巴黎揭开与蒲鲁东论战的序幕

在蒲鲁东的著作于1846年底出版之前,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就于巴黎在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人中散布该书中的思想。这表明蒲鲁东的观点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严重障碍, 批判蒲鲁东已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当务之急。于是, 首先由恩格斯在巴黎揭开了与蒲鲁东论战的序幕。列宁曾这样写道: “他(恩格斯——引者注)主要注意的是最重要的和当时最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 即蒲鲁东主义。早在蒲鲁东所著‘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以前(该书出版于1846年10月, 而马克思的答复, ——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问世于1847年), 恩格斯就对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所竭力鼓吹的蒲鲁东那些根本思想, 作了严酷无情的和异常深刻的批判。恩格斯的英语非常好(马克思学习英语比恩格斯晚得多), 英国都很熟悉, 这使他能够(1846年9月16日的信)指出标榜一时的蒲鲁东的‘劳动市场’在英国遭到破产的例证。蒲鲁东玷污了社会主义, ——恩格斯愤慨地说道, ——

因为照蒲鲁东的说法,工人应该赎回资本!”<sup>①</sup>

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主要反映在其 1846 年 9、10 月间的几封书信中。第一封信是恩格斯 1846 年 9 月 16 日于巴黎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恩格斯在信中向委员会汇报了巴黎工人的思想状况,即在当时的巴黎已经出现了“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恩格斯在信中写道:

“现在讲一件滑稽的事。蒲鲁东在一本还没付印的新书里(该书由格律恩翻译),想出了一个妙方,能够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格律恩也严守秘密,但却极力吹嘘他知道了一块新的点金石。大家都在紧张地期待着。终于,上星期艾泽曼老爷子来到了木工中间,这时我也在座,渐渐地,这个装模作样的老家伙带着天真而神秘的神情全盘泄露了出来。格律恩先生信任地把全部计划告诉过他。现在请听听这个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是些什么吧:这是不折不扣的在英国早已就尽人皆知并且破产了十次的 labour-bazars,或者是 labour-markets,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大货栈;在那里,由协作社社员提供的全部产品都严格按照原料费用加上劳动费用来议价,并用协作社的以同样方式议价的其他产品来支付。超出协作社需要量的那部分产品,就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收入付给生产者。狡猾的蒲鲁东发议论说,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协作社的其他社员,就可以废除中间商人所得到的利润了。可是这位大聪明人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连他的协作社的资本的利润也废除了,这种资本及其利润同被他废除了的中间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恰好是一般多,因此,他用左手得到的东西,又用右手抛出去了。他也完全忘记了:他的工人根本筹集不了足够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在协作社所能提供的费用上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61 页。

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完全排斥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生产者不分享资产者的利润，却不能不承担资产者的亏损；——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自然产生的异议，他由于沉醉于他那自以为是的幻想中，都完全忘记了。这一套真是可笑之极！家长格律恩自然是相信这个新的救世办法，他心里已经认为自己领导着有两万工人的协作社了（他们想马上就大规模地干），而且他的整个家族自然将免费得到衣食和住宅。但是，蒲鲁东如果把这一套办法公开出来，他就一定会使自己，使所有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前永远地丢尽脸皮。这也就是他抱怨和攻击革命的原因，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蒲鲁东正好和约翰·瓦茨一模一样。瓦茨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尽管自己相信不可敬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但在资产阶级眼里，却要成为一个可敬的人；蒲鲁东也竭尽全力做到：尽管同经济学家论战，自己却要成为一个公认的大经济学家。宗派分子就是这样。而且这一套又是那样陈旧！”<sup>①</sup>

从这段文字中可知，格律恩在工人中已把蒲鲁东的学说弄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蒲鲁东在一本还没付印的新书里”，指的就是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恩格斯首次对蒲鲁东该书的批判，主要突出以下两点：其一，恩格斯指出蒲鲁东“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只不过是早以破产了的“劳动市场”。英国的欧文在1832年就在伦敦建立过这样的市场，旨在通过“劳动货币”进行劳动产品交换。这只不过是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条件下组织无货币交换的空想，因而很快就破产了。蒲鲁东的协作社的方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生产者保留下来。”这就是蒲鲁东的“新的救世办法”。其二，恩格斯揭露蒲鲁东在给马克思的那封回信中“抱怨和攻击革命的原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8页。

因”，就在于蒲鲁东心里早就“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

第二封信是恩格斯于同年9月18日，在巴黎致布鲁塞尔马克思的信。恩格斯在信中谈到蒲鲁东时这样写道：

“对蒲鲁东，我在那封报告工作的信中讲得确实极不公平。因为上次那封信的篇幅不够，所以我必须在这封信里加以纠正。我原来以为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荒唐事，常理范围内的荒唐事。昨天这件事又一次提出来详细讨论，我才弄清楚，这一新的荒唐事的确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你想想看：要无产者积储小额的股份。用这些小额股份（在少于一万到两万工人的情况下，自然是绝不可能着手办的）首先在一种或几种行业里设立一个或几个作坊，让一部分股东在那里工作；产品（1）一部分以原料加劳动的价格卖给股东（这样他们就不要支付利润了），而（2）可能剩余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公司的资本一旦因新股东的加入或老股东的新储金而增加起来，这笔资本就用来设立新的作坊和工厂，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的无产者都有工作做，国内所有的生产力都被收买过来，从而资产者手中的资本就丧失其支配劳动和获取利润的权力！这样一来，资本就被废除了，因为‘找到了一种制度，使资本即利息的来源可以说是消失了’（这是古老的归公法的翻新，不过阐述得稍为详细一些罢了）。在艾泽曼老爷子重复过无数次、显然是由格律恩灌输给他的这些词句里，你会看出蒲鲁东原来的花言巧语在里面清晰地闪现出来。”<sup>①</sup>

恩格斯在写这封信时仍未读到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这里所谈的蒲鲁东的思想是经过格律恩转述的。信中所谈到的艾泽曼是个木工，他是格律恩的拥护者。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小额的股分”的理论作了这样的评价：“用无产阶级的储金并通过他们放弃他们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和利息的办法，暂时购买整个法国，以后也许还要购买其余的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

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么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而这里工人中的一些愚蠢的青年(我指的是德国人)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们口袋里连晚上在酒铺聚会喝酒用的六个苏都没有,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来购买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sup>①</sup>

第三封是恩格斯同年10月23日于巴黎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恩格斯在信中写道:“蒲鲁东的协作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sup>②</sup>可见,恩格斯同蒲鲁东主义者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恩格斯在与他们辩论时,坚持暴力革命、共产主义。自称是为了人类的幸福的蒲鲁东主义者竟连什么是共产主义也不知道。恩格斯当即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共产主义“用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尊敬的态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sup>③</sup>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旨在维护无产者的利益、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坚持暴力革命,从而在工人中澄清了由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所引起的思想混乱。格律恩连同其蒲鲁东的协作社遭到失败。

### 3.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与蒲鲁东论战的倾向性

马克思从恩格斯1846年9月16日和18日、10月23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以及给他本人的信中,得知了恩格斯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页。

巴黎同那些蒲鲁东主义者斗争的第一手材料,以及恩格斯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初步批判。12月下旬,马克思从书商那里拿到《贫困的哲学》这本书,就立即着手进行批判。由于俄国文学家巴·瓦·安年柯夫曾写信问过马克思对于蒲鲁东这部著作的意见,马克思在12月28日给他的回信中,扼要地概述了对《贫困的哲学》的原则性批评意见。这实即马克思著述《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纲要。由于蒲鲁东不懂德文,为了更好地同蒲鲁东作斗争,以肃清蒲鲁东主义在法国工人群众中的影响,马克思是用法文写作《哲学的贫困》的。1847年7月初,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哲学的贫困》的写作和发表,主要是把社会主义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首次与蒲鲁东公开论战的著作。该著作由两章构成:科学的发现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书中用语犀利,近乎严酷。马克思后来也承认,由于对《贫困的哲学》一书采用激烈的批评形式,竟使他和蒲鲁东的友谊永远结束了。奥托·吕尔在《马克思》一书中写道:马克思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旁若无人和俨然自信”。丹尼尔·哈莱维<sup>①</sup>对此也有同感。马克思在逝世的前三年对此作了如下解释:“关于这次同蒲鲁东论战的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蒲鲁东攻击正式得到承认的经济学家,如杜诺瓦耶、布朗基院士和‘经济学家杂志’整个集团,然而这不过是迎合了他们的自尊心,同时,又以粗暴的漫骂抨击那些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而受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

<sup>①</sup> 丹尼尔·哈莱维(1872—1962年),法国历史学家,对尼采和蒲鲁东的著作颇有研究。

这一点的蒲鲁东。”<sup>①</sup>这就否定了马克思与蒲鲁东有感情上的沟壑的说法。

## 第二节 马克思的批判与蒲鲁东的反应

### 1. 经济范畴理论批判

根据蒲鲁东的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即终极的原因。视范畴为纯粹理性的产物,这表明蒲鲁东回到了康德。蒲鲁东的唯心的唯理论必然视经济范畴为“无人身”的理性的产物。因此,创造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则排除了人,而只能是经济范畴。显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蒲鲁东对经济范畴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解释,这说明其对经济关系的一无所知。因此,蒲鲁东只能是沉醉于18世纪经济学鲁滨逊故事的美学假象。蒲鲁东切断经济范畴与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只能导致二元论,对经济范畴作神秘主义的理解只能遮蔽其真正的起源和历史。在马克思看来,“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sup>②</sup>经济范畴实质上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现实关系的抽象,其真实与否取决于这些关系的存在与否。范畴本身决不能成为决定自己真实与否的标准。

蒲鲁东肯定经济范畴的存在,但并不认为其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他反而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外化的产物。换言之,人们是在一定的社会现实生产关系内生产,但这些关系本身并非现实的产物,而只不过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就决定了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是一种教条式的批判。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范畴理论时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页。

的范畴观：首先，经济范畴是历史性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背离社会历史，而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因此，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是对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再者，范畴不是纯粹的道德概念，不是康德式的“善良意志”。生活于一定社会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主体对自身的产物——关系——的表现即抽象。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一切的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sup>①</sup> 这体现了范畴的非永恒性、历史暂时性的特质。

马克思的范畴理论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初理论范式。马克思正是基于对范畴的起源、本质、存在方式以及与历史的关系的科学理解，而展开了对蒲鲁东在范畴理论一些细节方面结论的批判的。

蒲鲁东的错误之一，用原则、范畴来铲除现实。诚然，蒲鲁东发现了“原则通过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规律”，并且承认原则、范畴的对象的客观性，试图对对象作出确切、中肯的规定。但蒲鲁东与鲍威尔一样，前者把平等概念看成和“平等”直接矛盾的私有制的创造原则，后者把“无限的自我意识”作为一切论断的基础。用对原则、范畴的批判来取代对现实的批判，早在《贫困的哲学》出版之前，蒲鲁东就一直是这样做的。“因此，德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而法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则力图用平等的原则来达到同样的目的。”<sup>②</sup> 显然，蒲鲁东重蹈了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与现实关系的浪漫主义的覆辙。

蒲鲁东的错误之二，反对以劳动来说明财产。蒲鲁东之前的斯密，对劳动一般作了错误的分析，而只看到劳动的消极性一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



而黑格尔则恰恰相反,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性一面。蒲鲁东认为,“劳动”反对资本。劳动导致了对财产的错误解释,以地产为例可见以劳动来解释财产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地产才能真正代表财产。马克思认为,恰恰相反,“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性质。”<sup>①</sup>当然,马克思对劳动的辩证理解并不能成为后来卢卡奇把劳动置于生产概念之上的根据。

蒲鲁东的错误之三,机器是经济范畴。蒲鲁东依次列出十个经济范畴: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捐税、贸易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和人口。在论述分工时,蒲鲁东只不过是在重复斯密的老话。既不懂得机器产生历史,更不懂得机器发展历史的蒲鲁东,把机器的产生看做一般分工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蒲鲁东视机器为经济范畴是极端荒诞的。马克思指出:“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sup>②</sup>并且,在机器的运用中并不是如蒲鲁东所言,是人们的复原或权利的恢复,而恰恰相反,由于机器的使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在扩大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使人进一步被分割。历史证明:英国的几乎一切信贸机关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十八世纪初就已被发展起来了。

## 2. 价值理论批判

在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价值理论构成其重要的内容。这主要是由交换价值和构成价值组成。在蒲鲁东那里,交换价值是经济结构的基石,构成价值则是经济矛盾体系的基石。马克思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164页。

从历史和逻辑方面,详细地批判了蒲鲁东的价值理论。

马克思首先批判了蒲鲁东关于交换价值起源的理论。根据蒲鲁东,在使用价值如何变成交换价值问题上,经济学家们并未很好地阐述交换价值观念的起源。“由于我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产我所缺少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sup>①</sup>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论述把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神秘化了。蒲鲁东论证交换价值的起源,但他一开始却假定了交换价值的存在。由于个人具有多种多样的需要,即需要许多东西,这就必须生产许多东西。而这就意味着许多人进行生产。生产又是建立在分工之上的,显然是需要决定分工。既假定有分工,就是假定有交换存在,也就是说:“我有许多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需要。蒲鲁东先生既然假定有这些需要,因而也就是假定有交换和交换价值存在。”<sup>②</sup> 当然,蒲鲁东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马克思的逻辑分析揭示了这一点。

蒲鲁东用“分工”来说明交换价值的起源,表明其非历史主义的矛盾。根据蒲鲁东的观点,“个人”开始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建立交换,并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马克思批驳道,蒲鲁东并没有论述这个建议的“起源”,未说明这位鲁滨逊式的、与社会隔绝的孤独的个人为何会突然想到向“他的合作者”提出这种建议,以及这些合作者又如何会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可见,蒲鲁东并未细究这些关系,只是给交换盖上了历史的印记。实际上,这是蔑视“历史主义的叙述方法”的蒲鲁东所采用的“非历史主义的叙述方法”。马克思认为,交换有其自身的历史。它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世纪,交换的只是

①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

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产品。第二个阶段是“二次方的交换价值”。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第三个阶段是“三次方的交换价值”。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都成了交换价值。换言之，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

对蒲鲁东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理论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价值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蒲鲁东看来，“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地阐明了价值的二重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同样明确地阐明价值矛盾的本性。”蒲鲁东所要弄清楚的秘密，“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之前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揭示了这一秘密。西斯蒙弟的主要学说就是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上。罗德戴尔的体系就是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反比例之上，而且该理论在李嘉图时代非常流行。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脱离需求谈“多”与“少”。蒲鲁东认为产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产品的多少。“因此，按这一原则彻底推究下去，就可以得出世界上最合逻辑的结论：凡属日用必需而数量又是无穷的东西就一钱不值，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但是最困难的是，实际不会容许有这两种极端。”<sup>①</sup> 在马克思看来，“产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产品的多少，不过这总是对需求而言的。”<sup>②</sup> 蒲鲁东的错误在于撇开了需求。实际上，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有需求的条件下，才谈得上多或少。置这一点于不顾的蒲鲁东，必然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谈，而既不能在稀少和交换价值中发现使用价值，又不能在众多和使用价值中发现交换价值。当蒲鲁东发现实际不会有他所设想的极端存在时，只得求助于秘密。而撇开需求者的蒲鲁东永远找不到购买者。蒲鲁东的

---

①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巴黎1846年版，第39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页。

错误还在于视众多为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这表明“他完全忘记了正是人创造了这种众多，忘记了决不忽略需求是符合人的利益的。”<sup>①</sup> 实际上，要提高有用之物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就必须限制其众多并减少其生产。马克思用商业史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时代以前的法国种植葡萄者要求通过立法以禁止开辟新的葡萄园，荷兰人烧毁亚洲的香料和铲除摩鹿加群岛的丁香树。这些都是以减少众多来提高交换价值。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蒲鲁东视“东西”有“众多”与“稀少”之分，“众多”=“使用价值”，“稀少”=“交换价值”，从而也就使“使用价值”=“供给”，“交换价值”=“需求”。蒲鲁东进而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来代替“交换价值”。这样一来，“效用”就代替了“使用价值”和“供给”，“意见”代替了“交换价值”和“需求”，“效用”和“意见”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之间的共同点即为“决定的自由”。蒲鲁东认为，“我作为自由的购买者，我就是我的裁判。是物品适用与否的裁判，是对这个物品愿意出多少价格的裁判。另一方面，你作为自由的生产者，那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资料的主人，因此，你能够缩减你的费用。”可见，“决定的自由”体现为“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由于需求=交换价值=意见，“已经证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只要自由意志存在，怎么能解决这个对立呢？不牺牲人，怎么能牺牲自由意志呢？”<sup>②</sup> 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上述观点展开了如下的批判：首先，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把供给和需求概念化的错误，系统地阐述了供给和需求的理论。供给并非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见。供给者也需求某种产品或代表一切产品符号的货币，需求者也同样供给某种产品或代表一切产品符号的货币。需求的辩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页。

<sup>②</sup>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巴黎1846年版，第41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4页。

证法是：“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因此，蒲鲁东先生随便把供给和效用、需求和意见混为一谈的那种对照，不过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sup>①</sup>实际上，供给和需求实即某种生产关系。而蒲鲁东的辩证法就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求和供给。在他那里，孤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

再者，马克思以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主体为基础，科学地阐明生产、交换和交换价值的过程，批判蒲鲁东把自由购买者和自由生产者之间的斗争建立在抽象的概念基础之上。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是两种不可比的量，二者之间的“斗争不是发生在效用和意见之间，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需求的交换价值和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产品的交换价值每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sup>②</sup>在现实世界里，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同样也构成了购买者和出售者之间的斗争的必然要素。交换价值的实现正是由上述这些斗争因素促成的。至于供给的产品，它既是交换手段，又是交换价值。供给的产品本来没有效用，其效用是由消费者确定的，而产品又不仅仅代表效用，在生产过程中，它和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换。生产者心目中的产品代表交换价值的某种总和。生产者所供应的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掌握一定的交换手段构成有效需要的基础，作为交换手段的产品也是交换价值。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在供给和需求中，一方面发现过花费过交换价值的产品和出卖这种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发现花费过交换价值的资金和购买的愿望。

马克思还批判了蒲鲁东的自由意志论，阐明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不自由的。蒲鲁东使对立的自由购买者和自由生产者具有纯形而上学的性质，这就必然视人的自由意志为使用价值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页。

和交换价值对立的原因。实际上,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的意志都是不自由的。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进行生产,生产者不得不出卖,其生产资料不取决于自由意志。生产者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生产,而消费者的意志以其资金和需要为基础。“工人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边这两者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sup>①</sup> 需要受制于直接来自于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状况。对公证人的需要就是以生产发展一定阶段的民法的存在为前提。可见,对于现实的接受绝不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即便具有可选择性,也总是在一定关系中的选择。马克思曾用这样一个例证:“假如作为一个爱尔兰的农民,他只能选择:或者吃马铃薯或者饿死,而在这种选择中,他并不永远是自由的。”<sup>②</sup> 萨特的绝对自由的幻想只存在于思辨的想象之中。

### 3. 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得到的两点启示

人类的经济生活始终是人类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层面。社会的经济关系与艺术、宗教、法律等文化关系的纵横交织现象使得人们对自身的社会存在的把握更加困难。因此,拜物教,如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不会轻易游离于社会之外,而其恰恰是社会本身的产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在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所阐述的理论思路,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把握社会现实的大方法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培植和发展资本的背景下,我们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批判中所受到的启迪主要表现在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深入思考。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6~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5~356页。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可控性与盲目性。社会并非由个人所组成,亦即单纯的个人不是构成社会的元素。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的集合才为社会的真正内容,社会历史本身正是无数的理性的、有目的的个体在一系列互动关系中的合力所形成的现实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理性的社会作用的同时,并不排斥非理性的社会功用。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对经济范畴和价值的理解,击中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唯心主义的要害。蒲鲁东实际上是用玫瑰色来描述社会生活,尽管他猛烈地抨击私有制。历史表明,任何过于理想主义地对待社会经济生活,都只不过是一种虔诚的幻想。我们要完全消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因素、盲目性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可以宏观地加以调控、重组。市场经济中的正面效应和负面因素都要表现出来,我们只能接受,无法作出绝对自由的选择。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无序现象并非恒久不变的存在,正是在无序中不断趋向有序而又不可能完全消灭无序。要完全控制市场,除非把人变成机器。要达到思维与存在的完全统一,这正是蒲鲁东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理性浪漫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偶然性、盲目性、自发性的存在,表明实现经济活动中的可控性、计划性的可能。为此,我们要充分、大胆地借鉴、引用西方经济学的成果,用我们的智慧不断整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之处于最大限度的受控状态。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市场经济是事实判断,而道德属于价值判断。较之经济,道德的文化传统差异更加明显。道德往往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特质。市场经济无法摆脱道德现象,而道德评价也不可能脱离经济根基,任何形而上地谈论道德爬坡或道德滑坡,都只能使问题更加混乱,只有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状态,才能实事求是地作出社会主义道德框架的评估。马克思批判的正是蒲鲁东的康德式的“应当”。这种纯粹的道德温情,至多只不过能产生一丝的心灵慰藉。而人的实物存在,无疑是人本身的存在。可以说,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如果一个人的实

物存在被剥夺了,就意味着他自身亦被剥夺。马克思由此提出私有制问题正是关注生产资料的重要性。这与存在主义只关心人的心理情绪上的体验有天壤之别。

人的生存条件、生活关系等因素是人的最现实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在现实交往中彼此会出现漠然状态。马克思也肯定交换过程中“漠不关心的人”的存在。这里的“漠不关心的人”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价值相等的人是完全平等的人。在交换过程中不是你带着商品来,而是商品带着你来。人们在交换中所关心的是价值,而不是价值以外的道德因素,换言之,关心的是交换价值。抽掉了使用价值的商品实际上表征着交换者。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相互表现为价值相等的人,也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显然,交换者的个体特质并不介入这一过程。这种现象往往诱发人们产生价值判断,人们往往无意识地将事实判断逆转为价值判断。我国现阶段道德问题的争论与此有关。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真正的道德问题与传统的价值取向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作为一种习惯因素,传统往往表现为一种文化意义现象上的道德影像。黑格尔说过,一个人无法超越所处的时代,就像无法超越自己的皮肤一样。对于传统和道德也是如此。市场经济自身的规律,呼唤着与之相契合的道德文化。令人欣慰的是,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可发现挣脱种种束缚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现象正在不断生成。

#### 4. 蒲鲁东对马克思的批判作出的反应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批判,无论在哲学史上还是在经济学史上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蒲鲁东的初衷,他是要作出回答的。因为在《贫困的哲学》正在刷印之中时,蒲鲁东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在该书中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改良主义的观点。如果马克思要批判的话,他是要反驳的。对于蒲鲁东这样一位极具个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也预料到



他可能会进行反驳。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同整个哲学一样,可以概括在方法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们做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解说’。”<sup>①</sup>然而,蒲鲁东生前没有公开撰文反驳马克思的批判。有的学者认为,因蒲鲁东蔑视马克思这个对手,所以未作反驳。这种说法显然难以令人接受,也有悖于蒲鲁东的个性。还有的学者认为,蒲鲁东曾打算作答,但由于他很快忙于更为重要的事情,即1848年革命。<sup>②</sup>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批判实在是太击中要害了,令蒲鲁东难以作出公开的反驳。不过,蒲鲁东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还是作出反应的。

蒲鲁东曾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并作有批注。下面,我们就蒲鲁东的批注作一些论述,从中看看蒲鲁东所作出的具体反应。

关于蒲鲁东的方法。在《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第二章中,马克思具体地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学方法方面,蒲鲁东运用的只是“冒牌的黑格尔词句”,而不是黑格尔辩证法本身。因此,蒲鲁东必然视经济关系为社会现实发展阶段本身。这些阶段在自身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纯粹的理性。针对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这个方法的惟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其他一些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运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页。

② 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伦敦1989年版,导言Ⅶ。

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sup>①</sup> 对于这一段，蒲鲁东这样批注道：“这正是我所说的。请您告诉我，如果需要根据顺序来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您如何去做呢？”<sup>②</sup> 这表明蒲鲁东默认自己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表明了自己是如何去做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地证明了处于发展变化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揭示了这种发展变化的规律；科学地证明了“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理论也从什么地方开始，并且它是“历史过程的真实反映”，不过这种反映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的反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论述方法，说明较抽象的范畴无须利用随它继起的较具体的范畴。

关于蒲鲁东的范畴。由于蒲鲁东错误地理解了黑格尔的方法，他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制度变成了经济学范畴本身。马克思说：“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sup>③</sup> 蒲鲁东在马克思的这句话旁边这样写道：“这是谁告诉您的？您的评语纯粹是恶意中伤。”由于蒲鲁东的“二律背反”的推演失去效用，他的所谓时代的经济矛盾必然成了象征着“互相连结的单个社会”的东西。这样一来，“蒲鲁东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sup>④</sup> 他在《贫困的哲学》中所提出的各时代的“先后”次序自然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关于蒲鲁东对分工的有害结果的论述。蒲鲁东在读马克思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② 《蒲鲁东全集》第1卷，巴黎1923年版，第415～423页。以下所引蒲鲁东的批注，均出自此。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页。

《哲学的贫困》时,仍然坚持自己是论述分工有害性的第一人。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认为由分工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进化。他把分工分为好、坏两个方面。在谈到分工的好的方面即正题时,蒲鲁东说:“从本质上来看,分工是实现条件平等、智力平等的方式。分工通过各种不同的劳务,产生产品的比例与交换的平衡,由此我们打通了走向财富的大道;同样地,它在艺术上与大自然中处处为我们揭露出无限无极的境地,这样引导着我们把我们的动作都理想化了,使我们的灵智具有创造的力量,这就是说,简直就是神明,更神明的智慧在所有劳动者的身上都是永久不能泯灭一触即发的。”<sup>①</sup> 因此,分工构成了经济进化以及智力进步的第一个阶段。但分工也具有坏的方面即反题。蒲鲁东说:“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风开始袭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虽然最后它必定达到每一个智慧的勤劳的人的身上,把他们都改头换面了。进步,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同时,广大群众仍然处在野蛮状态之中,或者更深入了一步。”<sup>②</sup> 于是,蒲鲁东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分工使一部分人发财致富,而使另一部分人遭受贫困。“这便是那种新对抗规律的公式,我们文明社会中最古老的两种病态,就是贵族与无产阶级,病源即起于此:劳动依照它所独有的规律而分工,这个规律也是劳动繁殖的第一个条件,终于否定了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自己毁灭了自己;换一句话说:离开了分工不仅没有进步,没有财富,没有平等,而且它还使工人成为从属,使智力成为无用,使财富有害于人,平等是求而不得的。”<sup>③</sup>

根据蒲鲁东的观点,虽然以前的经济学家指出了分工的两面性,即有害的一面和进步的一面,但对分工的有害一面没有作出充

---

①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9页。

②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9~110页。

③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0页。

分的论证。“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是有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萨伊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sup>①</sup>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批判了蒲鲁东的这一观点。蒲鲁东在读到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这一批判部分时,他在批注中反驳马克思的答辩时仍然坚持,在他之前分工的这两个方面没有弄清楚。蒲鲁东写道:“问题仍然没有得到阐明。”这是近乎于一种无视历史事实的态度。早在萨伊之前的斯密、弗格森就已深刻地论述了分工的有害方面。萨伊对分工有害方面的论述是剽窃了同时代的人勒蒙特。18世纪的弗格森在论述分工的害处时曾这样说过:“我们造成了一个奴隶国家,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自由民。”

### 第三节 《共产党宣言》中对蒲鲁东社会主义理论的定位

#### 1.《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的附录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与《哲学的贫困》属于马克思同一时期的著作,两书的出版相隔半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也是用法文写成的。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组织翻译出版《哲学的贫困》一书致伯恩斯坦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自由贸易》(即《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引者注)是不是也作为附录收进去,请你们酌定。我实

---

<sup>①</sup>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0~111页。

在想不出把这篇东西放在哪里好,我又不认为这篇东西出单行本会起什么作用,——这一点你们能比我作出更好的判断。”<sup>①</sup>恩格斯在一天后写成的《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的结尾处写道:“本版收入下列附录作为补充:(1)1859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第一个,即约翰·格雷提出的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的一段,(2)马克思1848年在布鲁塞尔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译文,这个演说和‘哲学的贫困’属于著者的同一个发展时代。”<sup>②</sup>

经过恩格斯多年的精心组织编排,1885年出版的马克思德文《哲学的贫困》一书有以下内容构成:(1)恩格斯的“序言”,即马克思与洛贝尔图斯;(2)论蒲鲁东(即马克思致施韦泽的信);(3)哲学的贫困;(4)附录:批判约翰·格雷的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认为包林博士自由贸易的演说是“伪善的”,尤尔博士在《工业经济学》中对包林博士作了很好的补充。马克思说:现代社会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就是资本的自由”。这就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sup>③</sup>

## 2.《哲学的贫困》: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在1848年2月于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对蒲鲁东的社会主义作了定位: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谈到构成《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9页。

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时说：“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sup>①</sup>这表明《宣言》中消除了以往一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中所具有的唯心主义的虚构和空想的成分。《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已占据主导地位。1891年10月，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德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sup>②</sup>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包括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作了分析，清算了以往社会主义学说的空想的反动的性质。根据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派别的不同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把它们区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这里主要论述以蒲鲁东为代表的保守的社会主义。对于保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8页。

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作了详细的阐发。从《宣言》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批判以蒲鲁东为代表的保守的社会主义。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种种表现形态,如缩命论的经济学、人道学派的经济学、博爱学派的经济学。蒲鲁东自以为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又批判了共产主义,实际上他并未超出资产阶级的眼界。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sup>①</sup>而“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定成一些完整的体系了。”<sup>②</sup>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就是这些体系的代表作之一。

蒲鲁东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具有空想性。它既想把社会的疾病治好,又要巩固资产阶级的社会生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的资产者要保全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但是不要有那些使这个社会发生革命和陷于解体的因素。”<sup>③</sup>蒲鲁东式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要无产阶级始终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生活在幻想的天堂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必然否定工人阶级的一切革命运动,反对政治革命,主张经济关系的改革,即一种行政上的改良。“这种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使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关系有所改变。”<sup>④</sup>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9页。

## 第四章

# 1848年革命中的马克思和蒲鲁东

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57年，马克思写作他一生中第二大经济学手稿即《1857—1858年手稿》之前这一时期，马克思认识到要与蒲鲁东继续进行政治论战，并准备从理论上对蒲鲁东进行彻底的批驳。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成了马克思与所有小资产阶级流派论战的重点。与蒲鲁东主义斗争论战的持久性和深刻性表明，马克思通过批判这一影响很大的思想体系来反对阻止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斗争的企图。

### 第一节 革命中的蒲鲁东

#### 1. 蒲鲁东与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事件

1848年革命以前，蒲鲁东尚未涉及政治活动，他只是一个批评家。1848年2月，腐败的路易-菲力浦君主立宪王朝被人民革命所推翻。新组成的临时政府宣布同意成立共和国，并很快宣布男性普选权。

蒲鲁东对法国的二月革命作出了谨慎而又矛盾的反应。他帮助运送石头构筑街垒和排印共和国第一份公告。但他对革命的到来毫无思想准备。就在革命爆发前不久，他还把赌注押在基佐身上。与许多人一样，他认为这场革命提前爆发了四五年。他在笔



记中痛惜人民“草率地发动了革命。”<sup>①</sup>

君主政体被推翻不久，一群武装起来的工人团结在蒲鲁东周围，要求蒲鲁东重新去完成出版社会主义报纸的这一早期计划。蒲鲁东同意主编《人民代表报》(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这份报纸，尽管他对这份报纸的名字持有异议(理由是人民并不需要代表，而应该自己行动)。该报的报头这样写道：“什么是生产者？虚无！生产者应有什么？一切！”<sup>②</sup>他认为谴责普选权就是反革命，国会的民主是“立宪专制主义”。

蒲鲁东担心，在缺乏有远见的社会改革情况下，普选权只不过是充当维护合法现状的一种手段。他嘲笑代表民主拥护者的观点，因为所有选举出的代表作为一个整体只是大致上代表相当分散的人民的利益，而妇女、未成年者、佣人以及那些有前科者，他们都被剥夺了选举权。蒲鲁东主张以组织在他所提出的交换银行周围的直接民主的形式来代替代议制的民主。

1848年4月，蒲鲁东求助于临时政府的部长路易·勃朗，试图通过路易·勃朗来支持他把法国国家银行变为交换银行的计划。在这同一个月里，他被推选为立宪会议选举中的一名候选人，而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蒲鲁东还在谴责代议制的民主。蒲鲁东落选了，其他社会主义候选人也都失败了。这更加证明了普选权的反革命本质。“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他写道，“通过二月革命的街垒精神得以表现，它却在四月的选举中消失了。这就又回到了由右翼和资产阶级成员所把持的立宪会议。”<sup>③</sup>这次失败并未能阻止蒲鲁东继续参加选举。他不久又参加了六月初的选举。这一次，他成功地当选为塞纳省制宪会议员，同时当选的还有路易·

---

① 爱德华·海姆斯：《比·约·蒲鲁东：他的革命生涯、精神及其著作》，伦敦1979年版，第120页。

② 乔治·伍德科克：《比·约·蒲鲁东》，伦敦1956年版，第123页。

③ 乔治·伍德科克：《比·约·蒲鲁东》，伦敦1956年版，第125页。

拿破仑·波拿巴、维克多·雨果、比埃尔·勒鲁和里昂起义的参加者拉格朗热。

在选举纲领中，蒲鲁东把交换银行的组织计划扩充成一个完整的政府理论。主张社会必须由五个独立于国民议会的、自主的“社团”组成。每个社团都拥有自己通过民主选出来的部长。这五个社团是：(1)采掘工业；(2)有关的制造工业；(3)商业；(4)农业；(5)科学、文学和艺术。这是在国家范围内的“工业民主”体系。<sup>①</sup>蒲鲁东一直坚持法国国家银行应被转换成交换银行。他建议要对立法制度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但他赞成保留死刑。他坚持传统式的家庭，不赞成离婚。他再一次区分了所有权和所有物。他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全部所有权，而不是个人所有物和劳动工具。这表明蒲鲁东的政治纲领具有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色彩。他的纲领既具有激进的成份，又具有保守的因素，即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激进的，而在大量的社会问题上保守的。这样的纲领虽然难以实现，但它对激进的工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这些工人对共和政府的政策和幻想破灭了。

1848年6月21日，法国政府取消了“国民专门问题研究机构”。虽然蒲鲁东曾激烈地批评这一机构，但他反对在缺乏可选择措施而工人又依赖于这些措施的情况下取消该机构。工人以武装起义来反对政府的这一行为。巴黎工人居住区布满路障，武装的工人与忠于政府军展开战斗。三天的街垒战之后，在卡韦尼亚克将军领导下的“维持的政府军”胜利了。一千多人被杀，数以千计的人被投入监狱。蒲鲁东被这次起义弄得手足无措。与其他社会主义领袖一样，蒲鲁东没有参加街垒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以逢场作戏的态度，自得其乐的心情，聆听了“大炮的美妙而又可怕的轰击声”。制宪议会中的其他议员都指责蒲鲁东对内战不该如

---

<sup>①</sup> 白克·斯梯芬·文森特：《比·约·蒲鲁东与法国共和社会主义的兴起》，牛津1984年版，第178页。

此幸灾乐祸。

## 2. 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

1848年7月26日,梯也尔发表反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上提出的建议的演说。该演说发表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上》。7月31日,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会议上发表了反对梯也尔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以《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为题,在8月5日的《新莱茵报》第66号上详细地评介了蒲鲁东的这一演说。在此之前,他们曾简短地报道过蒲鲁东的演说。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篇评介,蒲鲁东首先宣称二月革命无非是社会主义的发动,社会主义在革命中力图表现自己。蒲鲁东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决不取决于个人,目前的斗争绝对不是他和梯也尔之间的斗争,而是劳动和特权之间的斗争。但蒲鲁东提出的证据却是“梯也尔先生侮辱和诽谤了他个人”。

在谈到劳动和消费时,蒲鲁东说:“如果劳动供不应求,那就不需要国家的任何保障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消费量非常有限;商店里堆满了商品,而穷人却没有衣服穿!而且哪一个国家比法国更热衷于消费呢?如果给我们的不是1000万法郎,而是1亿法郎,即每人每天75法郎,那我们早就给这些钱找到用途了。”(全场大笑)<sup>①</sup> 根据蒲鲁东,利率是人民破产的根本原因。如果设立一所有20亿资本的国民银行,发放无息的贷款,制定免费使用土地和房屋的规章,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遵循这一个原则(笑声),如果拜金主义被消费的现实主义消灭(又是笑声),那末劳动就有了保障。取消劳动工具税,你们就会得救。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不管他们是叫吉伦特党人或是叫山岳党人,反正都不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是共和主义者(啊哟,啊哟!)……不是私有制战胜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5页。

共和国,就是共和国战胜私有制。”(喊声:够了!)<sup>①</sup> 然后,蒲鲁东开始大谈利息的意义和把利率降低到零的方法。

蒲鲁东说;“诸位先生,我的想法和你们完全不同,我站在和你们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旧社会的消灭开始于2月24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消灭究竟用暴力还是用和平方法,完全取决于资产阶级是否明智,取决于它抗拒的程度。”接着,蒲鲁东论述他的“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并建议要逐步地消灭私有制。地租是土地的自然礼物,国家应该逐步地把它取消。“所以,一方面我向资产阶级揭示了二月革命的意义,同时我也预告私有制:它应该准备着灭亡,私有者应该对自己的抗拒负责。”<sup>②</sup> 所谓负责,“我是想说,如果私有者不自愿消灭,那我们就来消灭他。”而“我所说的我们,是指把我自己和无产阶级合而为一,把你们和资产阶级合而为一!”<sup>③</sup> 然后,蒲鲁东详细地叙述他的税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说;“于是他又变成‘学者’了。这种‘学问’本是蒲鲁东的弱点,可是在这个满是庸夫俗子的议院中,却变成了他的力量,因为它使他有勇气以自己纯洁的、正直的‘科学’来反对梯也尔先生的齷齪的财政学。梯也尔先生在财政问题上证实他在实践中的英明。在他任内,国库空虚了,而他个人的财产倒增加了。”<sup>④</sup> 蒲鲁东对着议员说:“你们已经用二月革命废除了私有制!”而“你们既然在宪法中承认了劳动权,那就是你们也同意消灭私有制。”当一些议员想阻止蒲鲁东发言时,蒲鲁东继续说;“我们这些代表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根本什么也不是;使我们取得了我们的权力的政权缺乏原则和基础。我们的全部威信就建筑在暴力、专横和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6~35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7页。

强大的权力上。(愤怒又爆发了)普选权是偶然的東西;为了使普选权具有某种意义,首先要有组织。指导我们的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而是暴力、必要性和天意……4月16日,5月15日,6月23日、24日和25日,这全是事实;而且都是被历史法定化的事实。今天我们能够做我们所向往的事情,力量在我们方面。所以我们不打算谈暴动者,暴动者就是那些除了强权就没有其他权利的人,但是他们不愿承认别人也有这种权利。我知道我的建议是不会被采纳的。可是你们的处境是这样:你们只有采纳我的建议,才能免于灭亡。全部问题就在于信贷问题,在于劳动问题!信任永远也不会恢复了——不,它一去不复返了……”(多么可怕?)“你们尽可以反复地说,你们渴望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温和的共和国;资本不会冒险地在共和国中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共和国不得不装出一付样子,似乎它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所以,当资本在等待适当时机来消灭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在等待时机消灭资本。2月24日已规定了劳动权。如果你们把这个权利从宪法中勾掉,那么你们就是规定了起义权。

请你们永远用刺刀来保护自己,永远宣布戒严吧。但是资本还是要感到恐惧的,因为社会主义在警惕地注视着它。”<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蒲鲁东在自己的发言中攻击了道德、宗教、家庭和私有制,他曾被《科伦日报》视为英雄。蒲鲁东的“所谓社会经济制度”受到了巴黎通讯、小品文和长篇论文的极力推崇。蒲鲁东关于价值的定义被宣布为一切社会改革的起点。但从前把蒲鲁东看作救星的报纸现在却在痛骂蒲鲁东及其“虚伪的同意”对社会的破坏行为。与一切资产阶级的报纸对待蒲鲁东的非科学态度不同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蒲鲁东还是那个蒲鲁东,“我们所批判的蒲鲁东先生的观点,是他的‘空想的科学’,他企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7~358页。

图用这种科学来缓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的整个银行制度,他的整个产品交换制度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sup>①</sup>

关于蒲鲁东对待二月革命的矛盾心情、在六月起义以后的表现以及反对梯也尔的演说,马克思在蒲鲁东死后所写的《论蒲鲁东》一文中对此作出过科学的评价:“二月革命对蒲鲁东来说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竭力称赞的。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后来出了单行车)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泛滥前的庞然巨物了。”<sup>②</sup> 马克思晚年在为法国《平等报》重新刊登《哲学的贫困》所写的引言中强调自己在《论蒲鲁东》一文中“对这位战士的伟大品格、对他在1848年六月的日子以后的英勇行为以及对他这位政治作家的才华,作了应有的评价。”<sup>③</sup>

## 第二节 蒲鲁东在革命中及革命后所发表的著作

在1848年革命中以及革命后,蒲鲁东发表了许多著作。他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对革命的分析构成其整个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同样,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革命作出了科学而深刻的分析。蒲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9页。

东发表的主要著作有：发表于 1848 年的《为革命干杯》(Toast to the Revolution)。这是蒲鲁东面对巴黎宴会上的两千多听众所作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永远革命”——人类生活中正义的不断表现——的概念，并主张无需任何中介物，人民的直接的行动就是手段。通过这一手段去完成始自二月革命的社会经济革命。在 1851 年发表的《无息信贷》(Credit gratuit)一书中，蒲鲁东以与巴师夏进行论战的形式竭力主张信用改革的观念，坚信信用改革使得其他任何改革都成为多余的。《无息信贷》一书是蒲鲁东把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论文汇集起来而编成的。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对其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在 1852 年出版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The Social Revolution Demonstrated by the Coup d'Etat of the Second of December)一书中，呼吁波拿巴继续革命工作。这里着重论述蒲鲁东以下三部著作：

### 1. 《社会问题的解决》

《社会问题的解决》(Solution de probleme social)是蒲鲁东在法国二月革命时期发表的一部著作。该书所收入的文章反映了蒲鲁东最初对法国二月革命的基本态度。正是在这本书中，蒲鲁东首次详细提出他的无息信贷和交换银行的设想。蒲鲁东在书中首先给“人民”这一概念下了定义。在论述一切革命都是人民完成的而不是教派和党派完成的时候，蒲鲁东认为“人民为一个统一而不应被分割的整体。我所理解的人民并非是这样的人群，即仅仅人数众多，而无一致性的人群……所谓人民就是众人皆一致，谁也不特殊。”<sup>①</sup>可见，蒲鲁东所理解的人民是统一的和不应被分割的。不管“人民”的人数多寡，都不是人群，不应分散。存在分散现象之地，就不存在人民。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实质上是个人主义。他视社会为一个交换团体，这个社会是根据“我给是为了你给”的

---

<sup>①</sup> 蒲鲁东：《社会问题的解决》，巴黎 1868 年版，第 5 页。

原则而严格遵守参加交换的人的利益为基础的。显然,蒲鲁东主义所持的出发点是个人重于社会,这是和社会主义相反的。但如上所述,在蒲鲁东那里,个人观念经常和人民概念纠缠在一起。因此,他的“人民”这个概念也就必然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他从“人民”这个概念出发所得到的结论是:“愿每个人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二月革命——引者注)去请教人民。愿每个人都去研究那个最高思想(*pensée souveraine*),该最高思想不属于任何党派和学派,但它体现在所有学派和党派之中。它能够自我生成并回答我们的所有问题,只要我们善于询问它。询问人民!未来的秘密就在于此。整个社会科学就在于此。”<sup>①</sup>蒲鲁东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就是对人民的意志和智慧的彻底崇拜。这种崇拜与费尔巴哈对“人类”概念的崇拜存在极其相似之处。

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中,蒲鲁东主张政治改良和社会改良,这也是他的一贯的观点。在蒲鲁东看来,中产阶级不能代表人民,应该由全体国民任命自己的代表。“但是,社会的兴旺,科学、艺术、工业、商业的发展,体制的需要,下层阶级的默认和明显无能,这一切都决定着中产阶级是人民中理所当然的优秀分子;中产阶级尚且如此,我们对全民选举能够寄予什么希望呢?那些选民团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并不十分明智和自由,它们在地方成见和国家成见的影响下,怀着对个人和对原则的忌恨而行事;由此选出的代表终究也不过是虚假代表,不过是一场选举闹剧的产物。”<sup>②</sup>蒲鲁东承认贵族从此由我们所挑选,但他宁可要天生的贵族,因为天生的贵族可以不必承担责任。事实上,我们只是通过选举这一途径把原有的贵族找回来。这就决定了只能选资产者当代表,因为资产者在政府中占上风。

在资产者作为人民代表的社会中,不存在革命,只存在改良。

① 蒲鲁东:《社会问题的解决》,巴黎 1868 年版,第 17 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9 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3 页。



在社会改良和政治改良的关系问题上,蒲鲁东主张社会改良是政治改良的基础。“民主的幻想在于它企图以君主立宪制为榜样,通过代议制途径组织政府。无论七月革命或二月革命都不足以使它清醒过来。它所希望的始终是财产的不平等、主权的委托和名人政府。梯也尔先生主张国王当权而不当政,民主制则主张人民当权而不当政,而这就是否定革命。”人民始终是把矛盾头指向社会结构本身。“因此,今天人们主张用代议民主制去代替代议君主制,这无非是把‘美丽的侯爵夫人,你的漂亮眼睛使我爱慕若狂’的句子变成‘你的漂亮的眼睛,美丽的侯爵夫人,使我爱慕若狂’;按照《工场报》的说法,这就叫做革命已被阉割。”<sup>①</sup> 蒲鲁东在否定了革命之后,必然得出社会改良将导致政治改良的结论。这样一来,蒲鲁东意义上的政府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而不是由人民代表管理的政府。

蒲鲁东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中论述了直接交换。根据蒲鲁东的观点,政治经济学已经把“产品只能同产品相交换”当作毫无异议的箴言。交换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交换表现为两位生产者可以互把各自的产品交给对方。但由于两位交换者之一通常也许并不需要对方的产品,这就产生了以现金作媒介的间接交换。在缺少共同的信贷联系的情况下必然产生间接交换。因此,蒲鲁东认为,为了使直接交换成为可能,“只要做到很简单的一件事:即通过一家银行将所有的贸易活动集中起来,这家银行将接受与发票票值相等的各种期票、委托书和支票;然后把这些证券折算成为一种等价的银行券。因此,这些银行券本身就有证券所代表的产品和真实价值作保证。”<sup>②</sup> 这种银行券具有纸币的一切优点。它不会贬值,具有可靠的偿付能力,并且不会遭到任何人的拒绝。人民银行的建立与货币的产生同样简单。但货币的使用是与封建

---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所有制的统治和社会的君主政治相一致的。蒲鲁东强调指出：“只要家庭从事其独特的活动，作为一个封闭性的、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小单位而继续存在，所有权就是社会的原则和基石。”<sup>①</sup> 当流通成为各国经济的头等重要之事时，个人所有权就成了集体生活的障碍。货币在流通中的使用便成为特权和专制的标志，正如国王的特权标志着专制一样。蒲鲁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由此可见，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正破坏着和改造着它以往的创造：当我们充分地理解这条法则的时候，革命就能和平地进行。

王权、所有权和货币，这就是我们所要破除的君主制的三位一体；这就是二月开创的革命事业所应概括的三项否定。

因为，正如我们在下面所应该证明的，宗教的、哲学的、法律的、文学的和艺术的一切改革，也就是说，一切否定，归根结蒂无非是对纯主观观念的否定，是对所有权的否定。所有权一旦被废除，人们将看到我们打算用什么东西去代替所有权，代替权威和代替上帝。”<sup>②</sup>

显然，蒲鲁东在视社会改革为主要任务时，并同时把社会改革归结为信用改革，从而把政治改革抛在一边。

## 2.《一个革命者的自白》

《一个革命者的自白》(Confession d'un révolutionnaire)系蒲鲁东1849年狱中之作。由于有人向警方告密，蒲鲁东从1849年6月开始了他的三年铁窗生涯。同年12月，已是不惑之年的蒲鲁东在狱中与一个平民的女儿结了婚。他在监禁期间写了大量作品。其中《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一书回顾他所走过的道路并总结了自己的文学和政治斗争。

在《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中，蒲鲁东论述了“社会的会计核算”。

---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79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在蒲鲁东看来,说“所有权就是盗窃”既是一种抗议,又是为了说明各种体制的毫无价值。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主张财产公有的结论。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重申并论述了“所有权就是盗窃”这一定义。他还补充了“所有权就是自由”这一定义。蒲鲁东说:“财产就是盗窃和财产就是自由,这两个命题在《经济矛盾体系》中都得到了论证,而且并行不悖地同时存在。我对分工、竞争、国家、信贷、共同体等经济范畴也分别作了同样的考察。我逐个指出了以上的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产生的体制为什么各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这些观念和体制怎样又导致了两类截然对立的结果。我的结论始终是:必须把二者加以协调、调和和综合。因此,财产和其他经济范畴一样,它在这里既有其存在的意义,也有其非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它表现为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因素。”<sup>①</sup>

蒲鲁东也感觉到自己在《贫困的哲学》中对所有权所作的上述论述给人以自相矛盾之感。他在《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中对所有权所具有的两面性的因素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从整个社会体制来看,所有权既能提供资产,又能产生流弊。二者都是直接由其本质所决定的。竞争、垄断、国家等经济范畴也都具有这一特性。“财产和所有其他经济因素一样,它所包括的坏处或流弊同其好处是不可分割的,就象在一部汇总帐簿中借方科目和贷方科目不可分割一样。有一方就必须有另一方。想要取消财产的弊病,就是要消灭财产本身,这和帐本上取消借方的一个科目也就破坏了贷方的科目是相同的道理。反对财产弊端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财产和一个相反的因素融合、综合、组织或平衡起来,这个相反因素同财产的关系就像债权人和债务人、股东和股份公司(例如共同体就是股份公司)之间的关系。这样,两项原则分别以己之长补它之短,但又互不干扰和互不取消,就像借方和贷方互相对应,最后汇

---

<sup>①</sup>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总结算一样,而其结果只能或者是盈,或者是亏。”<sup>①</sup> 蒲鲁东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解决贫困问题,必须采用社会的会计核算方法。但“在社会账薄的总分类账和明细账上,所用的术语将不是资金、现金、一般商品、本票和期票等一般会计学的用语,而是竞争和垄断、私有制和公有制、公民和国家、人和上帝等哲学、法律和政治的语汇。总之,我用最后一次比喻,我们应该每天记账,就是说,要精确地确定盈亏状况,以便随时看出社会究竟有秩序还是无秩序,并报告衡量的结果。”<sup>②</sup>

人民银行构成了蒲鲁东在《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一书中所论述的内容之一。马克思曾称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是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最后的“功绩”。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中,蒲鲁东设想的是“交换银行”。在那里,他认为交换银行不以货币基础为根据,而恰恰在于消灭货币。这被蒲鲁东规定为交换银行的任务,而人民银行必须具备货币基础。他说:“人民银行是所有这样一些公民的财产,他们自愿享受人民银行的服务,并且他们既然承认在一定时期内人民银行仍需以货币为基础,所以他们怀着上述目的用自己的资本来供应它,他们总是尽早在人民银行办理清算并接受其支票作支付。”<sup>③</sup> 蒲鲁东对自己的人民银行颇为得意,他说:“1849年1月、2月、3月是我一生中最美满的时刻;在这三个月里,由于人民银行的成立,无息信贷原则即使没有完全实施和发挥作用,但至少已经被提出和具体化,并且进入了公众的思想之中。不论上天如何支配我的命运,我将把这三个月看作我参加的最光荣的一场战役。”<sup>④</sup> 事实是这样,1849年1月31日,蒲鲁东签订了合股文书。人民银行于1849年2月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94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页。

③ 蒲鲁东:《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巴黎1929年版,第248页。

④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76页。

11日在圣德尼街52号开业。在两天之内就有862人认购了1897张股票,计9485法郎。六周以后,认购的股票接近2万人,预定的资本高达10万法郎。但这时蒲鲁东却因违反出版法被判处三年监禁和3000法郎罚款。人民银行随之迅速垮台。这表明蒲鲁东思想观点的软弱以及他设想中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脆弱。

蒲鲁东设立人民银行的初衷在于变换社会的基础,翻转文明的轴心,即改造资本对劳动的关系。在蒲鲁东看来,人民银行是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根本工具。“任何宗教,正如任何哲学一样,都是社会经济的形而上学的和象征性的表现,所以人民银行在改变社会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是哲学、宗教革命的前奏,至少人民银行的创始者是如此设想的。”<sup>①</sup>一些工人确实对蒲鲁东的人民银行寄以厚望。卢森堡委员会代表们的宣言中曾这样写道:

“公民们已听说,公民蒲鲁东力图建立一个流通机构,开始叫交换银行,后称为人民银行。

工人弟兄们,目前我们的责任在于请你们认真考虑这个机构。我们已向你们讲明该机构的结构,因为我们认为它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事业。

1789年,专制制度有自己的堡垒,即巴士底狱。人民在愤怒中使它在一日之内化为乌有,并当晚就在其原址上写下朴实、绝妙之语:‘在此跳舞’。

1849年,金融封建主们有自己的堡垒,即法兰西银行。我们认为它可望而不可及。但一位博学的工程师宣称并非如此。勇敢一些吧,高利贷的殿堂已觉察到我们用心汗换来的果实已不再流入它的仓库,它将被祭司们冷落,并与旧世纪一同寿终正寝。”<sup>②</sup>

在蒲鲁东那里,人民银行的建立是与卢森堡宫的、极权主义的、马尔萨斯的理论相对立的。它不是被当作推行公产制和重商

---

① 蒲鲁东:《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巴黎1929年版,第248页。

② 蒲鲁东:《社会问题的解决》,巴黎1868年版,第285页。

政治的手段。人民银行与无息信贷有着密切的联系。蒲鲁东说：

“人民银行的出现使经济问题惊人地变得简单了。共产主义、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新基督教主义和神秘主义都不再需要了。剩下的问题仅仅是：价值流通是否能无偿地进行？这种流通是合法还是非法？资本是否有权对互助同它竞争提出非议？劳动者（不论他们在组织的问题上有何理论分歧）究竟会接受或者会拒绝新的信贷方法？这种方法一下能使劳动者免除六十亿的额外支出。从此，反动派关于家庭和所有权的动人演说将无所逞其伎；协作社、法伦斯泰尔、农垦区等计划也将相形见拙：问题仅限于实行低息贷款和无息贷款。农民懂得：废除高利贷，通过流动资本和不动资本之间的竞争逐步降低地租，这是一回事；而无偿地和无益地剥夺工厂主和地主的财产，那是另一回事。实行无息信贷，问题就能和平地合法地得到解决，革命可以在不伤害任何人，也不引起任何人惊慌的情况下进行。”<sup>①</sup>

人民银行不但不花公民和国家一分钱，而且它将使公民和国家大受其益。蒲鲁东认为人民银行具有历史必然性。“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人们将让这一前程远大的机构来援救负债累累和灰心丧气的国家；我们不妨试试，看商业界和金融界的那些因循守旧的人能有什么办法避开人民银行，看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能有什么办法代替人民银行。不过那时候，我们已经花费了几亿法郎，用于救济、军费和运费，用于开办农垦区，以及用于镇压和囚禁；那时，我们已经尝到了最可笑、最可气和代价最大的各种经济幻想的苦头：典当、虚假流通、高利贷，包括累进税、奢侈税、所得税、遗产税、乃至破产税在内的各种苛捐杂税。”<sup>②</sup> 人民只有摆脱偏见的支配，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

蒲鲁东的交换观念通常称之为互助主义。19世纪40年代，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

蒲鲁东在里昂工作期间,除去结识了马克思等知识分子外,还结识了一群自称为互助主义者的革命工人。里昂工人强调,要工人自己通过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网络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工人联合会通过直接调节工人的生产和交换来消灭资本家的剥削,并向其成员提供独立和安全。这些思想给蒲鲁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此称自己的经济理论为“互助主义”(mutualism)。并视工人联合会为“自由和秩序的真正的合题(true synthesis of freedom and order)。”<sup>①</sup> 人民银行旨在摧毁国家观念,以使人民通过互助而得到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在互助的情况下,生产者之间依据构成价值的规律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所有的人既是生产者又是资本家,政治经济从而融化于经济组织之中。对立的阶级消灭后,只留下“中层阶级”。蒲鲁东说:社会主义不只是消灭贫困、废除资本和雇佣劳动、改变所有制等,“同时还是中等地位(fortunes mediocres)的确立、中层阶级的普通化。”<sup>②</sup> 中层阶级被蒲鲁东视为最革命的阶级,是一切事物的归宿。他甚至把富翁和无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阶层都算作中层阶级。这表明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要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改造整个社会。

### 3.《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L'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是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该书系蒲鲁东在狱中所作,写于1848年法国革命之后。1851年7月出版。初版3000册书很快销售一空,当年8月出了第二版。它提出了对雅各宾主义的自由意志论者的选择。基于平等和正义的自由社会观点,《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批判了现存社会制度,并对革命运动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基调纲领,正像无政府主义开始作为有意义

① 伍德科克:《比·约·蒲鲁东》,伦敦1956年版,第75页。

② 蒲鲁东:《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巴黎1929年版,第354页。

的革命左派力量出现一样。

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中，蒲鲁东公开向资产阶级献媚，主张阶级调和论，回避暴力革命。他希望采用争取资产阶级加入革命事业的方法来避免更多的流血。蒲鲁东公开宣称《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是献给资产阶级的。资产者“是有史以来最勇敢、最精明的革命者”。要是没有野蛮人的入侵，资产者自3世纪之后成立的共和国一定会统治整个中世纪。“最近二十四年来，你们宣告了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商业和工业自由等各种革命的思想；你们用博学多能的宪法结束了祭坛和王位的统治；你们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立法监督行政、公开国家收支、政府服从国民、舆论至高无上等原则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基础上。”因此，蒲鲁东认为正是资产阶级提出了十九世纪革命的原则，并为这场革命奠定了基础。“法兰西的资产者们，你们是把握人类前进的舵手，初出茅庐的无产阶级请你们当他们的老师和榜样。”<sup>①</sup> 资产者在发动了历史革命之后，不可能变成反革命。蒲鲁东分析道，资产者的怨愤不只是始自二月革命，可以追溯更远。18世纪末，资产者被“无套裤汉”赶下台后，国家的舵轮掌握在平民演说家手中。而平民演说家们只不过是勉强的继续资产者的事业。资产者不应因自己的特权受到破坏而耿耿于怀。由于人民未能把资产者们开创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热月政变”一发生，资产者们就出来反对革命。1848年革命中，人民在资产者的帮助下成立共和国。蒲鲁东认为这是从资产者们的逻辑推理中得出的合理结果。但人民因不懂得政治生活的诀窍而又一次丢失了革命政权。临时政府需要资产者重新充当无产阶级的监护人。而资产者在获得政治优势之后，把人民当作小偷和无赖，枪杀、流放贫苦工人。这表明了资产者的残酷无情，充当了反动派的帮凶。蒲鲁东这样宣布了资产阶级的使命：

---

<sup>①</sup>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现在……三年里，你们(资产者——引者注)所谓的救星使你们蒙受的耻辱超过了半个世纪以来历次革命流产给无产阶级带来的苦难。那些由于你们盲目的偏见而得以掌握无限权力的人，他们在辱骂和嘲弄你们；他们宣布你们是秩序的敌人，说你们不能遵守纪律，受了哲学、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毒害。他们把你们当作革命者！”

资产者，你们要接受这一称号并引以为荣，……和解就是革命。敌人占据了你们的地盘。让敌人的辱骂成为你们奋起革命的号召吧！你们是革命的长子；从恺撒时代到波旁王朝，你们已经经历了无数专制制度的兴亡，你们不能辜负你们的命运。我相信你们还会有所作为。如同在 1789 年、1793 年、1830 年和 1848 年一样，人民等待着你们，革命向你们开怀相迎：你们要以你们的父兄为榜样，用革命去拯救人民和你们自己。”<sup>①</sup>

根据蒲鲁东，革命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资产者走来。不仅存在充分的革命理由，而且革命本质上是历史的必然。现在不是讨论是否该革命，而是必须准备迎接革命。置身于铁窗之中的蒲鲁东，其“革命灵魂又开始在观念的世界中遨游了。”他坦言：“我从我的摆脱了旧世界偏见的遨游中带回了几颗种子，这些种子一旦播种在业已经过耕耘的我国国土上，必将茁壮地发芽成长。请允许我今天献给你们一颗种子以作为样品。资产者，播种的任务将光荣地落在你们身上，而种子结出的第一颗果实将使你们重新回忆起革命，这是你们当前必须从事的、但又到处为人们所忘记的唯一大事。”<sup>②</sup> 任何阻止革命发展的企图都只会使革命更加迅猛发展。反动势力妄想阻止革命的胜利，必然会采取更加残酷的措施。人们只能认为这是蓄意通过一连串的失败来挫伤革命者的锐气，

---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9 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1 ~ 102 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9 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2 页。

而这被假定为是对资产阶级的警告。现时经济基础的潜在根基是不稳定的,正是资本主义无序的剥削制度使得政治具有必然性。因此,革命的任务不是为了推翻现存的政治秩序,而是为了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旦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就变成多余的了。蒲鲁东与马克思在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是十分明显的。

平等交换概念是蒲鲁东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中所提出的经济方案的中心。与平等交换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是他的契约概念。他强调这个概念经过卢梭的歪曲而失去了真义,成了一种虚假的政治公式。“契约”的根本含义旨在每个人都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在这样的条件——保证每个人都可自由地进行磋商、根本不会由于权力垄断使磋商的公平性遭到破坏——下与他人订立契约。在契约迫使个人生产某种东西,交付某种商品时,个人也并不放弃自己的自由。个人在自由地履行契约的义务时,就是承认了他人的权利。契约观念排除了政府观念。在蒲鲁东那里,“社会契约(the Social Contract)成了至高无上的证书,每个公民用它来抵押他的爱情,智慧,劳动,任务,产品,财富于社会,得到其同类之爱,观念,劳动,产品,任务,财富的报酬。”<sup>①</sup> 这样的社会契约是在一切参加者的自由讨论中形成的。社会契约不仅使得契约者享有自由,而且还增加其自由;不仅使其拥有全部财产,而且还增加其财产。这就是从权力意义上所理解的社会契约。可见,蒲鲁东的“契约”实质上即为立约者自由承担的义务。个人之间自由订立的平等交换“契约”应取代全部政府机构和强制性的束缚作用,“契约”从而成了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蒲鲁东显然是把“契约”这一概念泛化了。柯尔也看到了这一点。“蒲鲁东把‘契约’这一概念拓展得如此之深远,以致他对任何一种协作都表示怀疑,只要这种协作要求人们放弃以个人身份采取的直

---

① 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伦敦 1989 年版,第 114 页。

接行动,而代之以摆脱个人责任的集体机构的行动。”<sup>①</sup>

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中,蒲鲁东在第五篇论述了社会清算。他特别强调国家银行的地位和功用。根据法国 1589 年商品法和 1703 年的《民法典》,两个商品生产者有权在各自的产品销售或交换方面相互承诺保证在所生产的各种商品及其价值方面达成一致。在同一法律条件下,相互销售或交换的相同承诺可以存在于任何生产者之间。根据蒲鲁东的观点,如果愿意的话,法国公民有权同意共同协作建立许多商店,保证这些商店廉价出售和交换各种优质的消费品。但鉴于商业的实际混乱状况,必须建立“当家人”制度。“法国公民为了自由的共同利益,有权建立国家银行。通过公民所选择的银行资本,达到廉价获得交易中所必需的货币。并且有权与私人银行竞争。”<sup>②</sup> 公民应利用商业自由和法典所赋予的权力达成共识。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银行实为公共产物。它的建立,既不需要联合、友爱,也不须负有义务,国家干预,而只须相互对销售或交换达成一致,即一纸契约。蒲鲁东认为,这解决了两个问题:贴现国家银行可以是公共产物和需要这样的银行。对此,蒲鲁东陈述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法国国家银行被建立起来了。这是借助政府的优惠政策、公司股东一千八百万美元的资金建立起来的。目前,储存货币的总值大约达到一亿二千万美元。这样,借助在总流通领域中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手段,货币积聚在国家银行中,其总量的六分之五是法国公民的财产。所以,国家银行,据其机制的本质,应该成为公众的机构,因为国家银行存在于不属于它的资本中。

第二,货币积聚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国家银行从另一个国家获得的单方面受益的权力。而这另一个国家发行的纸币与法国国家银行的货币相抗衡。因而,如同每一种特权都是公众的财产一

---

① 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 1 卷,伦敦 1953 年版,第 210 页。

② 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伦敦 1989 年版,第 175 页。

样,法国国家银行凭其特权易于成为公众的机构。

第三,发行银行纸币和逐渐用纸币来取代流通中硬币的特权会产生其直接后果,一方面,它给国家银行股东带来的利息远远超过归于这些股东的资本所带来的利息,另一方面,它以高利率来维持货币不贬值,从而使银行主和贷款者大大受益,但却大大的损害了生产者、制造商、批发商和那些利用货币来购买各种商品的消费者的利益。付给股东的超额利息和货币率的上升,二者导致权力(power)已必须使自己符合富人即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是期待已久的结果,但付给股东的超额利息和货币率的上升是不公正的,不能总是如此,所以,由于国家银行特权的非法性,国家银行法定将成为公众的机构。”<sup>①</sup>

根据上述理由以及金融活动的情况,蒲鲁东建议通过立法来成立国家银行,而不是宣布国家财产;必须成立公共事业机构,并下令解散公司。国家银行变成公共事业的机构后,它必然拥有其顾客所提供的资金。“国家银行”被蒲鲁东视为“空前绝后的企业”。这是由他原来计划中的“交换银行”演绎出来的。二者的区别在于,交换银行并非要以货币为基础,恰恰在于要消灭货币,而“国家银行”则必须具备货币基础。国家银行的货币利率为4%。这意味着那些在国家银行中单独拥有贴现权的银行主的货币利息百分比为5%—9%。高额货币和资本使得法国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并造成法国低于英格兰的发展水平。

蒲鲁东视政治制度必然引起经济改革,但他声称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社会的理性经济组织中,最终目的应为政治的解体。就经济学而言,不分具体国别,真理到处都是相同的。蒲鲁东说:“假如科学(不包括宗教和权力)被当作每个国家的社会规则、利益的最高主宰、政府失去效用(becoming void),世界的一切立

---

<sup>①</sup> 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伦敦1989年版,第175~176页。

法都会是和谐的。”<sup>①</sup>在蒲鲁东的整个革命纲领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是民主、反权威和非中心主义。蒲鲁东说:

“不要权威!教会、国家、土地、金钱统统不要成为权威!革命的決定性的根本观念难道不全在这里吗?

不要权威,就是个人利益与人类利益、集体至上与个人至上达到空前的一致,这是人们从未能见过也从未能懂得的事情。

不要权威!就是免偿债务,废除奴役,撤销典押,退还地租,取消信仰、司法和国家的开支;就是实行无息信贷、平等交换、自由协作、调整价值;就是保障教育、劳动、财产、住宅和平价;就是不再有对抗、战争、集权、政府和司铎。难道这是要使社会走出轨道,变得颠三倒四吗?

不要权威!就是让自由的契约代替专制的法律,让自愿的协商代替国家的仲裁;让公道和平等的正义代替铁面无情和至高无上的司法;让理性的伦理代替启示的伦理;让力量均衡代替权力均衡;让经济统一代替政治集权。再说一遍,难道这不就是我大胆地称作全面改造、彻底转变和革命的内容吗?”<sup>②</sup>

在追溯权威的发展历史时,蒲鲁东把《圣经》中的十诫称为权威原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认为所有的法律条文都采用神圣不可侵犯的语气对人说话。由命定的号角所发出的法律必然是神圣的。蒲鲁东把人类悲哀的生活归结为由于政府的存在。他说:

“啊!人啊!你在六十个世纪里就这样下贱地苟且偷生,你还算人吗?你自称是神圣的和崇高的,实际上不过是你的仆人,僧侣和丘八们的顺从而无代价的娼妓。你心里明白,并为之感到痛苦!你是政府的庶民,你就丧失了行动自由,处处受监视、受指挥、受管束、受辖制;你就没有思想自由,处处受灌输、受教诲、受监督;你的

① 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伦敦 1989 年版,第 283 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9 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9 页。

一言一行始终要受那些无功、无知、无德之人的控制和限制。你是政府的庶民，你的每项生意都要登记、注册和纳税；你的每项营业都要经过批准和领取执照；你的每项活动都要受到训斥、阻拦、纠正和处分。你要接受种种苛捐杂税、巧取豪夺、敲骨吸髓和盗窃欺骗，而这一切都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并且，如果你稍有怨言或稍有反抗，你立即就受到镇压和处置：轻则挨骂受辱、棍棒加身、飞文追捕和银铛入狱，重则送交法庭审判、发配流放或执行枪决，总之，你成了任人摆布、羞辱和出卖的掌上玩物。这就是政府的意义，这就是政府的正义和道德！而我们还有些民主主义者居然说政府有其好处；还有些社会主义者居然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名义拥护这可耻的政府；还有些无产者居然充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真是虚伪透顶！”<sup>①</sup>

无政府的主张是蒲鲁东破坏意识的集中表现。早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蒲鲁东就大反权威，力主无政府主义。在论述共产制与私有制的特征时，他揭露所有权具有专制主义的效果。蒲鲁东自称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但“共和主义者”一词未能准确说明什么。拉丁文 *Res publica* 为“公物”之意。而每一个要拥有公物的人都可自称为共和主义者。甚至国王也都是共和主义者。经过深思熟虑，蒲鲁东宣称：“虽然我很爱好秩序，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者。”<sup>②</sup> 领袖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天然要营社会生活的人自然也是跟随一个领袖的。在原始时期，这个领袖是父亲、家长、老长辈，即一个谨慎而聪明的人；他的职务因而就完全是属于思考和智慧方面的。像其他各种各类营社会生活的动物那样，人类具有本能、天赋的能力、一般概念、感情和理智的范畴：领袖、立法者或国王从来就不曾有什么发明，也丝毫没有有什么推测和想象；他们只根据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领导社会，但同时总是遵循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②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83页。

着舆论和信仰。”<sup>①</sup> 这表明哲学家们,把自己的煽动家的怪癖带到道德学和历史中去的哲学家们对于人类的本质的估价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否定了人类曾有过领袖、国王的存在。蒲鲁东肯定人在法则中使其各种需要得到最迅速和最完善的满足。在原始时代,人所寻找到的法则就是自己的父亲、老师、国王。而人自探究那支配着领导人的意志的动机开始就变得不驯服了。历史表明,随着社会逐渐觉醒,国王的权威就逐渐减弱。蒲鲁东说:

“因此,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人对人的权威是和这个社会所达到的文化发展程度成反比的,并且这种权威的大致的存续期间是可以按照要求得到一个真正的政府、即符合那门科学的政府的比较普遍的愿望而计算出来的。正如强权和诡计权在愈来愈扩大的正义面前缩小而最后一定会在平等中消灭那样,属于意志的主权同样也要向那属于理智的主权让步,并且最后必将在科学社会主义中消灭。自从世界开始以来,财产和王权曾不断地遭到摧毁。人在平等中寻求正义,同样地,社会则在无政府状态中寻求秩序。

无政府状态就是没有主人,没有元首,这就是我们一天天在接近着的政治形式,并且这就是把人当作法则、把他的意志当作法律的牢不可破的习惯使我们把它看作紊乱的顶点和混乱的表现的政治形式。”<sup>②</sup>

根据蒲鲁东的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由不同的自治组织组成。直接的民主机构,从城镇到师范学院,都摆脱了权威的束缚。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应取消竞争、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一旦平均分配财富并且实行无息信贷,竞争就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租金、利息以及其它形式不劳而获收入的消亡,所有权就能为独立和繁荣而不是剥削和贫困奠定基础。

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中,蒲鲁东坚持所有政治都

---

①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85 页。

②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88 页。

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他谴责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罪恶的欺骗,斥责监狱为“暴力的兽笼”,抱怨宗教是奴役和剥削的外部原因。人们发现他在后记中对政治的冷嘲热讽以及对权威的抨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蒲鲁东认为“共和国高于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如果一个人理解这一公式,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看法:革命高于共和国。”<sup>①</sup>他以号召所有人参加世界革命而结束全书。

### 第三节 马克思对革命的分析以及对蒲鲁东的批判

#### 1. 革命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其实质是为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统治而斗争。革命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各个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各国的具体条件决定了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法国革命开始后不久,马克思便于1848年3月迁往巴黎。当革命事件席卷德国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于4月初离开巴黎返回祖国参加革命。

在这次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在科伦组织出版《新莱茵报》。1848年4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伦着手筹备出版大型的政治日报。4月24日左右,《新莱茵报》的出版计划书问世。马克思因忙于出版《新莱茵报》而中断对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稿的整理。5月,马克思通过维尔特把《新莱茵报》即将出版的消息通知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社会辩论报》的编辑若特兰,并且建议在两报之间建立经常的联系。5月20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鉴于德国政治局势的恶化和反动势力的抬头,决定提前出版《新莱茵报》。6月1日,《新莱茵报》出版。这份报纸在1846年1日至1849年19日的存在期间,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

---

<sup>①</sup> 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伦敦1989年版,第301页。



级民主革命条件下出版的充满着战斗精神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革命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在9月12日至16日的《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发表题为《危机和反革命》的几篇连载文章,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理: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应该是人民的革命专政,专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对反革命的坚决回击,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在发表于1849年1月1日《新莱茵报》上的《革命运动》一文中,马克思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发展。分析了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并着重指出这个革命应该对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发生的影响。对于这次革命的发生,马克思这样写道:“从来还没有一次革命运动像1848年的革命运动这样以如此动人的序曲开始。罗马教皇给1848年的革命运动以宗教的祝福,拉马丁的风神之琴轻轻地奏出了优美慈爱的曲调,歌唱了所有社会成员和各族人民的《fraternité》——手足情谊。”<sup>①</sup>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中所表现出的软弱的人道主义,其后果必然是残酷的。马克思认为欧洲解放的口号应为打倒法国资产阶级,争取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在1849年2月1日《新莱茵报》上发表的《〈科伦日报〉论选举》一文,论证了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为民主共和国而共同斗争的必要性。这一时期的蒲鲁东主编《人民代表报》,并发表一系列与革命有关的著作,前面已作论述。

1849年德国革命最终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迁往英国。为深入批判蒲鲁东,他们在理论上作了全面的准备,对法国革命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集中批判了蒲鲁东关于革命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参加革命斗争,这对于发展他们的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他们常常从这一点出发来判断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的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3页。

命运。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确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和它们的倾向,也常常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常常根据当时的革命时期来评价以后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sup>①</sup>

## 2. 对法国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两部著作中,根据对19世纪40年代法国社会经济条件的研究,对法国革命的社会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作了详细的分析。蒲鲁东在1852年7月出版了《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1848—1849年的革命没有失败,“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其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马克思的进一步推论是:“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即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做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党。”<sup>②</sup> 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就是为了证明上述的结论。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与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辩护观点的直接对立。马克思在1852年7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蒲鲁东出版了新的著作,因为论述宗教、国家等已经不可能了,剩下的就只有‘个体’了。

---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页。

他的这一发现是对施蒂纳的模仿。”<sup>①</sup>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新著作，就是指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1865年，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对蒲鲁东的这一著作这样评价道：“他（蒲鲁东——引者注）那本关于‘政变’的著作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却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sup>②</sup>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以及雨果的《一件罪恶的历史》差不多同时出现，论述的是同一问题，面对的是同一段历史。在蒲鲁东看来，路易·波拿巴与其叔叔一样，“是个革命的独裁者，惟一不同的是第一执政结束了大革命的第一阶段，而总统则开始进行第二阶段。”他觉得1848年革命是一场深入的运动，要让十二月二日事件把无产阶级改造成为真正的人。蒲鲁东甚至赞成总统亲王想要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马克思在1869年所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对雨果和蒲鲁东关于“政变”的看法作了这样的分析：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页。

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sup>①</sup>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平庸的路易·波拿巴何以能够扮演英雄的角色。马克思首先论述了人们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sup>②</sup>当然，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显得千差万别。在革命中使死人复生，这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不是简单地模仿旧的斗争。针对蒲鲁东对十九世纪革命的一些观点，马克思指出：“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sup>③</sup>因此，与蒲鲁东对待二月革命的矛盾、谨慎心理不同，马克思则称赞二月革命对旧社会的突然打击，人民视二月革命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马克思把 1848 年 2 月至 1851 年 12 月的法国革命所经过的阶段概括为这样三个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会议时期和宪制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马克思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40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2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24 页。

了革命中的蒲鲁东主义的做法。“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sup>①</sup>但这种失败又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的失败。在革命中,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构成了社会民主派。在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对抗中,社会民主派并不要求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实现二者的调和。“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sup>②</sup>这表明民主派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就是其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提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这就是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其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至于革命中的山岳党人,马克思说:“蒲鲁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Vous n'êtes que des blagueurs!》[‘你们就是会空谈!’]他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sup>③</sup>山岳党人的失败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即波拿巴个人对其民主派敌人的胜利。

对于路易·波拿巴,蒲鲁东对其寄予很大的期望,试图通过支持波拿巴而对政变作出妥协。这表明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玷污了蒲鲁东作为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名誉。”<sup>④</sup>出自当代资产阶级学者之口的这一评价不无道理。而马克思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7页。

④ 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伦敦1989年版,导言XXV。

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这个平庸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首先,马克思指出,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法国的小农人数众多,由于其相互隔离和贫困,没有形成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大多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马克思说:

“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sup>①</sup>

这种历史的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拿破仑会给他们带来一切福利。于是,路易·波拿巴扮演了拿破仑的冒充者,成了法国人的皇帝。显然,波拿巴王朝代表了保守的农民,而不是代表革命的农民。这样的农民根本不想去推翻旧制度,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特权地位。在政变以后,大多数农民仍然公开投波拿巴的票,认为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甚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7~218页。

至有些地方的农民还荒唐地幻想在波拿巴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 3.《反思》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反思》是马克思写在第Ⅶ笔记本上的部分内容。整个第Ⅶ笔记本主要是就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论问题从不同作者的著作中做的摘录。该笔记本大约在1851年3月写完,《反思》体现了该时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状况。该文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77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期上。马克思的《反思》在较深的理论层次上,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观点。这是继《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之后对蒲鲁东的继续深入的批判。这一批判在《1857—1858年手稿》中得到更为全面的展开。

在《反思》中,马克思一开始就肯定了斯密对贸易的区分的重要性。根据斯密,贸易可分为两种: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前者是资本的转移,靠其自己的货币来实现;后者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换,靠其自己的铸币来实现。马克思认为,关于上述两种贸易、货币之间的联系,斯密没有加以阐述。而经济危机的事实表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会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所设定的界限,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工人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以及实业家之间的交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个交换的整体。斯密看到了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必然受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的限制,原因在于向交换者出售的价格是最终价格,这种价格反过来必须在利润之外再补偿先前交易中的生产费用。而蒲鲁东对斯密的理论采取了形而上学的态度。马克思说:“不过,在亚·斯密上述原理的基础上,整个经济学被蒲鲁东粗暴地简单化了。”<sup>①</sup>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一国实业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受本国实业家和消费者之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

间的贸易的限制,而且还受全世界市场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因此,说许多国家内的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受一个国家内的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是错误的。”其次,马克思指出,由于工人阶级构成消费者的最大部分,随着工人阶级收入的减少就会造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适应,从而导致生产过剩。但不能把这种论断加以绝对化。这里的工人收入的减少“不是像蒲鲁东所认为的在一国中的减少,而是在世界市场上的减少。”再次,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大多数造成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大多在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面前最终碰壁。危机总是最先发生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最后,“生产过剩不只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批判蒲鲁东关于货币的荒谬观点。货币制度以生产方式作为基础。商品必须兑换成货币。这意味着,商品具有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必须有不同于商品的特殊存在。试图通过某种人为的措施和改变货币制度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不能兑现的状况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资本的无法兑换已经包含在任何货币制度的存在中,甚至已经包含在产品作为资本形式的存在中。对货币市场的压力并非只是由信用欺诈引起的,不能靠发行大量货币来消除货币的不便之处。马克思说:“蒲鲁东、格雷等人也是些蠢人,他们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因为货币市场上发生了普遍危机,而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面恢复表现为一些征兆,这些征兆不用说会突然重新成为[普通危机的]原因,所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莫过于那些目光短浅的、坚持资产阶级基础的改良家们希望改革货币了。他们保留产品同产品的可交换性之间的分离,因为他们保留价值和私人交换。但是他们想好好地安排这种分离的符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156页。



号,好让这种符号表示同一。”<sup>①</sup>蒲鲁东主义显然试图用资本主义货币制度的缺陷来解释经济危机。他们人为地构想货币只不过是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

#### 4. 评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马克思比恩格斯先读到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这本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本书都作了摘录和批判。这里先论述马克思对该书的摘录和评价。马克思在1851年8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向恩格斯介绍了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内容,并在六天后致恩格斯的信中对该书的主要内容作了评价。

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本章的第二节已作过论述。这里仅从马克思对该书的摘录和评价角度再作一论述。马克思在1851年8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sup>②</sup>,对该书的第一篇,马克思只摘录了一句话:“只有反动才导致革命的发展。”第七篇,即最后一篇,也只摘录三句话。马克思摘录得比较多的是第五篇社会清算和第六篇经济力量的组织。第五篇的五个问题的标题马克思全部做了摘录,它们是:国家银行,国债,抵押债务(普通债务),不动产:建筑物,地产。第六篇的五个问题的标题马克思也全部做了摘录。它们是:信贷,财产,分工、集体力量、机器、工人协会,价值构成:廉价市场的组织,对外贸易。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评价的较少,只是在摘录的开头部分说:“书中批驳卢梭、罗伯斯比尔和‘山岳党’等等的地方写得好。”在摘录第四篇论权力的原则时,马克思这样写道,“纯粹的民主或者直接的民权——这是里廷豪森、孔西得朗和赖德律-洛兰的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这种达到了顶点的国家观念充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322页。

表现了它的荒谬性。”马克思对第七篇政府在经济机体中的解体作了这样的摘录和评价：“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词藻。”最后，马克思还征求恩格斯对蒲鲁东这个药方的看法。恩格斯在8月11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至于蒲鲁东（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引者注），看来这个人有所进步。不管怎样，他的荒谬东西在发展中经过了的阶段，具有了比较不错的形式，而路易·勃朗先生对于这种‘邪说’是啃不动的。蒲鲁东先生现在终于也认识到，财产所有权的真正意义在于，由或多或少是隐蔽的国家隐蔽地没收各种财产，而废除国家的真正意义是国家的更加集中。因为‘通过协商对土地质量的差别和土地耕作上的特点加以均衡的共和国的所有公社’及其不可避免的特征和后果，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吗？”<sup>①</sup> 恩格斯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表示第二天要继续评价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这本书。

8月11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所提供的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摘录，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恩格斯在信中写道：“我暂时撇开他的药方中的许多缺陷，例如，看不出，工厂将通过什么方法从工厂主的手中转入工人协会的手中，因为废除的是利息和地租，而不是利润（要知道竞争仍然在起作用）；其次，没有谈到对于利用雇佣工人经营土地的大地产应该怎么办，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缺点。”<sup>②</sup> 蒲鲁东终于认识到了实行或多或少是隐蔽的没收是必要的。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蒲鲁东认为“利率将降低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恩格斯认为这种降低应当逐渐实行。但蒲鲁东并未指出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任何想迅速地、恒久地降低利率的企图都必然要遭到失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5页。

任何降低政府贷款利息的最直接的结果,都是增加大商人的利润。恩格斯说:“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想降低利息的全部永恒的迫切要求,依我看来,是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美好愿望的另一种表现。只要利息和利润成反比例的时候,这个要求只能导致增加利润。只要有不宽裕的,没有保证品的,从而恰好非常需要钱用的人存在,国家贷款就无法消灭私人贷款,因此也不能降低任何交易的利率。”<sup>①</sup>

在降低利率问题上,蒲鲁东过于理想化了。在工人协会中采用个人信贷,这是蒲鲁东玩弄组织协会的骗局。用商业措施和强制手段来逐渐降低利率,从而消灭一切债务,把现有财产都集中在国家手中,蒲鲁东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恩格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有以下五点:“第一,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理由;第二,因为时间拖得太长;第三,因为在以国家证券形式保留信贷的情况下,唯一的结果就是国家欠外国人的债,因为所有付还的钱都会流出国外;第四,因为即使在原则上有这样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认为法国即共和国能够面对着英国和美国而实现这一点,那是荒谬的;第五,因为国外的战争和当前时局的压力总的说来正在使这一类有系统的、缓慢的、打算在二三十年内实现的措施,尤其是货币支付失去任何意义。”<sup>②</sup> 与蒲鲁东的其他著作相比,恩格斯认为,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是接近尘世得多了。”“价值构成也具有了一种比较有血有肉的形式。”但在废除关税和废除利息的关系问题上,蒲鲁东没有说清楚。“蒲鲁东从1847年以来,非常彻底地完成了从黑格尔到施蒂纳的过渡,这也是一种进步。他在他自己的尸体上研究德国哲学一直研究到了最后腐烂阶段,还能说他不了解德国哲学!”<sup>③</sup> 恩格斯在信中要求马克思把自己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8页。

上述意见的看法告诉他。

马克思在8月14日给恩格斯的回信中,较为详细地评价了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中的基本观点。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马克思把蒲鲁东主义的实质归结为以下几点:

蒲鲁东主义竭力反对资本。“必须反对的真正敌人是资本。资本的纯粹经济表现是利息。所谓利润无非是工资的一种特殊形式罢了。把利息变成年金,即对资本的分年偿还,就可以废除利息。这样一来,将保证工人阶级——应读作产业阶级——永远占有优势,而资本家阶级本身则注定要逐渐消失。货币利息、房租、地租是利息的不同形式。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仍然保存,并获得了正当的理由,只是要铲除其不良倾向。”<sup>①</sup>

蒲鲁东主义的“社会清算”是一种手段,只是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手段。这种清算的本身是矛盾的、不确切的。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把废除利息视为重建社会的真正的灵丹妙药。而废除利息,在蒲鲁东那里就是“把每年支付的利息变为年金”。蒲鲁东把这种手段当作资产阶级的经济规律提出来的措施。这必然会致“使小的非产业资本家变成产业资本家”,而且“使大资本家阶级永世长存”。马克思以英国为例,说明资本不仅没有产生利息,而且就其价值而言,连它自身也没有再生产出来。这是由一个简单的规律所致。“是资本价值本身不断贬值的规律,使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失去作用,否则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就会成为荒谬的东西。你(恩格斯——引者注)提出过一个论点,认为没有一个工厂能够抵偿它的生产费用,其原因也在这里。因此,蒲鲁东不能通过施行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9~330页。

一种即使他不提出而社会实质上也在遵循的规律来改造社会。”<sup>①</sup>

蒲鲁东赋予银行以重要的使命,银行是他赖以实现一切目的的手段。银行业务分为“把资本变成现金”和“以货币的形式贷出资本”。就前者而言,人们提供的只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就后者而言,利息要依资本的数量而定。“蒲鲁东把这第二项看得同第一项一样容易,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利息降低多少,资本的价格就以同样的比例提高多少。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sup>②</sup>

关于关税与利息的联系,马克思希望恩格斯通过蒲鲁东的原著去研究,并对未来的变革作了预测。他说:“我越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我就越确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sup>③</sup> 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有价值部分:“同路易·勃朗等人相比,这部著作是很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卢梭、罗伯斯比尔、上帝、博爱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东西作了大胆抨击。”<sup>④</sup> 恩格斯在8月2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 5.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影响

蒲鲁东主义由于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不得不改变其自身的理论存在形式。马克思的理论客观上对蒲鲁东本人产生了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0~3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1~332页。

定的影响。恩格斯在 1851 年 8 月 21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首先指出了这种影响。恩格斯在谈到蒲鲁东的假哲学的历史结构时指出:“革命前,产业阶级处于自在的状态,从 1789 年到 1848 年处于对抗的状态:否定;蒲鲁东的合题要一举解决这一切。我觉得,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是决定性的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等的论点,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制造了把无产阶级反过来纳入到资产阶级中去的假象。”<sup>①</sup> 据恩格斯所知,“艾韦克先生已经把他翻译的《宣言》,可能还把你(马克思——引者注)在《评论》上发表的那些文章的译文也交给蒲鲁东了。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无疑是从那里偷来的,例如,政府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权力,它将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而消失。其次是关于 1848 年以来的法国运动的许多重要思想。我不认为,这一切都是他(蒲鲁东——引者注)在你反对他的那本书里找到的。”<sup>②</sup> 恩格斯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些文章”是指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反对他的那本书”,指的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也认为蒲鲁东从他那里剽窃了一些思想。马索尔在 1852 年 7 月 25 日曾致马克思一封信。马索尔在信中认为蒲鲁东在其新作中似乎采取了与他 40 年代的著作相反的革命立场。马索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朋友。马克思曾把马索尔的 7 月 25 日来信寄给克路斯看。克路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同魏德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克路斯在 11 月 2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马索尔的看法是否正确表示怀疑。克路斯认为蒲鲁东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教条主义者的观点,是与革命思想根本不同的。马克思认为马索尔和克路斯两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5 页。

揭露蒲鲁东剽窃了自己的思想。马克思在12月7日致克路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关于蒲鲁东，你们两人都正确。马索尔所以有此错觉，是因为蒲鲁东以他惯用的精明的欺骗手段，从我这里剽窃了一些思想，宣称这些思想是自己的‘最新发现’，例如：认为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科学；一切都必须根据物质关系来加以解释等等这样一些原理。他在他论路易·波拿巴的书中公开承认了我早就根据他的《贫困的哲学》所论证了的东西，即承认小资产者是他的理想。他说，法国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1)资产阶级；(2)中等阶级（小资产者）；(3)无产阶级。历史的目的，特别是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两极——第一个和第三个阶级——溶解在第二个阶级之中，即中庸之中，而这一点靠蒲鲁东的信贷业务就能达到，此种业务的最终成果应该是废除各种形式的利息。”<sup>①</sup>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巨大影响，还可以从蒲鲁东书信中的一些话得到证明。蒲鲁东在1844年10月24日致贝尔克曼的信中写道：“……联合、道德、经济关系——这一切必须从它们的具体表现加以研究，如果人们想避免作出任意的结论的话。必须放弃出发点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迄今哲学家和立法者所固有的），必须到正义与善这些模糊概念的范围之外去寻求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些概念的规律，这些规律对我们来说在客观上应当是对经济因素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的结果。”<sup>②</sup> 正如科尔纽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在蒲鲁东先前的著作或后来的著作里，我们都看不到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显然是受到了马克思的直接影响。

## 6. 恩格斯对蒲鲁东的批判

除了在与马克思的通信中批判蒲鲁东外，恩格斯在1848年12月和1851年还写有两篇专门批判蒲鲁东的文章，尽管这两篇文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5页。

②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0页。

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但实际上构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主义的重要内容。

1848年12月初,恩格斯写了《蒲鲁东》一文。该文指出,蒲鲁东第一次受到公众的注意是由于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他在书中论证“所有权就是盗窃。”路易·菲利浦的政府竟将蒲鲁东推上被告席。结果法庭无法根据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给他定罪。政府丢了脸,而蒲鲁东却因此成了名人。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是以“所有权就是盗窃”的精神写成的。恩格斯从道德、经济、法律三重角度指出:“该书包括的内容,部分是关于道德法律方面的论断,部分是关于道德经济方面的论断。其中每一个论断的目的都是想要证明:财产是以矛盾为基础的。至于法律方面的论据,那是可以同意的,因为再没有比证明全部法学都是以一大堆矛盾为基础的这一点更容易的事了。至于说到经济方面的论断,那末其中很少包含有什么新东西,即使有,也是以虚假的计算为基础的。三重规则到处都遭到了恶意的破坏。”<sup>①</sup> 道德意识渗透在法律和经济的论述之中。

在论述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时,恩格斯指出:“在这部应使他名垂千古的著作中,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之新颖,以致它在《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 or Offices》[‘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或交换所’]的名称下,早在十年以前就在英国十个不同城市中破产过十次了。”<sup>②</sup>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对以往一切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极其粗暴的指责。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68~6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69页。



这部著作按其思想方式和语言来说,要比蒲鲁东那部矫揉造作的荒唐东西千百倍地更带法国味。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以及《贫困的哲学》中,根本没有批评现存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关于社会改造的计划“早在许多年以前就在英国的无数次破产中光辉地表现了自己。”革命前的蒲鲁东是如此,革命中的蒲鲁东如何呢?“革命把公民蒲鲁东从理论领域推到了实践领域中,从他的斗室推到了讲坛上。这位固执的、高傲的无师自通的学者,对他以前的一切权威——法学家、院士、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持同样的轻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贬为荒诞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则誉为新的救世主,这个人在他本人应当帮助创造历史的时候,表现得怎样呢?”<sup>①</sup>蒲鲁东的伪科学的经济学原理令直观思维的路易·勃朗难以驾驭。

蒲鲁东在法国议会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恩格斯说:“蒲鲁东生平最大的胜利,是他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赢得的。我已记不清他发言谈什么问题了,只记得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钟头,激起了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狂怒,因为他讲的纯粹是蒲鲁东式的奇谈怪论,一个比一个更荒诞,而且每一个都是要最粗暴地侮辱听众的最神圣、最高贵的情感。这一切都是用他所特有的枯燥的迂腐的冷漠态度、用平淡的迂腐的勃艮第方言、用世界上最冷酷沉着的声调说出来的。效果——发狂的资产者的舞蹈病——的确不坏。”<sup>②</sup>这的确又是蒲鲁东社会活动的顶峰。

恩格斯写的第二篇批判蒲鲁东的论文是《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该文是对蒲鲁东1851年出版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评价。马克思曾计划写一篇题为《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卡尔·马克思评》的著作。1851年12月底,《革命》杂志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71页。

载了一则行将发表马克思论蒲鲁东的著作的广告。但由于该杂志停止出版和没有其它的发表机会,该著作马克思没有写成。恩格斯的这篇评价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马克思原打算把该文发表在《革命》杂志上。但在1851年11月24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在这里又读了一遍你的批判。可惜不能出版。如果再添上一些我的废话,它可以由我们两人一起署名出版,不过不能给你的商号造成任何不便。”<sup>①</sup>

在《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中,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做了大量的摘录,其间夹有恩格斯本人的一些评论文字。恩格斯摘录了该书开头的第一句话“致资产阶级”。认为蒲鲁东的“论题是以历史宣言的形式陈述的。”蒲鲁东正文的七篇论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发挥:“(a)以前的秩序;(b)革命时刻的政党;(c)解决办法,即本来意义上的革命。”<sup>②</sup>恩格斯所摘录“第一篇反动造成革命”共有六段。在摘录到“革命正是由反动决定的”时,恩格斯作了这样的评价:“对反动和迫害如何逐渐使国家的大部分革命化,对‘永恒的秩序之友’资产阶级本身如何受到怀疑、因此受到排挤、从而被赶进革命的怀抱,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直叙述到新的选举法。”<sup>③</sup>

恩格斯对第二篇“十九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共摘录了32段。在摘录蒲鲁东的革命的问题在于到处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秩序[Le régime égalitaire],即工业秩序”这句话时,恩格斯认为“似乎这一点并没有尽力去实现!”。蒲鲁东说:“我把某些活动原则,即:分工、竞争、集体力量、交换、信贷、财产,称为经济力量。他们对劳动和财产的关系,也就是阶级区别、代议制、世袭君主制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管理集中化对国家的关系。”恩格斯的评价是：“对比得不错！”<sup>①</sup>恩格斯批评蒲鲁东把卡尔利埃的“资产阶级措施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蒲鲁东用例子或引文来证明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而他们的收入则像马尔萨斯所推算的那样按算术级数不断减少。”蒲鲁东根据法国官吏的人数推算出的 1848 年投票的人数超过 650 万。而“寻私舞弊是一切集中化的直接后果”，这就证明“十九世纪革命有充分的理由。”这就是蒲鲁东的结论。

“第三篇论联合的原则。”恩格斯在摘录这一篇时做了较多的评价。在蒲鲁东看来，“对一切体系来说，这个原则就是联合。‘联合并不意味着经济力量的均衡’……联合原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总是导致体系，而以体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然变成宗教……联合不是‘经济力量’，贸易才是这样的力量，因为‘不管运输的物质条件所提供的服务如何，贸易本身是消费的直接刺激者，因而是生产的原因之一，是创造价值的起因、形而上学的交换形动，和劳动一样是实物和财富的生产者，虽然它创造实物和利益的方式与劳动不同……因此，靠没有任何投机倒把的生意而发财的商人，完全有权享受已获得的财产；这种财产同劳动得来的财产一样合法。”恩格斯在摘录了上述内容之后指出：“这位资产者在这里忘记了，不掌握资本，我决不能从事商业，而只能为他人、为资本家劳动；这样吹捧商人实在太妙了。”<sup>②</sup>蒲鲁东称之为“经济力量”的东西，是这样一些对他有利的资产阶级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形式，甚至交换和生产的最一般的形式，“蒲鲁东也只能按照其资产阶级面貌去理解。”在蒲鲁东那里，交换融化在贸易之中。

针对蒲鲁东的“属于经济力量的还有集体力量”的观点，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集体力量至少看起来是某种永恒的东西，那么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3 ~ 174 页。

它因而仅仅是一种把社会存在本身变为经济力量的尝试。没有社会,正如没有集体力量一样,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没有任何交换……其实,蒲鲁东所津津乐道的集体力量的原始的、不发达的形式(在建造方尖碑、金字塔等时的大规模的劳动)几乎早已被机器、马匹、分工等等所排挤,并完全被另外的形式所代替。”<sup>①</sup>蒲鲁东视“竞争、分工、财产等”也为“经济力量”。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指出:“如果说贸易、竞争、分工等等是经济力量,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认为例如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纸币、地产析分、大地产、为雇佣劳动、资本和利息也是经济力量。对这里列举的每一种力量,都不难作出像蒲鲁东对前者所作的那种称颂。而关键也就在这里。”<sup>②</sup>蒲鲁东在承认这些力量关系的同时,又错误地称这些关系为“实际上非物质的”。认为“贸易是纯道德”的行动,“贸易也是创造性行动”。

“第四篇论权威原则。”蒲鲁东赞颂自己发明的“无政府状态”。恩格斯在摘录蒲鲁东的“对政府观念的传统否定”时指出,充满施蒂纳的道德精神。恩格斯还摘录了蒲鲁东“对权威观念的总批判”。对于蒲鲁东的“普选权”部分,恩格斯指出蒲鲁东“平庸而空泛地唠叨二月革命的道德根据。”在摘录“第五篇社会清算”时,恩格斯对“地产”部分作了较为详细的摘录和评价。在“第六篇经济力量的组织”部分,恩格斯指出蒲鲁东的开始部分具有施蒂纳的论调。摘录降低关税的内容时,恩格斯指出:“只要利息降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蒲鲁东就赞成取消关税。”<sup>③</sup>在对第七篇内容的摘录中,恩格斯称蒲鲁东的“没有权威的社会”是“华丽的辞藻”。“以自己的良心向自己的弟兄和整个人类”是蒲鲁东的“新的联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1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

的宣誓公式”。恩格斯后来在《论权威》一文中批判了蒲鲁东的上述论点。

恩格斯的手稿《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的论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无息信贷》一书的《摘录》大约与恩格斯的《手稿》同时写成。马克思在摘录中特别关注货币和利息问题。蒲鲁东的肤浅的观察力使其走上阶级调和论的道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更深入地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本质,才能证明其不可调和的对抗。恩格斯的《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产生时期,正是马克思意识到要与蒲鲁东继续进行政治论战并准备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深入批判的时期。

### 7. 蒲鲁东的“经济学圣经”

马克思在 1857 年 1 月 10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蒲鲁东现在在巴黎出版一部‘经济学的圣经’。我要破坏,我也要建设。如他所说的,第一部分他已在《贫困的哲学》中完成了。现在他要来为第二部分‘揭幕’。这部劣作用德文出版了,译者是路德维希·西蒙,此人现在在巴黎满不错地当了克尼格斯瓦特……的代理人。”<sup>①</sup>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蒲鲁东的“经济学的圣经”是指蒲鲁东的《交易所投机者手册》(Manuel du spéculateur a la bourse)一书。显然,“经济学的圣经”是马克思的一种讽刺。《交易所投机者手册》一书于 1857 年 1 月在巴黎出版。该书系蒲鲁东与若尔日·度申共同完成的。这部书的中篇包含许多资料,其中大半是蒲鲁东委托《人民报》前任编辑度申编写的,并且,该书的头两版是匿名发表的。蒲鲁东在书中提出以工业民主制反对工业贵族制,而所谓工业民主制即为成立工人协作社,因为蒲鲁东在其一生中一直保持着小手工业者后代的本色,始终对现代工业持保留态度。该书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8~89 页。

出版后影响很大,仅在两个多月内就出了七版。

蒲鲁东的《交易所投机者手册》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其所叙述的内容极其通俗、具体。书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大众所关心的热门话题。书中揭露了第二帝国头几年的法国既有交易所、投机企业、金融上种种欺诈行为以及营私舞弊等事大大盛行,又存在日益加剧的贫困、雇佣工人的劳动异常繁重。处于破产中的中产阶级必然落入无产阶级的行列。蒲鲁东认为,在 1789 年革命以前,中间等级只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整体,但后来分成了三个阶级,即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上层阶级包括大资本家、大金融家以及高工资的银行经理、工业家和官僚。中层阶级由中、小工业者,中、小商人和中、小农户构成。被雇佣的工人和职员构成下层阶级。傅立叶曾预言过必然要到来的工业建设制度。蒲鲁东认为傅立叶的预言已经变为现实。上层阶级的出现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现实。蒲鲁东描述了上层阶级对中、下层阶级的剥削规模。50 年前,傅立叶就预言了工业封建制度的必然到来,圣西门派对这种制度也大加赞颂。这种制度现在已经存在,“在交易所开盘但归工业封建主所控制的财产,总共已达 200 亿法郎。”<sup>①</sup>蒲鲁东自认为比付立叶的高明之处,在于其对工业封建制度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就是工业封建制度一定要被工业帝国所取代。在此阶段上,资本和财产更加集中。在工业帝国之后,必然会出现工业共和国,这就是蒲鲁东所设想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就是要把下层阶级提到中层阶级的水平。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蒲鲁东的社会改良方案。

---

① 蒲鲁东:《交易所投机者手册》,巴黎 1857 年版,第 541 页。

## 第五章

### 马克思在理论上深入批 判蒲鲁东时期(上)

1857年7月至1867年,马克思从经济和哲学方面展开了对蒲鲁东的深入批判。蒲鲁东的社会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受到马克思的批驳,但蒲鲁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仍然非常猖狂。蒲鲁东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哲学、政治以及宗教方面的著作。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取代了蒲鲁东主义。

#### 第一节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著述

##### 1.《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

19世纪50年代,是蒲鲁东所处的一个困难时期。由于担心出版其著作带来不测,出版商冷落了蒲鲁东。蒲鲁东的书被查禁,他被迫匿名发表作品。1858年他因出版三卷本哲学著作《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église)而开罪当局。因此,该书被当局列为不法之作,因为它攻击了家庭、宗教、法律和道德。为逃避三年徒刑,蒲鲁东流亡到比利时。1862年以前,他一直生活在比利时。

《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一书论述了蒲鲁东成熟的社会哲

学。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多元论的社会概念。在社会中,以一种动力学的平衡,通过平衡社会力量而自发地获得秩序。社会的激发力量是正义。根据蒲鲁东的观点,正义为“对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的自发尊敬。”<sup>①</sup> 正义即为我们理性官能的产物。它在家庭中被培养出来,并在社会集体生活中被加以强化。与马克思不同,蒲鲁东不把劳动看作是最大的需要,而是视其为自我实现的一种手段。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以及《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作了这样的评价:“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末所有这些著作都像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本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sup>②</sup>

一直对工人协作社情有独钟的蒲鲁东,对现代工业始终持保留态度。在《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一书中,蒲鲁东进一步论述了这一思想。他用“合作”一词代替了“协作”,明确提出建立真正的平民人道主义,即工人人道主义的主张。认为哲学可以在平民教育中得到全部的体现。在描绘平民人道主义时,蒲鲁东坚持与傅立叶和基督教相对立的劳动观。其原因在于傅立叶的体系过于贵族化,缺乏生气。“上帝感召”的思想显然是错误的。蒲鲁东理想中的社会是人们都过着朴素和自豪的生活而又不追求多余的奢侈的社会。虽然他认为傅立叶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是富有成果的,但他对傅立叶主张在法伦泰尔中推行的自由放纵感到厌恶。这表

---

① 霍夫曼:《革命的正义:比·约·蒲鲁东的社会政治理论》,厄巴纳 1972 年版,第 35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5 页。



明蒲鲁东是个真诚地推崇道德的人。根据蒲鲁东的观点,劳动的宗教是同基督教相对立的。沉思并不比劳动更重要。对过细的分工和专业化,蒲鲁东持反对态度,主张借助全面学艺来培养新人,而大工业把精神装进机器必然使劳动者变得愚蠢。手工业者之所以是个完人,就在于其在沉思时对国家和教会的权威感到担心,并经常提醒自己要反对享乐者和暴君。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中世纪的过时的手工业思想。恩格斯后来在《论住宅问题》中也揭露了蒲鲁东反对现代工业文明的错误思想。

在《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中,蒲鲁东在论述自己的经历部分表露了自己的一些思想。在谈到贫穷时,蒲鲁东说:

“人们通常痛恨贫穷,似乎贫穷使造物主的体系沾上了污点,那是不应该的;至于那些家庭贫苦的人却想把贫穷逐出门外,更是大错特错了。以上是现制度下安居乐业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想法,贫困的呼声使他们深感不安和愤慨万分。

法朗什—孔代的妇女有一句至理名言:穷人不是恶人,但比恶人更糟! 老爷,你听见没有,穷人比恶人更糟? 多么革命的思想! 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第一堂实践哲学课;而且,我承认,从我开始记事起,再没有别的话比它更能引起我的深思了。”<sup>①</sup>

中学时代的蒲鲁东对在课文中找到的“贫穷之苦莫过于遭人耻笑”这句至理名言深感震惊。在国家中,穷人无理可言,甚至是“嫌疑犯”。因此,神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拉梅耐主张“让穷人住嘴!”蒲鲁东对道德家们提出了质疑:“有些道学家,甚至是一些拥护共和制的道学家,他们的道德就是不能容忍在群众面前讨论财富、工资、所有权、产品分配、福利等问题。如果群众去讲义务、牺牲、无私、灵魂升天和灵魂不灭的希望,他们一定鼓掌欢迎;至于物质福利,且慢! 在一个共和国里,贫穷的出现是不合时宜

---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0页。

的：让穷人住嘴！”<sup>①</sup>当然，蒲鲁东也是想发财致富的，因为他承认财富本质上是人人都需要的好东西，即便哲学家也不例外。但在无条件情况下，对财富的欲望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只要有穷人存在，我个人发财也无济于事。”蒲鲁东引用凯撒的“不获全功暂不罢休”这句话来表明自己的心态：天下穷人都和他是一家人。“哪怕世上惟独我一人贫穷，而所有其他人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也该多么好呀！我将甘愿一无所有，决不以粗暴无礼的抗议声而使我的国家和我的时代蒙受羞辱。”<sup>②</sup>

在引用法朗什—孔代妇女名言的同时，蒲鲁东对待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着他独特的见解。早在1849年给塞纳省选民的宣言中，蒲鲁东就曾公开宣称：管理家务是最理想的事情，家庭是妇女的王国。家务管理是财产的首要基础和支柱。蒲鲁东想不出妇女在家庭和家务之外还有什么前途。他认为1848年的革命没有毁坏也不能毁坏家庭，只应是改革家庭的经济基础。因此，他反对消灭父权制、限制继承原则、限制赠与权和遗嘱权以及对其课税的任何民法。这表明崇拜自主的个人和自主的人民的蒲鲁东，又给自己制造了对家庭的崇拜。蒲鲁东所理解的个人不是个人本身，而是作为一家之主的个人。由于否定了家庭中两性之间的平定，掌权的当然只是男子家长，而妇女只不过处于高等女工的地位。蒲鲁东视家庭为基层的政治细胞，自然界创造男子和妇女就是要其在一起构成统一“经济细胞”。妇女和男子在这种细胞里的功用如何呢？蒲鲁东在《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一书的第三卷中这样写道：

“妇女是低于男子的人，是介乎男子和其他动物之间的一种中间环节。如果把男子的精神力量作为3，那么妇女的就是2。可是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中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是共同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活动而且是彼此互乘的,所以男子的肉体和精神财富同妇女的肉体和精神财富相较将是 $3 \times 3:2 \times 2$ ,也就是9:4。

同我们比起来,妇女是漠视道德的人。

妇女只承受。如同妇女从男子接受胚胎一样,妇女也从男子承受智慧和义务。

妇女天生是不生产的、没有积极作用的、没有职业和理解力的(sens industrie et entenment)、没有正义和贞节的,所以她们需要父亲、兄弟、爱人、教师——一句话,需要男子使她们振作起来(animation),使她们能够英勇并赋予她们社会能力和精神能力。”<sup>①</sup>

显然,在由男子和妇女共同组成的“经济细胞”中,男子是创造性的和积极的因素。蒲鲁东肯定妇女的作用不低于男子的作用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肯定的是男子才是自主的和自由的个人,妇女的作用只不过是从属的。作为一个保守分子,蒲鲁东对家庭关系的理解是粗鲁的。当他狂妄认为妇女只是受支配的女工时,这表明他是独断的家长。蒲鲁东对妇女的看法与德国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尼采的观点有极其相似之处。

蒲鲁东在《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一书中,记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感受。他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爱,这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曾经是个牧童。蒲鲁东认为:“人对动物、对一切存在物,都有秘密的同情心和恶感,这些感情都被文明所抹掉了。”他常常含泪阅读由费尼隆翻译的索福克勒斯所写的《斐罗克忒提斯的告别词》:“啊,幸福的日子,温暖的光明,经过多年的等待您终于来到了!我服从您的命令,我向此地告别后就要出发。再见吧,亲爱的洞窟!再见吧,芳露润湿的草地上的女神们!我将再也听不见这大海低沉的浪涛声。再见吧,海岸峭壁,我在您身边多少次听着风声的诅咒而痛苦!再见吧,海角,您的回音多少次重复了我的悲声!再见吧,清甜的泉水,我尝够了您的苦味!再见吧,莱莫(爱琴海中的一个

①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说史》第3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72页。

小島——引者注)的土地!既然我将到上帝和我的朋友们召唤我的地方去,请让我平安地出发吧!”<sup>①</sup>蒲鲁东对此有着亲身的体验,不为童年时期对神的信仰而感到后悔。在自由自在的生活中,他理所当然地不去思考财富不平等的起源和信仰的奥秘。蒲鲁东说:“尽管我受过洗礼,我不知不觉地奉行的却是一种泛神论。泛神论是孩子和野蛮人的宗教;这是受年龄、教育、语言所限制,过着感性生活,尚未达到抽象和理性的那些人的哲学;在我看来,应该把达到抽象和理性的时间推得越迟越好。”<sup>②</sup>

蒲鲁东对死神的赞颂。在《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一书的第五篇中,蒲鲁东称自己的父亲是面对死亡的勇士。作为一位纯血统的自由思想者,蒲鲁东的父亲是在一次革命的圣餐中结束了自己生命的。从其行为中,无法证明他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他既不祈祷也不渎神。蒲鲁东肯定自己的父亲只是专心于自己的店铺,没有背上沉重的信仰的包袱。当人们对他说,人死后要去见上帝,上帝的慈悲是无边的时,蒲鲁东的父亲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我根本不想上帝。我既不害怕也不希望;我死的时候,身边围着我所爱的人,我心里就有我的天堂。”蒲鲁东感到,自己的父亲弥留之际,汇集在其心中的是友谊、良心和祝愿。父亲是一位从容面对死亡的勇士。他胜过基督教徒,是幸福的。蒲鲁东说:

“他(蒲鲁东的父亲——引者注)临死不惧,怀着爱心迎接死亡。他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孩子们,使自己溶化在家庭之中,同时让自己的躯壳作为无用之物而留给土地。这样的人决不是唯灵论者、神秘主义者或基督教徒;他是社会现实的体现,是正义的体现。

今天,那些既不信基督又不信革命的人们发明了一些卑鄙齷齪的办法对待弥留的病人。他们围着病床,使尽种种阴谋,向病人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46页。

掩盖真相：他们又哄又骗，让他服科罗方麻醉剂，使病人没有想到死就一命呜呼了。没有临终嘱咐，没有灵魂交托，没有立下遗嘱。死得就象条狗一样。

死神呀，爱神的姐姐，你永远贞洁，永远多产！我在青年时代的第一声叹息中，我已经认识了你，每缝我的公民热情奔放的时候，我感觉到你；我已有三十余年的劳动生活可以奉献给你。温柔和幸福的死神，你怎能使我害怕？我怀着爱情和友谊崇拜着你，我在永恒的真理中思考着你，我在使我身在贫穷而不知贫穷的大自然中培育着你，我在我的灵魂中建立了你的庙堂，我不断地向你祈求。死神呀！你是至高无上的正义！”<sup>①</sup>

这里的虔诚和情调，令人想起了古罗马的奥古斯丁对神的赞颂和忏悔。蒲鲁东没有对道德失望。他希望别人来完成由他开始拟定的遗嘱。他坚信人们会理解“抱必死决心的人决不受奴役”这句话的含义的。长期蒙受污蔑的“死神”，实为令人难猜的宗教的斯芬克斯之谜。这一谜底将使人类摆脱恐怖。死神“是惟一的、有生活的和真正的基督。”诚实的良心和对生活的担忧，使得蒲鲁东左右为难。如果找到了这一向基督教教义提出的谜语的谜底，蒲鲁东的宗教信仰就有全部葬送的可能。

集体力量和社会权力。根据蒲鲁东的观点，作为现实的社会权力，其表现形式是集体力量。“任何人，只要他是一个存在，只要他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一个幻影，他在同别人交往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吸引和被吸引、排斥和被排斥、运动、行动、思想、生产的能力或品性，至少他一定具有因其惰性而抗拒外界影响的能力或品性。”而“这种能力或品性，人们称之为力量。”<sup>②</sup> 作为人的固有的和内在的基本属性，力量是人的现实性的惟一凭证。个人和集体都拥有力量，构成集体的力量是单个力量集中的结果，但不是单个

---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

力量的机械相加。这就体现在处于集体中的个体所发挥出的力量要大于个体处于单独状态时所发挥出来的力量。蒲鲁东用集中在工场中的个人、一艘船的船员、一家合股公司、一个科学院、一个乐队、一支军队等来说明综合性的力量是具体的集体所特有的,其高于组成某个集体的各单个力量的总和。个体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性。统一原则是力量之所在。由此,蒲鲁东得出了与传统形而上学相反的结论:“1. 既然力量是某个集团或机构的产物,这种力量的强弱和优劣就可以如同形状、音响、味道、硬度一样为人们所认识和分类;2. 因此,集体力量虽然和个人力量完全不同,但都是可以求证的事实,集体和个体同样有资格成为现实。”<sup>①</sup> 这种集体力量,由原本的机械的和工业的本体现象而构成政治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蒲鲁东的这种“集合力”理论。

## 2.《联邦的原则》

《联邦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是蒲鲁东的一本后期著作。这是蒲鲁东的一部较为成功、重要的著作。在该书中,他提出了政治契约概念。这一概念与他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中所坚持的政治契约概念是相平行的。蒲鲁东意识到,人们需要组织,因为组织构成社会并且是与不同于经济交易的政治目的相联系的。政治契约与订约双方具有互惠的义务,目的在于确保双方在遵守契约的条件下获得较多的权力和自由。政治契约要具备自身的品格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政治契约必须是双边的和交换的;二是政治契约的目的必须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蒲鲁东否定了在民主政体下真实地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在代议民主制、君主立宪制或柏拉图式的公产制共和国中,政治契约作为连结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纽带是不平等的、非对等的。事实表明:“契约在以上所有的政体中都是越轨的和代价高昂的,因为相当多数人

---

<sup>①</sup>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不能从契约得到补偿；而且契约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即使契约许诺的少量利益也得不到保证。”<sup>①</sup>

政治契约与联邦具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契约可以转化为联邦。蒲鲁东说：“为了使政治契约根据民主观念的要求而具备双边性和交换性的条件，为了使政治契约限制在理智的范围之内，从而对所有人都有利和方便，必须做到：1. 集成为国家的公民从国家所得到的利益应该等于公民所放弃的利益；2. 除了为求得国家的保障而成立契约的特殊目的外，公民保留其全部自由、主动和能动性。政治契约一旦根据以上理解作出了调整，就是我所说的联邦。”<sup>②</sup> 联邦契约的本质是签订各方不仅双边地和交换地互相承担义务，而且在订立盟约时，“各自所保留的权利、自由、权威和所有权要多于他们所放弃的那部分权利、自由、权威和所有权。”民法中所认同的共同体实即一种微型的极权国家。加入这一团体的人们受到种种限制和约束，而自己保留极少的主动权，苦修苦练的生活使人们难以达成此类契约。使入约者失去独立的盟约是一种过分的、使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盟约。在蒲鲁东看来，联邦契约的目的旨在保障加入联邦的各国享有领土和主权完整，以及各国的公民自由，并调解各国之间的争端，使得各国共同兴旺发展。蒲鲁东向往的是联邦共和国而不是统一的共和国。根据一种虚假的经济理由无法结成联邦，而只能是向专制主义迈进。蒲鲁东指出：

“联邦制是等级制和集权制的对立面，而等级制和集权制正是君主制民主国、立宪君主国和统一共和国的显著特点。联邦制所特有的根本法则是：中央当局的职权有明确的有限制，并且随着加入联邦的国家的增加，这种职权在数量上、效能上，甚至我敢说，在强度上都将日渐削弱。相反，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里，最高当局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

职权的数量、范围和效能却随着地域的扩大和居民的增多而成倍增长,亲王越来越把个人的、行会的、公社的、各省的事务划归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在这种制度的压迫下,不仅各公社和各省,而且个人和民族,统统丧失了自由。”<sup>①</sup>

如果公民从国家中得到的利益对等于自己所放弃的利益,公民在订立契约的同时仍保留全部的自由。这就是蒲鲁东意义上的政治契约实现了向联邦的转变。在此意义上,政治契约实即联邦。作为等级制和集权制的对立物,联邦制有其自身的根本法则:限制中央当局的权限,意在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和民族的自由。联邦具有盟约、契约、条约、公约、同盟等含义。蒲鲁东关注的是联邦与契约的内在联系,而且这里的契约是政治契约,不是经济契约。不过蒲鲁东在《联邦的原则》中所提出的政治契约概念与其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中所坚持的经济契约概念是相平行的,而且联邦的存在并不否定国家的存在。但尽管国家仍将存在,其职能都将被限制为“一般的管理,即提供保障和监督管理(Supervising)。”<sup>②</sup>国家在完成所被赋予的任务之后,从而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与现存的国家不同,蒲鲁东的联邦国家是组织的自由协定的产物,而组织又是依靠国家权威形成的。因此,执行国家命令与组织的利益是一致的。国家应由协定的每一方所认可的并且可以随时更换的代表组成。国家的功能应限于那些在协会的契约范围之内的事。就联邦的双方而言,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权限来修改契约的条款。

就蒲鲁东仍然强调自我假定契约而言,蒲鲁东的社会契约概念不同于卢梭的社会契约概念。在卢梭那里,社会契约是法律家想象中的一种虚构。卢梭用社会契约概念来解释国家的形成以及政治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是把原来被认为属于自然法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② 蒲鲁东:《联邦的原则》,多伦多1979年版,第49页。



则和宗教法则范畴的东西恢复到理性的法则。契约的订立是为权威提供理性的辩护。在蒲鲁东的理论中,联邦制的社会契约已不再是一种虚构,是积极的、有效的契约。它“实际上是由订立契约双方提出,经过双方讨论、投票表决后而敲定,并可根椐订约双方的‘意愿’适当修改契约。”<sup>①</sup>

由以上论述中可知,与《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不同,蒲鲁东在《联邦的原则》中对国家的具体角色作了清楚的论述。这是他在对政治的探讨过程中所作出的“决定性的让步”。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宇宙中的无政府状态在道理上是一样的”。蒲鲁东在政治方面的让步,正是基于上述这一重要思想。如果说蒲鲁东的联邦主义方案与他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中所提出的方案有什么不同的话,就在于国家的作用被降到了最低限度,并且政府不能仅仅是融于社会经济组织之中。上述两个方案的共同点是:社会被设想为由不同的自发组织构成的,而每一组织都可以民主的组织形式、自由地与另一个组织结成联邦,旨在其互惠。

### 3.《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

1863年,蒲鲁东开始鼓动以弃权来抗议拿破仑三世的独裁。1864年,他对《六十人宣言》作长篇评论。这就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部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1865年1月,蒲鲁东在弥留之际,口授了《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的最后一章。该书于蒲鲁东死后由其遗嘱执行人古斯塔夫·肖表发表。蒲鲁东把这本书“献给曾向他请教过选举问题的几名巴黎和卢昂的工人”。马克思在1873年于伦敦所写的《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具体评价了蒲鲁东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马克思所引用的版本是该书巴黎1868年版

---

<sup>①</sup> 蒲鲁东:《联邦的原则》,多伦多1979年版,第39页。

本。

《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是蒲鲁东的政治遗嘱。在该书中，他主张工人阶级要彻底摆脱资产阶级的协会。他极力主张工人阶级要完全拒绝参与资产阶级的政治。他建议工人们组织自己的自治组织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抗衡。他强调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需要结成联邦。关于农工联盟的观点，蒲鲁东早在《联邦的原则》一书中就已提出。由于时代变了，作为观念革命的合理后果，利益革命也必将随着发生变化。蒲鲁东大胆预测，“20世纪将是联邦时代的开始。”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完成了劳动和财产方面的革命，就会非常顺利地在职体方面进行革命。蒲鲁东自认为“要向统一的共和制进攻和要建立联邦的共和国”是他的独到的见解。联邦政府在实行政治改革后必须辅以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在谈到经济改革的内容时，蒲鲁东说：

“从政治观点看，两个或几个独立国家，为了互相保障各自的领土完整和维护各自的自由，可以结成联邦；同样，从经济观点看，也可以为了互相保护商业和工业而结成联邦，这就是关税同盟；还可以为了修建和维护渠道、运河、铁路等交通渠道，为了建立信贷、保险等事业而结成联邦。这些性质不同的联邦，其目的都是要使加入联邦的各国公民摆脱国内外资本家和银行寡头的统治；这些联邦合在一起，同今天占着统治地位的银行贵族相对立，就是我所说的农工联邦。”<sup>①</sup>

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蒲鲁东进一步强调农工之间的联邦。工人和农民，由于自身的直接行为和团结，将会逐渐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阶级，一个政治力量正在增强的阶级。在蒲鲁东看来，事实上，四十多年以来，城市居民中存在工人和资产者分离的倾向，在农村居民中同样存在着乡村平民和地主贵族的互相

---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

分离的倾向。在城市中,以往的封建原则在经过改造后被保留了下来,并继续向前发展。在乡村,农民却要通过自由地占有土地而逐渐求得自己的解放。由于城里人和农民对所有权的认识不同,从而造成了城里人和农民各走各的路的现象。前者追求年金,而后者的目标则是劳动的独立和农业生活的宗主权。农民和资产者都懂得采邑和自耕“这两个词反映着两种权利,两种不同的范围的事实、两种对立的倾向。”蒲鲁东认为双方不可能停止这种对立。农民的灵魂一直是囿于自耕思想之中。农民“愿意独自据有土地,然后以此为手段,使自己成为城市的主人,并要城市俯首听命。这种以农业压倒工业的思想和为古罗马的最高统治奠定了基础的那个思想是一致的。正是那个思想使古罗马的农民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工商业强国;正是那个思想后来又支持了封建制;它也是十八世纪重农学派的主张;它在今天当然也还没有绝迹。”<sup>①</sup>此外,乡村的平民和城市的平民受着同一种思想的指导。在城市,劳动者试图借助提高工资,通过结社、互助和成立合作社等办法来排斥资产阶级;农民所采用的是采用提高短工和仆役的工薪、限制地租、自己经营小块土地等等办法。在蒲鲁东看来,上述两种方法由于缺少统一的指导思想、组织和策略而未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

在论述农工联邦时,蒲鲁东在更为广阔的革命背景中来考察农民。虽然 1848 年共和国给了农民以选举权,但农民却依然把皇帝当作自耕权的象征,把资产阶级的保护人和小贵族的首领当作采邑的象征。随着工业的巨大发展,食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农民必然大发其财。国外市场的开放也给农民带来好处,农民想当然地把这些都视为帝国时期带来的,并为此而感激皇帝。由此,蒲鲁东得出的结论是:“农民的事业就是产业工人的事业;农民的共和女神就是工人的社会女神。他们的敌人也是共同的。”<sup>②</sup>但蒲鲁东不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9 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4 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9 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5 页

认为工人应该以农民为榜样,而工人应向农民作出表率,自己当家作主。蒲鲁东对需要解决的农工联邦的新问题作了预测:“实现工农业的结合,并以此为手段使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和解;按照互助原则和联邦原则重建所有权;发展新体制下的农业阶级;在有利于工人和农民的条件下解决信贷、保险、房租、肉食、蔬菜、饮料等问题。”<sup>①</sup>

突出了工人在联邦中的地位之后,蒲鲁东论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在论述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形象时,首先要规定“能力”一词的含义。蒲鲁东所讲的能力具有法律能力和真实能力这样两种不同的意义。这当然是对能力涉及到公民时而言的。法律能力是法律赋予的能力,其“意味着公民具有真实的能力”。不难理解,如果一个人天生丧失能力,他就不会被同意享有权利。如果在1848年革命以前,人们认为财产是真实能力的保障;在1848年革命中,选举权是同男子和公民的身分紧密相连的。这些都不过仅仅是法律的幻想。而幻想并不构成政治能力。若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角度来研究政治能力,就应该抛弃以上的幻想而抓住真实的能力。蒲鲁东说:

“任何人或个人、团体或集体要有政治能力,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

1. 这个人要有自我意识,要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价值,以及自己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有权要求担任的职务和自己所代表或体现的利益;

2. 作为这种自我意识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个人应该确认自己的思想,就是说,要善于把自己存在的法则从原理到结果用思维去意会,用语言去表达和用道理去说明;

3. 这种思想一旦作为主张而提出,这个人还必须能够根据情

---

<sup>①</sup>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106页

况的需要和变化,从这种思想中推导出实际的结论。”<sup>①</sup>

以上三条是任何要拥有政治能力的主体所必备的条件,缺一不可。意识可决定能力的大小,但不能创造能力。具有政治能力并不等于具有处理国家事务和担任某项公职的特殊天赋。蒲鲁东强调,具有政治能力是指意识到自己是集体的一员,确认由此产生的观念并为实现这一观念而奋斗。“因此,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同过去的贵族阶级一样,它是否具有政治能力就取决于:1. 从工人阶级同社会和同国家关系看,它是否具有了自我意识;它作为一个道义的和自由的集体存在,是否独立于资产阶级;它是否在利益方面同资产阶级相脱离;它是否决心不再同资产阶级相结合;2. 它是否具有一种观念,即它对其自身的结构是否创造了一种概念;它是否认识到自己存在的形式、条件和规律;它是否预见到这种存在的命运和终结;它在它同国家、民族和世界秩序的关系中是否能认识自己的作用;3. 最后,工人阶级是否能从这一观念中为如何组织社会得出自己特有的实际结论,并且在资产阶级垮台或引退的情况下,创造和发展一种新的政治秩序。”<sup>②</sup> 这就是蒲鲁东所讲的政治能力,集体的和真实的政治能力。由自然和社会所造成的这种能力是人类精神运动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只存在才能和意识方面的不平等,而政治能力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不能成为任何人的特权。

对照上述三个条件,蒲鲁东对工人阶级是否具备政治能力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工人阶级虽然在 1848 年革命中就取得了自我意识,具有了一种适应自我意识的观念,但工人阶级还未完全发现这一观念,还屈服于各种政治成见。“工人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只是刚诞生的婴儿;虽然由于他们人数众多,他们一开始采取主动行

---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9 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8 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9 辑,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9 ~ 110 页。

动,就使政治秩序转移了中心并使社会经济发生了动摇,但是由于他们处于思想混乱之中,由于他们从垂死的资产阶级那里接受了种种政治幻想,他们还没有能确立自己的优势,他们甚至推迟了自己的解放,并在某种程度上危害了自己的前途。”<sup>①</sup>与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与大机器生产联系在一起,赋予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的重大历史使命不同,蒲鲁东完全是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看待工人阶级。他所看到的当然只能是工人身上所表现出的软弱、盲从、可悲的现状。以自我意识的观点来衡量工人阶级,必然陷入哲学的思辨。蒲鲁东所观察到的社会主体——工人阶级,只能是表现为社会之外的人。

工人和农民最终将以平等和正义的互助政体取代资产阶级的政体。蒲鲁东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其互助主义理论。他所关注的是,“一旦用互助、互相、交换、公平的这个观念去代替权威、共同体或慈善的观念,人们怎样才能够在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建立起一种旨在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关系体系。”<sup>②</sup>蒲鲁东的互助思想涉及到对人和公民同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的理解。在卢森堡宫派那里,人和公民同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一种从属的关系,由此而产生的政府必然是权威的共同体的组织。蒲鲁东的互助主义显然不是这样来理解人和公民同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的。从个人自由的观点来看,不应把社会视为一个等级和能力的阶梯,而是各种自由力量之间的一种平衡体系。从本质上说,这种自由平等的体系“排除了财产、地位、等级的任何意义。”既然人性在世界中是普遍正义的最高表现,人和公民的权利就直接产生于人性的尊严,人“的福利就直接产生于个人的劳动和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他的名誉就直接取决于个人才能和德行的自由发挥……国家无非是平等的、独立

---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111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

的和执法的国民自由结合的产物；因此国家只是各种自由和利益的集中代表；政府和任何公民之间的争端只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争端；因而在社会中除了自由以外没有别的特权，唯有公民的权利才高于一切。”<sup>①</sup>这显然就是蒲鲁东对处于平衡体系中的人和国家安全、人性与正义关系的理解。这就势必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互助原则。用蒲鲁东的话来说就是“以服务换服务、产品换产品、借贷换借贷、保险换保险、信贷换信贷、抵押换抵押、保障换保障，等等。”像互助保险、互助信贷、互相救济、互助教育等等都属互助主义机构之列。如果借助某些机构，把互助原则变为“一种国家宗教”，那将会出现何种状况呢？蒲鲁东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哲学语言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

“从此，劳动者不再是国家的奴隶，不再被共同体的大海所吞没，他是一个自由的人，真正是自己的主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地行事，有把握使自己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得到公平的和有利可图的报酬，而他的同胞则诚实可靠地向他提供各种消费品。与此同时，国家和政府不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权威不再是自由的反题：国家、政府、政权、当局等等都是从另一角度确指自由的术语，都是从以往的语言中借用的一般用语，以便在某种场合确指个人利益的总合、结合、同一和一致……政府、权威、国家、共同体和行会、阶级、公司、城市、家庭、公民，总之，无论集体或个人、法人或真正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唯有法律通过这一机构或那一部门进行统治、裁判和管理：这就是法律的专政。”<sup>②</sup>

这就是蒲鲁东的废除寄生和贫困的互助。而在共同体中会使寄生得以产生，贫困不断发展。显然，蒲鲁东的互助主义是以人性和自由为基础的。他的“人性”表现为孤零零的、抽象的人性。自由在蒲鲁东那里也失去了应有的前提，这是他的撇开社会的考察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问题的方式所致。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则是基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组织结构关系的具体表现。黑格尔哲学的术语在蒲鲁东那里仍然起着一种重要的思辨作用。

以上论述了蒲鲁东的《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联邦的原则》、《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的主要内容。此外,在1857年—1867年这一时期,蒲鲁东还发表了以下一些著作:1860年,出版了《蒲鲁东通信集》。同年,发表了《税收理论》一文,这是蒲鲁东提交洛桑大学的应征论文。蒲鲁东在文中反对间接税,要求以直接税代替间接税,所采用的办法是对于地租和带有公共性质的企业的收入实行课税。这表明蒲鲁东从原来的否定国家并否定作为国家财政基础的税收变为资产阶级国家中现行税收制度的改革者。1865年,马克思对该文作了这样的评价:“几年前蒲鲁东写了一篇论‘税收’的应征论文(我记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 *petit bourgeois tout pur* [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sup>①</sup> 1861年,蒲鲁东出版了《战争与和平》(*La guerre et la paix*)一书。该书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第一卷中,蒲鲁东赞颂战争的崇高品格。只是在第二卷中,他才谴责战争是野蛮和惨无人道的。他论述道,战争的原因是贫困,和平是由工人自己通过经济组织力量获得的。“力量如果是合乎道义的,其就充满着理智,更胜于理智本身。”<sup>②</sup> 恩格斯曾对蒲鲁东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作有专门的摘录和评介。本文后面要作专门论述。1863年,蒲鲁东发表了《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在该著作中,蒲鲁东反对修改1815年维也纳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政策作辩护。马克思对该书的评价是:“他(蒲鲁东——引者注)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也是一样,在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页。

② 《蒲鲁东全集》第7卷,巴黎1927年版,第22页。



里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sup>①</sup>

#### 4. 马克思一生最为重要的理论研究时期

自 1857 年 7 月以后的十年间,是马克思一生中理论探索的辉煌时期。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经济学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同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蒲鲁东主义展开了系统的、全面的、深入的批判,将社会主义奠定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上摧毁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857—1858 年手稿》。这是马克思于 50 年代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是他对自 40 年代以来所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巴师夏和凯里这两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和内在的对抗性矛盾。马克思在手稿中详细地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问题。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马克思从自己在 40 年代已经制定的唯物史观出发,精辟地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关系,突出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历史性阶段,把生产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马克思说明自己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这一逻辑方法同现实即历史过程的一致性,并批判了黑格尔的逻辑方法的唯心主义外壳。正面地阐述了不同于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的所谓“历史方法”的科学方法。马克思还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价值理论的基本要点和一些细节,并在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5 页。《1815 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 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不是蒲鲁东的最后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才是蒲鲁东的绝笔之作。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对后者作了评价。

此基础上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马克思从逻辑的分析与历史考察相一致的观点出发,研究了从原始公社制度到资本主义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过程,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人的发展和人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主要继续批判蒲鲁东的经济范畴理论以及无息信贷理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杰出的经济学著作之一。上面所论述的《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直到1839—1841年才在莫斯科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为书名出版。该书出版时编者所拟的德文书名为: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1858年4月,马克思决定把自己的经济学巨著分成六册来写。第一册打算考察资本,并且拟在阐述资本之前先写若干绪论性章节;第二册——土地所有制;第三册——雇佣劳动;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对外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场。预定第一册包括四篇,而在马克思称为“资本一般”的第一篇中包括三章:(1)价值,(2)货币,(3)资本。现在看来,《1857—1858年手稿》实际上是那时马克思所计划的一部经济学巨著的第一部分的未完成的初稿。在这部初稿的基础上,马克思整理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在柏林正式问世。马克思后来拟定了四卷《资本论》的计划以代替六册书的构想。

《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映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一个重要阶段。该著作明确地表述了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高度科学的见解,分析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和劳动的本性,制定了价值学说,研究了货币的起源、实质和职能问题。马克思在书中还批判地剖析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关于商品、价值、货币以及货币流通的各种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在该书的著名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本身下了经典性的

定义。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①</sup>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基于上述科学的历史观，主要是批判了蒲鲁东对货币的错误理解，因为蒲鲁东的货币理论构成蒲鲁东的无息信贷理论的基础。这是在继《哲学的贫困》、《反思》一文之后，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学的深入批判。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对格雷以及蒲鲁东的批判部分收作德文版《哲学的贫困》一书的附录。

除了《1857—1858年手稿》和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外，马克思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又写下了一部篇幅很大的手稿，即《1861—1863年手稿》。这部手稿的大部分，亦为整理得最为细致的部分，构成《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其余部分，后来经马克思重新修改和补充，形成了《资本论》前三卷的内容。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资本论》前三卷的内容构成了《1861—1863年手稿》的理论部分。《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直到本世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

纪才出版。这是历史部分,未经重新加工,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根据自己在50年代所研究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继续分析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详细地考察了有关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的各方面的问题。在研究剩余价值形成时,马克思着重论述了剩余价值生产同价值规律即等价交换规律的一致性。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以他制定的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总的理论指导,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关系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剥削方式的差别,论述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之间的关系,说明这两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种独立形式。劳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过程,创造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的过程。所有权和劳动的这种分离,是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必要过渡阶段。“如果单个工人作为单独的人再恢复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那只有将生产力和大规模劳动发展分离开来才有可能。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sup>①</sup>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论蒲鲁东》。1865年1月19日,蒲鲁东在巴黎逝世。马克思于1月24日写下了《论蒲鲁东》一文。该文是由于蒲鲁东之死,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施韦泽的请求而写的。在该报的1865年2月第16—18号上刊登了马克思的这篇文章。马克思在1865年3月15日《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明》中指出：“当蒲鲁东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施韦泽——引者注）要求我写一篇关于蒲鲁东的文章。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很快就把文章寄了出去，不过我也利用了这个机会，为的是现在在他自己的报纸上来说明，‘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都违背‘简单的道德感’，而蒲鲁东在政变后向路·波拿巴的献媚是‘卑鄙’。”<sup>①</sup> 马克思的《论蒲鲁东》一文后经恩格斯的校订载于1885年德文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恩格斯在1884年将该文译成了法文。

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对蒲鲁东作了全面的评价。这是自《1857—1858年手稿》以来对蒲鲁东的基调性评价。这一评价与40年代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的评价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蒲鲁东主义的分析批判与《论蒲鲁东》一文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首次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1867年终于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部著作是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这里所涉及的不是鼓动性的词句，而是严密的科学结论。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而且正是德国终于有机会也在这方面作出这种贡献。”<sup>②</sup> 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战胜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我们在考察马克思在1857年至1867年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活动时，主要展现马克思在理论上对蒲鲁东主义的深入批判。这构成了本章以及下一章的主要内容。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1~412页。

## 第二节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蒲鲁东的批判

### 1. 经济关系的历史起源

经济关系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批判了蒲鲁东的作为经济关系的反映的经济范畴理论。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又从经济关系的起源角度进一步深入批判蒲鲁东的经济范畴理论。马克思说:

“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sup>①</sup>

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在把蒲鲁东等人与十八世纪的人们相比较而批判蒲鲁东等人的。这里“十八世纪的人们”,马克思主要指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他们分别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绪论和《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一章第3节中,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出发点。这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类似于鲁宾逊故事。而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不可思议的。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2页。

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在过去就已存在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sup>①</sup>然而,蒲鲁东等人仍然把十八世纪人们的这种看法搬到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显然是错误的。

在十八世纪,单个的人尚未摆脱自然联系。正是因为自然联系才使其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而在蒲鲁东时代的自由竞争社会里,单个的人已经摆脱了自然的联系,社会关系较之十八世纪更加丰富和发达。市民社会已经发展成成熟的形态。这时的个人外在表现为孤立的个人。蒲鲁东等人把这种孤立的个人作为出发点是十分荒谬的。原因在于蒲鲁东割断了历史,在社会之外谈人,没有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个人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孤立的个人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sup>②</sup>蒲鲁东由于不知道经济关系的真实的历史起源,当然只能对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认为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这表明蒲鲁东是在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代替对经济关系的真实历史起源作科学的分析说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指出,蒲鲁东的普罗米修斯实即“作为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的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sup>①</sup>在蒲鲁东那里，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却变成了社会之外的神。社会关系实际上被演变为一种宗教神学关系。这是他诉诸历史哲学来说明经济关系的起源的必然结果。

由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引出一个值得仔细加以研究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对待历史哲学的态度。马克思是肯定历史哲学还是否定历史哲学？当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与马克思对历史哲学的态度有密切关系的问题。首先，要弄清历史哲学的含义。历史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到近代才出现的一个术语。伏尔泰在1765年出版的《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一书的导言中首次使用历史哲学一词。历史哲学是近代在西方出现的一个以历史演变规律和历史理解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枝学科。根据德国学者蒂森的看法，“历史哲学一词出自伏尔泰，但该学科却始自维柯。”<sup>②</sup>1725年维柯的《新科学》一书的问世宣告近代历史哲学的诞生。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以及现代的斯宾格勒、汤因比均属于历史哲学家。

马克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历史哲学有着一致的态度。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德国的哲学与德国的历史的关系。“正像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页。

② 蒂森：《历史哲学史》，波恩1974年版，第73页。



念上的继续。”<sup>①</sup> 因此,在德意志人那里,哲学成了观念历史的遗著。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反映着德国的历史。它是德国现存制度的抽象继续,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黑格尔把现实的历史变成了思辨的哲学史。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构成了历史观的前提。人类变成了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来说,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sup>②</sup> 黑格尔的错误就在于,他既认为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否认现实的哲学家即为绝对精神,又只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这样一来,绝对精神所捏造的历史行动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表明自己对待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态度。如果认为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那就很容易把个别的思想和概念看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就可以从“人”中引伸出人们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结尾处公开承认历史的“神正论”。根据黑格尔,“‘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认识才能够使‘精神’和‘世界历史’同现实相调和——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sup>③</sup> 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历史哲学家,不是抱着与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是视宗教幻想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

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03页。

‘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sup>①</sup> 这种历史编纂学离开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由于黑格尔认为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他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sup>②</sup> 这表明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哲学家们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割裂了历史的现实基础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联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sup>③</sup>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奠定于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描述了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叙述了生产者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产生的历史运动。马克思的结论是：生产的历史趋势“‘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sup>④</sup> 马克思在 1877 年《给“祖国纪事报”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强调指出：批评家们“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种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4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30 页。

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sup>①</sup> 这样,批评家们实际上就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变成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曲解了马克思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含义。马克思以《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sup>②</sup>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不赞成使用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这具体表现为从维柯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因为维柯的《新科学》试图探求“一个永恒的、理想的历史,在时间进程中,每个民族的历史都要遵照它进行”;<sup>③</sup> 黑格尔认为“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对于历史的思维着的考察。”<sup>④</sup> 马克思较为详细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蒲鲁东对经济关系起源的历史哲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再称马克思的哲学为历史哲学,这势必会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混同于马克思所批评的历史哲学。

## 2. 劳动货币

蒲鲁东主义者片面地夸大银行在调节货币市场中的作用。实际上,对银行和货币进行改革根本不可能使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换言之,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只有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实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

③ 维柯:《新科学》,柏林1965年版,第164页。

④ 黑格尔:《历史中的理论》,汉堡1955年版,第25页。

行革命,才能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相适应的交换,才能废除交换价值。而蒲鲁东主义者幻想“通过实行‘劳动货币’能够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sup>①</sup>

在蒲鲁东之前,魏特林就曾主张应由纸币这一单纯的价值符号来获得劳动小时的名称。根据魏特林的空想计划,在未来社会中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天必须工作一定的小时,并因此而得到生活必需品。除这个时间之外,每个工作的人有权再做几个附加的“交易小时”并因此而得到奢侈品。这些附加的工作小时和因而得到的物品都记在“交易簿”中。在这个“交易簿”中,在一面记下工作小时,在另一面记下作为劳动代价的享受资料。欧文也提出过“劳动货币”,马克思认为它“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蒲鲁东的“劳动货币”,就是货币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具体说,以一张纸币代表  $x$  个劳动小时。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劳动产品必须表现为商品,因为商品的表现就含有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的二重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货币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相容。一盎司金的若干等分尊称为索维林,还可称其为“ $x$  小时劳动时间”。这又无非是物化的即对象化的  $x$  小时劳动时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具有‘ $x$  劳动小时’这个平民名称的金币发生的变动,会大于任何其他货币,特别是大于现金的金币;因为金和金相比是不能提高或降低的(它和它本身相等),但是,一定量金包含的过去的劳动时间同现在的活劳动时间相比,必定不断地提高或降低。要使它保持可以兑现,就必须使劳动小时的生产率保持不变。但一般经济规律是,生产费用不断地降低,活劳动的生产率不断地提高,因而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不断地贬值,因此,不断贬值将是这种金劳动货币不可避免的命运。”<sup>②</sup>

蒲鲁东主义者的“劳动货币”同商品价值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8 页。

实际差别不相容。马克思说,“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在内)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们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格就是这种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交换价值。因此,用劳动货币(它的名称取自劳动时间本身)代替金属货币(以及以它取名的纸币或信用货币),就会把商品的实际价值(交换价值)和商品的名义价值、价格、货币价值等同起来。”<sup>①</sup> 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曾指出,实际价值本身否定自身,这使得商品的实际价值经常和其自身的规定发生矛盾,使现有商品实际价值贬值或升值。这样一来,价格和价值的差别就是由于价值是作为价格运动的规律而出现。但价格和价值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况下才一致。一定量的积累劳动表现着商品的价格。商品市场价值的金或银本身通过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间表现出来。实行小时券并不能消除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实际差别和矛盾,并不能消除资产阶级的一切弊病。“代表平均劳动时间的小时券决不会和实际劳动时间一致,也决不能和它兑换;也就是说,物化在一个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所能支配的决不是和它本身等量的劳动货币(反之亦然),而是较多或较少的劳动货币,正如现在市场价值的任何波动都表现为其金价格和银价格的提高或降低。”<sup>②</sup> 因此,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劳动货币只不过是一种平庸的空想。

劳动货币并不是蒲鲁东首先提出来的。劳动时间是直接的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是由格雷第一次加以系统发挥的。格雷试图通过国家银行来实现把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的愿望。这表明他的劳动货币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改良。马克思说:“每种商品直接就是货币。这是格雷从他的不充分的、因而是错误的商品分析中得出的理论。‘劳动货币’、‘国家银行’和‘商品堆栈’的‘有机’结构不过是一种幻影,使人误认为这种教条是支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世界的规律。关于商品直接就是货币或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这种教条,当然不会因为有一个银行相信它并按照它经营就会变成现实。相反,在这种情形下,破产会来扮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格雷的著作中所隐藏的、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就是劳动货币是一种经济学上的空话,它用来表示下面这种虔诚的愿望:废除货币,同货币一起废除交换价值,同交换价值一起废除商品,同商品一起废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一点被英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有些在格雷前,有些在格雷后,直接了当地讲出来了。”<sup>①</sup>可见,蒲鲁东的“劳动货币”只不过在重复前人的理论。

### 3. 价值理论

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继续深入批判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的价值理论。在这一批判过程中,马克思较多地从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的第二章中论述价值问题时,具体地论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价值的构成:财富的定义”、“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蒲鲁东把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过程的神秘化的做法。揭露蒲鲁东在论证交换价值的起源时,一开始却假定了交换价值的存在。经济学说史表明,早在蒲鲁东之前,西斯蒙弟和罗德戴尔已经论述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马克思用具体的人来说明交换和交换价值,而蒲鲁东则是用抽象的概念。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时指出,在研究价值时,要注意研究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李嘉图完全抽掉使用价值,而庸俗经济学萨伊只以“有用性”作为前提都是非科学的。

首先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使用价值表现为商品的自然属性本身,而交换价值是商品的形式规定。马克思指出:“使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6页。

用价值在简单交换或单纯交换中也是前提。但是在这里,在双方只是为了相互使用商品而进行交换的地方,使用价值,即内容,商品的自然特性本身,不是作为经济上的形式规定而存在的。相反,商品的形式规定是交换价值。这种形式以外的内容是无紧要的;它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那种关系的内容。”<sup>①</sup>但这种内容本身会在一个需要和生产的体系中发展起来,使用价值本身也会影响经济形式。在具体的社会结构关系中,不只是只有交换价值才起作用,李嘉图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与蒲鲁东神秘主义不同,马克思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角度,科学地阐明了使用价值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作为物质前提处在经济学及其形式规定之外,又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进入经济学。“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彼此发生这样的关系: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而另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在简单流通中,每一种商品都可以交替地在这一或另一规定上加以考察。在这两种场合下,如果商品作为商品本身出现,它就会作为消费品退出流通,从而完全处于经济关系之外。如果商品固定化为交换价值——货币——它就会竭力取得同样的无形式性,不过这种无形式性处在经济关系之内。”<sup>②</sup>这就必须承认,流通中的商品,即使用价值,它本身表现为价格,换言之,它在自己的价格之外是商品即消费对象。而商品本身是一种物化活动,这是所有商品的共同实体。不同于物化劳动的非物化劳动是处于物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的劳动。能够作为资本的对立面的唯一使用价值就是劳动。

其次是关于价值与劳动量的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用“劳动价值”来衡量商品价值的错误做法。从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223页。

论上而言,蒲鲁东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实践表明,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与经济事实相悖的。蒲鲁东的错误在于,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劳动价值。这表明蒲鲁东已倒退到古典经济学以前的水平。因为在斯密那里价值尺度为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二者并行不悖。李嘉图则区分了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作为价值尺度的差别,指出了斯密的错误。而蒲鲁东将二者混为一谈显然是倒退到斯密以前的水平。马克思在批判劳动价值时曾引用蒲鲁东的这样一句话:“劳动在生产,资本有价值……所谓劳动价值,是一种简略的说法。”<sup>①</sup> 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蒲鲁东所说的‘资本有价值,劳动在生产’,无非就是说,资本是价值,因而为在这里除了说资本是价值以外,关于资本什么也没有说,所以等于说价值是价值(判断的主词在这里不过是宾词的别名);至于劳动在生产,劳动是生产活动,这也就是说,劳动是劳动,因为劳动除了‘生产’以外什么也不是。”<sup>②</sup> 可见蒲鲁东的“资本有价值,劳动在生产”只不过是同义语的反复,不可能反映价值和劳动所发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价值和劳动本身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并不是相互并存而毫不相干。劳动与资本对立而作为主体出现,即工人只是在劳动的规定上出现,而劳动并不是工人本身,仅仅这一点就会打开人们的眼界。撇开资本不谈,在这里存在着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动的联系、关系,这种关系绝不是‘自然的’,而是本身已经包含着某种独特的经济规定。”<sup>③</sup> 马克思强调必须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9~2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0页。



的资本,即为资本一般。在研究资本一般时,价值、货币、流通、价格、劳动等因素构成了前提条件。资本的辩证产生过程实质上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研究资本时遵循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而蒲鲁东的“资本有价值,劳动在生产”只停留在逻辑的同义语反复水平上,根本未对资本的价值作科学的分析。

#### 4. 无息信贷

蒲鲁东的“无息信贷”理论,构成了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所批判的重要内容。我们结合《1861—1863年手稿》对这一批判作一论述。马克思首先揭示了蒲鲁东无息信贷的理论基础。在与巴师夏的辩论中,蒲鲁东阐述了无息信贷的理论。面对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蒲鲁东用夸夸其谈来掩饰自己在辩证法方面的无能,尽管蒲鲁东也提出过“系列辩证法”(dialectique sérielle)。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蒲鲁东的“无息信贷”和以此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其“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sup>①</sup>从本质上而言,蒲鲁东的无息信贷实即“所有权就是盗窃”这一原理的虚伪的、市侩的、怯懦的形式。它不是让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资本,而是让资本家不得不把资本交给工人。蒲鲁东的无息信贷理论旨在既保持商品生产又废除货币。这一梦想反映着小资产阶级的虔诚愿望。

在对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理解方面,蒲鲁东秉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格雷的思想。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格雷在经济学说史上首次系统地发挥了劳动时间是直接的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他主张国家中央银行借助支行来确定生产各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生产者通过自己的商品交换回一张表明其商品包含多少劳动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页。

时间的收据,而这种代表时间的银行券同时又是领取存放在银行仓库中的其他一切商品中的一个等价物的证据。货币只应作为一张收据,证明这张收据的持有者曾经从贡献这一价值的人那里取得了对于该价值的支配权力。产品在事先经过估价之后即可存入银行,据需要可随时将其提出。其条件是:凡将任何种类的财产存入这种国家银行者,均可从银行取出同等价值的任何物品,而不是只准提取其所存物品。<sup>①</sup> 根据格雷的观点,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社会通过国家银行使个人不依赖私人交换的条件又让个人在私人交换的基础上继续生产。换言之,商品直接当作社会劳动产品而相互发生关系。这样一来,每种商品直接就是货币,即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实际上,格雷的这种理论只是代表这样一种虚伪的愿望:“废除货币,同货币一起废除交换价值,同交换价值一起废除商品,同商品一起废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sup>②</sup> 而蒲鲁东则直接继承了格雷的这一空想,“把贬低货币和颂扬商品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要点(als Kern des Sozialismus)来认真宣传,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根本不了解商品和货币的必然联系。”<sup>③</sup>

在蒲鲁东看来,对于作为货币关系的主体的研究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经济学家们按照自己的习惯超出自己所学的领域,去研究物理学、力学和历史等……经济学家们不是回答人们向他们提出的经济问题,而是开始讨论起艺术问题。”<sup>④</sup> 事实上,研究货币关系的主体恰恰是政治经济学范围内的事情。经济学说史表明,早在古希腊的荷马(Homerus)著作中,就出现以公牛充当货币尺度的记载。正如颜色和大理石的物理性质没有超出绘画和

---

① 参见约翰·格雷:《社会制度》,爱丁堡 1831 年版,第 63~6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7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柏林 1981 年版,第 68 页。

④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1 页。

雕刻的范围一样,对货币关系的化身贵金属的研究并未超出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在马克思看来,“一种特殊的产品(商品)(物质)必须成为当作每一种交换价值的属性而存在的货币的主体。体现这种象征的主体并不是无紧要的,因为被体现者的条件——概念规定,一定的关系——中包含着对体现者的要求。”<sup>①</sup> 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所具有的、商品的自然性质所不相适合的那些属性,反映着对那些主要充当货币材料的商品所提出的要求。而在贵金属身上,这些要求得到了最完满的实现。正如黑格尔所言,贵金属比其它金属能更好地实现金属。《圣经》中这样写道:金银是“既不蛀又不锈的永恒的财宝。”马克思强调金银的美学属性。“这种属性使它们成为显示富裕、装饰、奢侈、满足自发的节日需要的直接表现,成为财富本身的直接表现。”<sup>②</sup> 因此,金银表现为从地下世界本身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可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货币主体的研究具有科学的现实意义。而蒲鲁东认为对货币主体的研究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这显然是荒谬的。根据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一切转化为火,火又转化为一切,有如黄金换成货物,货物又换成黄金。”马克思既反对蒲鲁东阉割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批评拉萨尔通过赫拉克利特来阐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错误做法。关键在于挖掘到辩证法本身的某些批判思想。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关系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关于商品和货币的关系问题上,蒲鲁东认为金银是货币而不是商品。习惯赋予贵金属作为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是纯粹的契约职能。“货币似乎已经从一种系列中脱离出来,要重建这种系列并把货币重新引到它的真正的原理上去,这是否不可能呢?”<sup>③</sup> 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8页。

③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1页。

表明蒲鲁东已经预先假定了货币的存在。作为物化形式的货币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个关系构成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环,并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马克思指出:“货币事实上只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会性,和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sup>①</sup>而蒲鲁东却把货币从现在的生产方式的总体中分离出来并使之成为想象中的系列,即尚待发现的系列的第一个要素。他进而认为金银作为享有特殊交换手段的这一职能是他自己的发现,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没有理解到使贵金属享有特权的那种经济原因。“没有人注意到,金银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君主们逐渐地占有了贵金属,并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即 *par excellence*(最地道的)商品。”<sup>②</sup>在这里,蒲鲁东把君主的专横看作是金银享有特权的最高原因。

如果作为交换手段的贵金属是由君主的意志使其享有特权,那么贵金属享有特权的那种经济原因就是自由意志;君主的专横也就真的成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了。然而,历史表明:“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sup>③</sup>因此,与其说是君主占有了金银,倒不如说是普通的交换手段占有了君主。虽然克什米尔呢上印着“纯毛”的商标,但是这种商标根本没有说明克什米尔呢的价值。一个银马克所含的惟一价值是一马克的银子。事实证明,伪造钱币的君主会遭到损失。金子的价值并非是完全像任何其它商品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86页。

②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122页。

价值一样可以改变的。菲力蒲一世并不像蒲鲁东所言创造了金银,而只是创造了钱币的名称。究竟是什么使货币获得价值的呢?是贸易而绝不是君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手段。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sup>①</sup> 经济学说史表明,在金银之所以具有交换能力这一问题上,蒲鲁东远远落后于李嘉图。李嘉图把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作为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认为金银所具有的价值与生产将其投入市场所必要的劳动量相适应,尽管他又认为确定货币价值的不是实物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只是供求规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银行家或汇率一样。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必须把财富在一种惟一的物的形式上作为物神结晶起来,金银就成了这种财富的相应的化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就是金银。”<sup>②</sup> 总之,金银之所以能够交换,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其具有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而绝不是如蒲鲁东所言是君主将其神圣化所致。

蒲鲁东建立在对商品与货币关系的理解基础上的无息信贷理论认为,一切东西都应当出售而不应贷放。在与巴师夏的论战中,蒲鲁东的全部论断的实质在于,货币是和出售完全不同的东西。资本不应当贷放和取息,而应当像其它任何商品一样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等价物。贷放是一件坏事,因它不是出售。取息的贷放“是这样一种能力,即人们可以不断重新出售同一物品,并且不断重新为此得到价格,但从来不出让对所售物品的所有权。”<sup>③</sup> 像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页。

③ 蒲鲁东:《无息信贷》,巴黎1850年版,第9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83页。

币或房屋这样的“物品”不会变更所有者,这同在买和卖时不一样。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货币贷出时并未能得到任何等价物,而在交换的形式和基础上却得到了一个等价物和一个余额。利润和利息是由价值的交换规律产生的。“在物品交换发生时,不会发生价值变动,同一个人仍然是同一个价值的‘所有者’。在生产剩余价值时,不会发生交换。当商品和货币的交换再开始时,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中了。”<sup>①</sup>正因为蒲鲁东不懂得利润和利息怎样由价值的交换规律产生,才认为“房屋”、“货币”等不应作为“资本”而应作为商品按成本来交换。其次,根据蒲鲁东,“货币资本从一次交换到另一次交换,通过利息的积累,总是不断回到它的出发点,由此可见,每次由同一个人的手重新把这些货币贷出,总能给同一个人带来利润。”<sup>②</sup>由于资本是在货币形式上贷出的,使得蒲鲁东认为货币资本(现金)具有这种特殊的属性。实际上,他混淆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再次,“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产品总是价值并且是确定的价值。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完全是主观的,只是对个人来说才是存在的。”<sup>③</sup>在这里,蒲鲁东的“社会的观点”实即使用德国形而上学语言的“主观的”抽象。

在批判蒲鲁东的上述无息信贷理论时,马克思首先指出,与蒲鲁东的资本不应当贷放和取息相反,资本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只是被贷出。在流通领域,作为资本的商品不是与等价物交换,资本进入流通领域时保存其自为存在。尽管占有者可以不同,但它同原所有者仍保持着原有的关系。此时的使用价值和货币显现出复杂的形态,“对资本的所有者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它的价值增殖,货币是作为货币,而不是作为流通手段;它的使用价值是作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85页。

为资本。”<sup>①</sup>而蒲鲁东主张资本不应贷放和取息，只应出售以换取等价物，只不过是要求交换价值永远不应当变成资本，而应始终是简单交换价值。换言之，蒲鲁东既想保存商品和货币，但它们不应当发展成资本。这种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空想在古人那里亦可见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就曾设想用强制办法把货币固定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视货币在其中只起尺度和铸造作用的流通形式  $W-G-W$  为合乎自然的和合理的，而视  $G-W-G$  的流通形式为违反自然的和不适宜的。布阿吉尔贝尔认为货币是一个要求把一切自然财富作祭品的荒诞的摩洛赫。然而，货币从奴仆变成了主人，使自然财富贬值，使各等价物的对称性消失。换言之，价值本身成为交换价值的目的并获得独立的形式毕竟还是成为残酷的现实。马克思在论述交换的三次方阶段时对其有着经典性的释述。

蒲鲁东的无息信贷理论从根本上抹杀了生息资本的特征。同买和卖时不一样，“物品”不会变更所有者。由于蒲鲁东实际上没有理解资本再生产所表现出的不同形式，没有理解资本运动一般，当然也就无法理解作为生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货币回流运动。在马克思看来，生息资本作为获取利息而暂时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货币资本，其运动公式是  $G-G'(G + \Delta G)$ ，“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运动的的全部形式。”<sup>②</sup>生息资本的特征正好与蒲鲁东设想的相反，“那就是贷款人贷出货币，最初并没有为此得到等价物。”<sup>③</sup>贷款人和借贷人之间的交易和资本经过的形态变化毫无共同之处，而资本却带着利息流回。资本的形态变化既表现为经济形式的形态变化，又表现为现实的形态变化，即交换行为的序列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8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39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81 页。

和生产的過程。但蒲魯東無法看到，商品交換是以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交換為基礎的，而利潤和利息則來自後一種交換。“價值是按照價值規律同勞動相交換的，因此，要廢除利息，就必須廢除資本本身，必須廢除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必須廢除僱傭勞動。”<sup>①</sup> 蒲魯東幻想借貸形式不再存在而代之以出售，餘額就不會再有。實際上，只要商品或貨幣能夠轉化為資本，儘管餘額不會在兩類資本家之間分割，而這種分割能夠而且必須不斷重演，這在僱傭勞動的基礎上總是能夠做到的。自由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範圍內發展為社會的勞動，這表明大量的勞動已經否定了資本主義以前社會關係中的農奴勞動或奴隸勞動形式，資本主義的勞動即為僱傭勞動。因此，蒲魯東的救時良方即既要保存僱傭勞動這一資本的基礎，又要否定資本的一種派生形式，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它並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而只能是一種空想。

以無息信貸為基礎的“人民銀行”是蒲魯東在經濟學上的最後的“業績”。我們在論述蒲魯東的《十九世紀革命的總觀念》一書時已經指出，蒲魯東的“社會清算”只是重建“健全”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手段。這種重建的社會的真正靈藥是廢除利息，即把每年支付的利息變成年金。馬克思認為，蒲魯東想賴以實現一切的手段就是銀行。英國的共產主義者布雷也曾幻想通過消除個人交換中的一切對抗因素讓社會採用“平均主義的關係”，而要在作為對現實世界的反映的“平均主義的關係”基礎上來改造社會是根本不可能的。現實世界即為現代社會的實體，絕非社會美化了的影子。勞動產品公平交換所的破產，表明布雷理論的破產。但布雷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蒲魯東的鑰匙。蒲魯東 1849 年在巴黎開辦的銀行的破產是對其理論的空想性的最好證明。馬克思指出：“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聯合起來勞動的生產方式過渡時，信用制度會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73 頁。



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sup>①</sup> 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其中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继续存在，并构成其信用制度的基础。简言之，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的基础。可见，只要生息资本存在，就不可能有蒲鲁东的无息信贷。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知，蒲鲁东的无息信贷理论的错误，就在于其把货币和商品混为一谈。根本不懂得货币是商品的必要形式（因为借贷资本表现为货币形式上的货币资本），并进而把货币和资本混淆起来。这表明蒲鲁东从根本上抹杀了商品、货币、资本三者的差异。这里用得着黑格尔的一句话，夜中观牛，一切皆黑。

## 5. 生产过剩的原因

资本的作用具有双重性，既创造了财富又创造了贫困。财富和贫困在资本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同时生成。资本为了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即更多的物化劳动，就必须不断地扩大流通范围。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本身对生产的发展的刺激是始终存在的，但资本主义矛盾本身要碰到消费问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跟不上扩大再生产的步伐，在资本力图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價值增殖。”<sup>②</sup> 李嘉图意识到了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交换价值是价值，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86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

但他没有看到生产必然要受到限制。西斯蒙弟看到了资本所陷入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试图通过习惯法律等因素从外部给资本主义生产设置限制。但李嘉图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庸俗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也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在一定的时期内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他抛开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切特有的属性,把它看作是提供直接使用价值的简单再生产。从而完全地抽掉了本质关系。因此,上述这些经济学家都无法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过剩的原因。在谈到蒲鲁东时,马克思说:“至于断言货币生产得太少,实际上这不过是断言生产同价值实现不一致,因而是生产过剩,或者同样可以说,这是产品不能转化为货币的、不能转化为价值的生产;是不能在流通中得到证实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货币魔术师们(蒲鲁东等等也包括在内)的幻想:由于货币昂贵而流通手段短缺,因此必须人为地创造更多的货币。”<sup>①</sup>

显然,蒲鲁东等人只是认为“生产同价值实现不一致”,从而导致生产过程。他们的这种解释,没有把劳动看作是雇佣劳动,当然也就不会把资本看作是资本。“一方面承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结果;另一方面却否认这种结果的前提和条件——必要劳动是通过剩余劳动并且为了剩余劳动而存在的劳动。”<sup>②</sup> 不过,蒲鲁东为了说明生产过剩而所作的尝试是不成功的。马克思说:“只听钟声响不知钟声何处来的蒲鲁东,把生产过剩的原因说成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其意为“产品中加上了利息和利润”,即“产品的价格超过了产品的实际价值”。马克思认为,这证明蒲鲁东对价值规定毫无所知,因为“价值规定总的说来决不能包含任何加价”。显然,蒲鲁东既“混淆了价格和价值”,又“把同价值规定本身无关的关系扯了进来”。问题的关键是供给的产品多于对这种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7页。

品的“需要”。生产过剩源于使用价值，即起因于交换本身。在简单交换中不可能有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发生是同价值增殖联系在一起。”<sup>①</sup> 我们将在论述《1861—1863年手稿》时详细考察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工人不能买回自己产品”的分析。

在批判蒲鲁东等经济学家对生产过剩原因解释的过程中，马克思正面地论述了资本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使命。在资本的概念中已经包含了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资本不断地突破自身的界限、自身的限制而向前发展自身。资本的生产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而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的生产的一个条件。”<sup>②</sup> 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和人的属性的体系。马克思说：

“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

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sup>①</sup>、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sup>②</sup>

上面这一段论述,在马克思论述资本对现代文明的影响时颇具代表性。这充分地体现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历史观肯定人创造历史的客观进程。以资本为代表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资本才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了胜过以前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马克思也承认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要显得崇高得多。这就在于古代社会更注重人格的塑造,具有更高的价值追求。作为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社会关系,资本的属性不是物的属性,而是一定社会阶段通过物的属性折射出人的属性。但资本又以物作为外在的表现形态,它又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资本是人又不是人,是物亦不为物。若仅视资本为物,那是庸俗经济学家的看法。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由资本作为社会唯一的杠杆在起作用,必然产生物化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批判物化实即批判资本。蒲鲁东对工业社会的怀疑,表明他根本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洞悉到资本的历史文明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们正是要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所必须意识到的是:资本是一把双刃的剑,资本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丑恶。这就是资本的辩证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393页。

### 第三节 蒲鲁东在方法论上的错误

#### 1. 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与黑格尔的绝对方法

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是与康德和黑格尔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主要是与后者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时,必然涉指着对德国哲学的批判。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方法方面的失足,应归于他对德国哲学中黑格尔辩证法的误解。马克思说:“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也是如此, in everything [在一切事情上] 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sup>①</sup>

论及蒲鲁东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承认是自己使蒲鲁东感染上了黑格尔主义。蒲鲁东在1844年至1845年秋冬住在巴黎的时候,马克思力图向蒲鲁东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因蒲鲁东不懂德文,无法认真研究辩证法。蒲鲁东提出了一种系列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实质上类似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系列辩证法是包含在蒲鲁东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一书中最为重要的东西。这种辩证法试图提供一种将以思维的过程来代替各个单独思想的思维矛盾。他从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寻找实际上与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辩证法。不过,蒲鲁东在其早期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主要采用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6页。

是康德的二律背反方法。蒲鲁东自认为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最重要的几节里模仿了康德二律背反的论述。蒲鲁东与康德一样,都视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悟性“彼岸”之事。其实,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惟一的德国哲学家。在《贫困的哲学》中,当蒲鲁东试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体系时,他以黑格尔的矛盾作为发展的手段取代了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而康德的道德哲学始终像幽灵一样伴随着他。

由蒲鲁东与黑格尔的密切关系可见,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与黑格尔的“绝对方法”有着相似之处。黑格尔在论述绝对精神的运动时,从简单的范畴推演出思想群,又从思想群推演出系列,最后再推演出整个体系。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就这样产生了思想。马克思指出:“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sup>①</sup>黑格尔承认方法是一种绝对的、惟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种力量,任何对象都不能拒绝。这种绝对的方法就是抽象形态的运动,即纯粹理性的运动。这种运动的起点是范畴,由此而推演出整个体系。蒲鲁东正是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时说:“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感觉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页。

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sup>①</sup>

与蒲鲁东自称发现了类似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反,实际上他阉割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蒲鲁东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时,他发现了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即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应当做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对奴隶制的挽救就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而消除其坏的方面。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出好、坏两方面而已。”<sup>②</sup> 因此,蒲鲁东无法用辩证法得出一个新的范畴。只能把所有的经济范畴逐一取来,随心所欲地赋予范畴一种特性,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解毒剂”。他的“经济矛盾体系”中的范畴并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围。这种非辩证的做法只能证明他的“经济矛盾体系的虚妄性。而真实的辩证运动就在于“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是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sup>③</sup> 历史证明,不能像蒲鲁东那样用好、坏两个方面来理解社会经济结构关系。坏的方面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从而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如果经济学家们要消除封建主义社会关系中的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结果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状态时期就会被切断。再者,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二重性表明,在生产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生产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一心要消除坏的方面的蒲鲁东,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而看不到贫困能够推翻的社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的革命的破坏的一方面。因此,他只是沉醉在小资产者的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

## 2. 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具体方法方面的错误

背弃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果,使蒲鲁东回到了康德的“应当”。据上面的论述可知,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中的非辩证法所造成的恶果必然是抛弃辩证法,而代之以最纯粹的道德。蒲鲁东只是把辩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结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并旨在消除恶。因此,经济范畴失去了自身的独立运动,失去了内在生命。从而也就失去了黑格尔所特别关注的内在否定性这一生命的和精神的自身运动的最内在的源泉。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内在否定性这一辩证法的灵魂是一切真的东西本身都具有的,概念和实在之间对立的扬弃有赖于此。而蒲鲁东非辩证的、失去了内在生命力的经济范畴,其顺序势必成了一种外在的、机械的框架。他只能认为“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sup>①</sup>以黑格尔辩证法自居的蒲鲁东,不得不重新回到康德的道德哲学。而康德把“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了彼岸世界,把理论的表达与其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从而把意志变成纯思意义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蒲鲁东甚至低于康德的这一水平。

由于错误地对待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导致了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具体方法方面的错误。马克思首先批判了蒲鲁东的无中介系统的认知方式。蒲鲁东对货币的回流运动感到震惊,因为被贷出的资本带着利息流回。实际上,货币正是在把它们实际用作资本的借款人手里完成了它们作为资本的现实运动。它们作为货币加 $\frac{1}{x}$ 货币到他手里。贷款人(A)和借款人(B)之间的运动只是表示资本的起点和终点。在B手里成为资本的货币作为资本经过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85页。



定的循环以后带着利润流回。“这种中间行为,实际过程(包括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完全与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交易无关。这一交易只是在货币作为资本已经得到实现以后才重新开始。”<sup>①</sup>借助这一中间过程,借款人获得的等价物是产业利润。货币在间歇以后带着利息流回贷款人的手里。但所有这一切在借、贷双方之间的交易中都是看不见的。如果只考察 A 和 B 之间的这种交易,得到的就是不存在任何中介系统的资本的单纯形式。蒲鲁东正是在这种没有概念的形式上考察事物的,“在这样的考察中,对他来说,一切都必然是不可理解的。”<sup>②</sup>

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具体方法方面的错误还表现在他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归结为简单流通的要素。他认为“一切产品在一定时间内都成为资本,因为一切被消费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都是被再生产地消费的”。<sup>③</sup>在抽掉特殊性之后,认为交换价值不会从商品和货币形式发展为资本形式,这不过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原理。因为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是资产阶级的理想。交换价值最初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只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尽管蒲鲁东发现了交换价值在更深入的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他的道德温情主义使他无法理解矛盾。蒲鲁东与认为矛盾是假象的巴师夏展开争论,但实际上二者殊途同归,都是把比较发达的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化为简单流通的抽象规定。

蒲鲁东从经济条件角度来考察社会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是错误的。在蒲鲁东看来,“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完全是主观的,只是对个人来说才是存在的。”<sup>④</sup>在这里,蒲鲁东恰恰把社会的东​​西称为主观的东西,即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8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8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2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73 页。

一定的社会形式称为主观的东西,而把主观的东西抽象为社会,即把主观的抽象称为社会。照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存在区别。马克思认为,“产品本身属于任何劳动方式,而不论劳动方式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如何。产品只有在它表示一定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时才成为资本。”<sup>①</sup> 换言之,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产品作为资本表示着属于某个社会历史形式的一定关系。蒲鲁东的所谓从社会角度来考察,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即经济的形式规定性的差异忽略掉了。蒲鲁东的普罗米修斯就是社会,就如同费尔巴哈的“人类”概念就是社会概念一样。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在社会之外,奴隶和公民才是人。人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社会决定个人,这意味着对个人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才存在着对人的种种规定和区别。显然,社会是一种结构关系,必须从人和人之间所发生的而首先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彼此交往、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中逐步形成的关系或结构形式中把握社会。

### 3. 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政治经济学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古往今来的政治经济学,概莫能外。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只是在经济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的激动、挣扎和冲撞。方法论上的失足使得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系”成为形而上学的混和物。在批判蒲鲁东非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同时,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科学地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在考察现实社会经济生活时,其出发点不是人而是社会关系,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关系。作为全部社会生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页。

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不能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同资本一样,人口也要受到其他社会结构关系因素的规定。马克思说:“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sup>①</sup> 我们把马克思这里的表述加以图式化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思维行程:人口(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分析(简单的概念)→抽象(最简单的规定)→人口(丰富的总体)。这一思维行程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从人口、分析到抽象。马克思称其为第一条道路。这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包括洛克在内的17世纪的经济学家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这种经济学的方法是由洛克所制定的。洛克在制定这一方法时又是受其哲学方法所支配的。在洛克时代,哲学认知处于直观的反映水平。作为经验论的代表,洛克哲学本身包含着种种矛盾。直观的反映从浑沌的表象出发至抽象而止步,并不知道还要经过稀薄的抽象而上升到具体。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的科学方法显然应为第二条道路,即思维行程的后半程。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但思维的后一行程也绝不能离开前一行程。每一行程都有其自身的任务。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根据马克思,“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8页。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sup>①</sup>

在规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时，马克思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对与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有关的内容作了天才的论述。这值得我们对此作仔细的分析、研究。“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反映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总体性特色。马克思的这一方法源于黑格尔的总体性的方法，但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的唯心主义，拯救其辩证的方法。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实际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总体性方法，只不过是思维在把握具体时把它从精神上再现出来。而在黑格尔哲学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只有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所谓精神上再现具体，即为思维中的具体，由概念范畴构成的逻辑结构。与黑格尔的理解相反，交换价值作为范畴绝不是“洪水前期的存在”，它是现实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44手稿》中认为，只有被改造了的世界，即人化的世界才是现实。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具体的总体以及主体作了这样的规定：“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sup>②</sup>

在一定的条件下，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具有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种独立的历史存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从占有开始持肯定的态度。但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历史上又的确存在过只有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氏族。比较简单的范畴“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sup>①</sup>但马克思强调简单的范畴表现一定的关系。比较发展的具体把简单的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只有在比较简单的范畴所表示的从属的关系在历史上已经存在时,从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才是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的。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中就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而十分简单的经济范畴只有在历史上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它的充分的力量。因此,“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sup>②</sup>劳动作为一个简单的范畴,经济学家对它的把握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经过货币主义、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一直到斯密、李嘉图才抽象出劳动一般。当然,劳动作为抽象一般,只有到了斯密、李嘉图时代才有可能。劳动一般这一范畴深刻地反映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关系。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它不是随心所欲的抽象。人的头脑不可能超越时代去建构什么范畴。只是首先具备了某种历史关系,人们才能作出抽象。

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的论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预示着马克思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的微观解剖。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sup>①</sup> 资产阶级社会借助以前社会的废墟和货币因素建立起自身的社会，其中货币因素在资产阶级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即发展到具有充分的意义。对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形式的透切理解有赖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程度，而在以前社会中所展露出的一些征兆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关系中能得到充分的理解。这就是新唯物主义的双向理解，它与海德格尔解释学的理解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本体论、语言、文化意蕴等因素自始至终渗透在理解的过程中，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已经在理解过程中退居至从属的而不是基本前提的地位。马克思主张通过资产阶级经济去透视古代经济，也绝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一切社会形式都视为资产阶级社会形式，而是在承认一切历史差别基础上的透视。保存在高级形式中的低级形式只是被扬弃了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sup>②</sup> 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露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不能批评自身。这时资本主义就会被一种虚假意识所遮蔽。马克思显然是把封建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总体。历史不是个别事实僵硬的陈铺堆砌，它本身是贯穿着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可见，卢卡奇的“总体性”的观点是有其经典根据的。

主体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克思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所涉指的主体与通常所指的主体有着重要的差异。“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sup>①</sup> 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从事人文科学研究者必须遵从的一点,就是主体的既定性,即基础性、优先性,若抛开这一点,人文科学的研究就失去了根基。主体的根基性体现为社会性。单个的范畴只表现主体的一个属性,而主体的存在表现为具体的、丰富多彩的整体。只有一个范畴体系、思想群才能全面反映社会存在。马克思突现社会中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sup>②</sup> 但这种生产及其关系,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社会形式中和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的社会形式中,它们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

经济范畴有着具体的历史所指。资本的所指不同于地租的所指。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加以说明。“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部的结构。”<sup>①</sup> 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科学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安排的逻辑序列、范畴序列的结构既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框架。黑格尔也强调“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但黑格尔同时认为“历史里面的时间次序”和“概念发展的次序”是有区别的。<sup>②</sup> 马克思在扬弃了黑格尔的人是“思维着的精神”的规定之后，把人置于社会现实关系的基础之上。作为人借以反映经济关系的范畴，它在思维行程中所处的地位，最终决定于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和结构。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方法中，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是辩证统一的。从认识论上来说，这种统一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从认识的结果来说，它在本质上符合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质。马克思既不是哲学上的历史主义者，又不是哲学上的结构主义者，他只不过是运用其方法罢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页。



## 第六章

### 马克思在理论上深入批 判蒲鲁东时期(下)

#### 第一节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蒲鲁东的批判

##### 1. 关于贷放货币的资本家

在《1861—1863年手稿》第六章中,马克思探讨了魁奈的经济学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对魁奈作过这样的评价:“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者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同时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sup>①</sup>魁奈在任路易十五宫廷御医时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他在65岁时才发表的《经济表》中,归纳出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用图表来说明社会各经济阶层和部门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它们之间支付的流通。他信奉自然法则学说,宣称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放任是遵从自然法则的,因而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秩序。马克思称蒲鲁东是魁奈第二,“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在论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货币流通问题时,马克思指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8页

“只要  $G-W-G$  表示货币流回资本家手里的形式上的回流,那末它只是表明,资本家开出的货币形式的支票由他自己的商品来兑现。

对于这种货币回流(即货币回到它的出发点)作错误解释的例子,见前面伦德斯特杜·德·特拉西那一节。作为第二个例子——特别适用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货币流通——后面要引用布雷的一段话。最后关于贷放货币的资本家,要引用蒲鲁东。”<sup>①</sup>

$G-W-G$  过程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中,它本身不表现再生产过程,只表现买卖情况;它不表现作为资本的货币,即不表现  $G-W-G'$  过程。第二个  $G'$  是比第一个  $G$  大的货币额,因而  $G$  是自行增值的价值(资本)。那么,资本家的发财是如何可能的呢?特拉西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资本家发财与货币回流现象无关,而在于“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占有的劳动,比他以工资形式支出的劳动多。”<sup>②</sup> 布雷对货币回流现象的解释也是错误的。马克思摘录了布雷《劳动关系中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一书中的这样一般内容:

“掌握在专制制度和资本手中一种有三重意义的工具。

1. 货币流回国家银行,银行再贷给资本家,赚取利润。
2. 政府套在工人阶级很大一部分人的脖子上的一条金锁链。
3. 此外,经过这种途径,资本家本人又掌握了一种新武器。”<sup>③</sup>

显然,布雷未能说明资本家发财的真正原因。蒲鲁东也未能真正弄清资本家发财的原因。马克思摘录了蒲鲁东《无息信贷》中下面这样一段话:

“抵押债务总额,据最了解情况的作者说,达到 120 亿,据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I,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I,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41 页

他一些人说,达 160 亿;期票债务总额至少有 60 亿,股票大约 20 亿,国债 80 亿;总计 280 亿。必须指出,所有这些债务,是按 4%、5%、6%、8%、12%,甚至 15% 的利息借来的或视同借来的货币。我假定前三类债务的平均利息是 6%;200 亿就有利息 12 亿。此外还加上国债利息约 4 亿,总计:10 亿资本的年息为 16 亿'……因而是 160 亿。因为‘在法国,现金总额——我不想说一般存在的,我说的是在流通中的货币总额,包括银行的库存现金在内——按照最流行的估计,不超过 10 亿’。‘当交换结束时,货币又空出来了,因而又可以重新贷出……货币资本从一次交换到另一次交换,总是不断回到它的出发点。由此可见,每次由同一个人的手重新把这些货币贷出,总能给同一个人带来利润。’<sup>①</sup>

这就是蒲鲁东关于贷放货币的资本家的观点。马克思在对蒲鲁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作了简短的说明之后指出:“蒲鲁东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这 1000 镑带来了由 40000 镑赚得的全部利息。这样一来,如果利率等于 5%,利息就等于 2000 镑。根据这一假说,他正确地算出 1000 镑生出 200% 的利息。这位鼎鼎大名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家原来如此!”<sup>②</sup>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蒲鲁东的贷放货币的资本家的观点,“是把一般资本的运动说成是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这表明蒲鲁东根本不了解资本的性质。在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中,蒲鲁东无法理解“购买、价格、物品出让以及剩余价值在这里借以表现的没有媒介的形式;总之,是这样一种现象: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已经变成商品,因而出售已经变成贷放,价格已经变成利润的一部分。”<sup>③</sup>一般资本的运动表现为货币回流到资本家手中,资本随之回到其起点。但生息资本在现实的运动中,取得了一个完全表面的、和现实运动相分离的形态。生息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I,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I,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388 页

本身所具有的运动的的全部形式,就是在货币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再连同利息,即剩余价值一起收回。马克思说:“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回流是流通过程的一个要素。货币先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资过程把它转化为商品;通过商品出售,它再转化为货币,并在这个形式上流回到那个最初以货币形式预付资本的资本家手中。但就生息资本来说,回流和放出一样,只是资本所有者和另一个人之间进行的法律交易的结果。我们看见的只是放出和偿还。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消失了。”<sup>①</sup>蒲鲁东所没有看到的恰恰就是这一中间过程。当然他就无法说明资本家发财的原因。马克思借助中介的分析,揭示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

## 2. 竞争的规律与现代土地所有权

在《1861—1863年手稿》论述洛贝尔图斯的“新地租理论”部分,马克思评介了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怎样解释地租本身,农业比起工业来仍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表现为,在工业中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由于产品的生产较便宜,而在农业中是由于产品的生产较贵。马克思说:“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土地肥力的不同不能解释地租本身,而只能解释地租的差别,下面这一规律仍然存在:在工业中,超额利润的获得通常是由于产品变得便宜,在农业中,地租的相对量的产生则不仅由于产品相对变贵(肥沃土地的产品价格提到它的价值之上),并且由于便宜产品按较贵产品的生产费用出卖。但是,我曾经指出过(蒲鲁东),这仅仅是竞争的规律,它不是从‘土地’产生,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产生的。”<sup>②</sup>

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提到的蒲鲁东是指在《哲学的贫困》第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

章第四节土地所有权或地租中对蒲鲁东的批判。在该节中,马克思认为蒲鲁东“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所有权,其实他所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在每一历史时代,所有权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因此,“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sup>①</sup>在蒲鲁东看来,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这显然是由于其狭隘的历史眼光所致。蒲鲁东认为李嘉图回答了“地租的平衡额”问题。而实际上,“李嘉图的学说被蒲鲁东先生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语句煞费苦心地把扎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把它解开。”<sup>②</sup>《1861—1863年手稿》中重引了《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样一句话:“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为了正确地说明所有权,马克思强调指出:“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sup>③</sup>而一些经济学家要求地租由国家掌握以代替捐税,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一种公开表现而已。

根据蒲鲁东的观点,地租即为付给永恒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由于这种资本的内容是一定的,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贷款的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地租将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和耕作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蒲鲁东认为这就是地租的实质。马克思在批驳蒲鲁东的上述观点时,强调只有土地被用作生产资料时,它才是资本。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再次重复自己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观点,“土地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4页

本”是可以增多的：“正如所有其他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我们不能在它的物质成分上（用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sup>①</sup>蒲鲁东的所谓土地的物质即为空间界限的土地。从物质的观点来看，土地具有永恒性，但土地资本不是永恒的，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有些地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指出的那样：“总之，土地只要产生利息，就是土地资本，但是，它既是土地资本，也就不能提供地租，就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地租是实行土地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悠久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sup>②</sup>

从以上论述中可知，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重新突出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关于现代的土地所有权的观点，批判蒲鲁东在所有权问题上的错误。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洛贝尔图斯对李嘉图的错误理解时，进一步阐述了现代土地所有权的由来。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资本所有权的确是作为“最初的”所有权出现的。“土地所有权在这里表现为派生的东西，因为现代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封建的，但是由于资本对它的作用，发生了形态变化，因而它作为现代土地所有权所特有的形式是派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李嘉图把现代社会中存在和表现出来的这个事实也看成历史上最初的东西……这是一种误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在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经济规律时都陷入了这种误解，在他们看来，这些规律是‘自然规律’，因而也表现为历史上最初的东西。”<sup>③</sup>李嘉图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68页

在于其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蒲鲁东在方法论上也犯了与李嘉图同样的错误。

### 3.G—G':无中介过程的主体批判

庸俗经济学家构成了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中的重要批判内容。在反对利息的斗争方面,马克思明确地称蒲鲁东为庸俗社会主义者。前者则以巴师夏为代表。马克思说:“蒲鲁东同巴师夏关于利息的论战是很有特色的,它既能说明庸俗经济学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的,也能说明肤浅的社会主义(蒲鲁东的论战未必配得上这个称号)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这些范畴的。”<sup>①</sup>但不管怎么说,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和庸俗社会主义者蒲鲁东都只是在范畴里面打转。而只要他们围绕范畴打转,就无法从本质上说明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现实的真实的经济关系及其历史起源。

作为商品转化形式的货币和作为资本转化形式的货币,前者必然发展为后者。而当后者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其实际表现形态中的中介环节完全消失了。这时的资本成了庸俗经济学家和庸俗社会主义者无法作出科学理解的对象。马克思说:“资本在自己这种最奇特同时又和普通观念最接近的形态上,既是庸俗经济学家的‘基本形式’,又是肤浅的批判的最直接的攻击点。就前者来说,部分地是因为内在联系在这里最少表现出来,而且资本是以一种好象是价值的独立源泉的形式出现;部分地是因为在这种形式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完全被掩盖了,被抹杀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不见了。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资本所以受到打击,是因为它在这里以最不合理的形式表现出来,给庸俗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最容易突破的攻击点。”<sup>②</sup> 17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对把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17页

息看作剩余价值的独立形式,表明“生息资本还是一种洪水前期的资本形式”,生息资本还处于依附产业资本的地位。靠降低利率来提高产业利润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因此,把生息资本当作资本的‘基本形式’来反对的社会主义,就不仅是本身完全局限于资产阶级视野的问题。而且,就它的论战并非一种出于误解的、盲目向资本本身发起的攻击和批判来说(不过,在这里把资本和资本的一种派生形式等同起来了),它无非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要求发展资产阶级信用愿望,因此,它只是表示,在这种论战披上社会主义外衣的国家里,现存关系是不发达的。这种社会主义本身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理论上的征兆,尽管这种资产阶级的努力可能采取非常惊人的形式,例如‘无息信贷’的形式。圣西门主义及其对于银行制度的赞美就是属于这一类(以后又出现过‘动产信用公司’)。”<sup>①</sup>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专门论述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对蒲鲁东的无息信贷理论的批判。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作为主体的G—G',批判蒲鲁东把生息资本当作资本的基本形式来反对的社会主义,即庸俗的社会主义。

与蒲鲁东把生息资本当作资本的基本形式加以反对不同,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生息资本是如何取得了资本的纯粹的拜物教的形式。马克思说:

“第一,这是由于资本作为货币的不断存在;在这样的形式上,资本的一切规定性都已经消失,它的现实要素也看不出来;它仅仅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作为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存在。在资本的现实过程中,货币形式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形式。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总是以这个形式存在。第二,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又是在货币形式上,表现为资本本身应得的东西,表现为货币资本,即同它完成的过程相脱离的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应得的东西。G—W—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18页



G'在这里成了G—G',而且,正像资本形式在这里是没有差别的货币形式一样,——因为货币正好是这样一个形式,在这个形式上,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差别消失了,从而由这些商品的存在条件构成的生产资本的差别,生产资本本身的特殊形式的差别也消失了……这样就得出一个自行增值的价值的,或者说,创造货币的货币的十分明显的形式。它同时又是毫无内容的形式,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形式。我们在分析资本时是从G—W—G出发的,G—G'不过是它的结果而已。现在我们发现G—G'作为主体。正像生长是树木固有的属性一样,生出货币(τοχος)是资本在其作为货币的纯粹的形式上固有的属性。”<sup>①</sup>

从马克思对作为主体的G—G'的批判考察中,不难发现,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对待资本完全是一种抛开G—G'主体生成过程的无批判的理解。庸俗经济学家意在论证资本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G—G'作为主体正是他们所企求的。如果说在G—W—G'中包含有中介过程的话,那么在G—G'中,利润的源泉完全被掩蔽了,资本表现为无概念的形式,生产关系在这里被高度地颠倒和物化了。这就从而抹杀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肤浅的批判者蒲鲁东,虽然对作为主体的G—G'作了批判,但这种批判实质上是一种非批判。因为蒲鲁东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对资本的盲目批判。显然,他是把资本和资本的一种派生形式等同起来,即把生息资本当作资本的“基本形式”。实际上,产业资本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形式,生息资本不过是从这个基本形式中派生出来的,产业资本为了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自己,从而创造出信用制度。这是产业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也就是说,信用制度本身是产业资本的一种形式。而蒲鲁东的庸俗社会主义只是在现存关系不发达的情况下、主张发展资产阶级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16~517页。

信用的愿望的表现。在他那里,国家银行具有和无产阶级相同的历史使命。

我们通过对马克思批判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对主体 G—G' 的理解中,发现马克思阐述强调了下面一些重要观点:人是人类历史的前提。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作出明确规定的—个理论观点。《1861—1863 年手稿》中指出,资本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属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过程。这是资本的历史创史时期。(例如,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在这里,劳动还只是必须同旧形式的劳动条件分离,而在旧形式下,劳动和劳动条件是一个统一整体。”<sup>①</sup> 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对人作为历史的前提的论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在于马克思侧重论述了作为历史前提的人与历史本身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时指出:“由于物的主体化、主体的物化、因果的颠倒、宗教般的概念混淆、资本的单纯形式 G—G' 在这里被荒诞地、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地展示和表现出来,资本的性质和形态也就完成了。同样,各种关系的硬化以及它们表现为人同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物的关系,在这里也以完全不同于商品的简单神秘化和货币的已经比较复杂的神秘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变体和拜物教在这里彻底完成了。”<sup>②</sup> 其原因就在于,利息表现为资本本身的价值创造,是从单纯的资本所有权中产生的资本的价值创造。这样一来,利息似乎是资本本能地创造出来的收入。实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Ⅱ,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545 ~ 54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48 页。

上,蒲鲁东也就是这样来理解利息的。由于在 G—G' 中中介过程完全消失,资本的物神形态从而得到完成。马克思揭示了产生资本物神形态的原因,“是由于资本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同它的经济上的所有权的分离,由于一部分利润在利息的名义下被完全离开生产过程的资本自身或资本所有者所占有。”<sup>①</sup> 生息资本的充分物化、颠倒和疯狂就是生“复利”的资本。它要求整个世界成为献给他的祭品。

#### 4. 批判蒲鲁东商品等于货币的观点

在蒲鲁东看来,“为什么产品的概念突然变成资本的概念呢?是由于价值的观念。也就是说,产品要变成资本就必须经过准确的估价,必须经过买和卖,它的价格必须经过争议并用一种合法的协定确定下来。例如来自肉铺的皮,是卖肉者的产品。如果制革者买了这些皮,那会怎样呢?后者就会立刻把它们或它们的价值并入自己的生产基金。通过制革者的劳动,这笔资本又成为产品等等。”<sup>②</sup>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和《1861—1863 年手稿》中先后两次征引了蒲鲁东上面这段话,并作了评价。在《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时引了蒲鲁东上面这段话。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意思是任何资本都是“确定的价值”。“这就是说:(1)产品由于成为价值而成为资本。换句话说,资本不外是简单的价值。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因此,蒲鲁东交替地一会儿说商品(表现为产品的商品的自然方面),一会儿说价值,或者不如说价格,因为他假定有买和卖的行为。(2)因为货币表现为简单流通中出现的价值的完成形式,所以货币在蒲鲁东那里也是真正的‘确定的价值’。”<sup>③</sup> 显然资本不是简单的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1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2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21 页。

交换。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过程中,在流通中交换价值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商品而出现的,另一次是作为货币而出现的。换言之,作为同一主体的交换价值依次作为商品、货币出现。这就是简单交换价值及其流通向资本的过渡。而蒲鲁东根本没有看到资本是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统一体的交换价值,更没有看到这种表现过程本身就是资本的流通。

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继续批判蒲鲁东的任何资本都是“确定的价值”的观点。在蒲鲁东看来,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已经是产品,因而是商品。表现为原材料的商品过去是资本,现在转化为原材料。针对蒲鲁东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事实上,他说的无非是,商品等于资本,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资本虽然作为商品或货币而存在,但是商品或货币本身并不因此就成为资本。问题恰恰是要阐明,资本‘观念’是怎样从货币和商品的‘观念’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只看到劳动过程,而没有看到价值增值过程;后者使生产总过程的产品不仅是使用价值,而且是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即商品。”<sup>①</sup> 蒲鲁东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看作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蒲鲁东仅仅根据使用价值来规定资本必然得出“商品就是资本”的错误观点。资本也就只能仅仅是被看作是物。另外,由于蒲鲁东把主观的抽象称为社会,这也就使他无法从商品范畴过渡到资本范畴,始终停留在把资本看作是以特殊方式使用的物的普通的浅薄观念水平之上。

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对资本作出多种规定。但每一个规定本身不一定就是对资本的科学规定。资本的表现形态是多重的。它可以表现为货币、同直接的劳动相对立的积累的劳动、用来制造产品的产品、生活资料等等。资本可以作为使用价值存在,这样的使用价值只不过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而已。如果忽视了“劳动过程同时是价值增值的过程,因而这个过程的结果不仅是使用价值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产品),而且同时是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即商品,那么就会产生下述荒谬的观念:似乎资本只转化为产品,因而只有当产品被出售,成为商品时,它才重新成为资本。”<sup>①</sup>

### 5. 批判蒲鲁东工人不可能买回自己产品的观点

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条经济定律:“要使生产者能够维持生活,就必须使他的工资能够买回他的产品。”如果原料的供应者和工人用他们加在一起的工资不能买回他们为企业家所生产的产品,他们就无法维持生活。根据蒲鲁东,在私有制的统治下,工人无法买回自己的产品。“如果工人每天用他的劳动可以得到三法郎的平均工资,如果他的雇主要想在他的薪金之外获得一些利益,即使仅仅是资本的利息的话,那么他在把他的工人的劳动日以商品的形式出卖时,必须从中得到超过三法郎的价值。因此工人就无法买回他给他的雇主所生产的东西。在各行各业都毫无例外地发生着这样的情况:裁缝、制帽工人、木匠、铁匠、制革匠、瓦匠、首饰匠、印刷工人、跑街等等,甚至农民和种葡萄园的都不能买回他们的产品,因为在给一个在某种形式下谋得利润的雇主做工时,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劳动必须支出比人们所付给他们的更为高昂的代价。”<sup>②</sup>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在分析生产过剩的原因时,提到了蒲鲁东的上述观点,批判了蒲鲁东把生产过剩原因归结为“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的观点,论述了生产过剩的发生是同价值增殖联系在一起。详细地分析了蒲鲁东的“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的观点。首先,在工人所购买的那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包含着利润。这实际就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如果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为20塔勒,等于产品的一部分,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页。

②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7~208页。

润为20%，那么资本家在出售商品时就会以22塔勒的价格卖给工人。马克思说：“蒲鲁东就是这样认为的，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即总产品中体现工人的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sup>①</sup> 假定工人的20塔勒，即工资等于4舍费耳谷物。蒲鲁东的意思是20塔勒是4舍费耳谷物的货币表现的价值，而资本家把4舍费耳卖22塔勒，那么工人就不能买回4舍费耳，而只能买回 $3\frac{7}{11}$ 舍费耳。货币交易把这里的关系歪曲了。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前提是错误的。“如果5塔勒表现为1舍费耳的价值，即物化在1舍费耳中的劳动时间，如果4舍费耳表现为必要工资，那么，资本家A就不是像蒲鲁东认为的那样按22塔勒而是按20塔勒售出这4舍费耳。事情是这样的：假定总产品（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是110塔勒=22舍费耳；其中16舍费耳=80塔勒，代表投在种子、机器等等上的资本；4舍费耳=20塔勒，代表必要劳动时间；2舍费耳=10塔勒，代表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把每舍费耳按5塔勒出售，即按每舍费耳的必要价值出售，然而他却从每舍费耳中赚得10%利润……这是因为资本家出售的全部谷物是 $22 \times 5$ 塔勒，而不是 $50 \times 5$ 塔勒。我们这里可以假设资本家为多生产2舍费耳谷物所需要的投资等于0，因为这2舍费耳可以完全归结为剩余劳动。”<sup>②</sup>

从马克思的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剩余的2舍费耳所包含的价值只不过是资本家的各项支出之外的剩余。资本家在卖给工人的4舍费耳中赚到2塔勒，原因在于除了这4舍费耳之外，资本家还按同一价格再出售18舍费耳。“资本家得到利润并不是由于他在出售给工人的这个部分上加了价，而是由于他在出售全部产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415页。

时也出售了他没有支付过代价、因而恰好是代表剩余劳动时间的那部分产品。”<sup>①</sup>

法国庸俗经济学批评家福尔卡德也批评了蒲鲁东的“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的观点。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福尔卡德的批判与“蒲鲁东的论断一样荒唐可笑”。福尔卡德说：“如果蒲鲁东……关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这个反对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意见不仅涉及资本的利润，而且会消灭产业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工人生产某物只得到80，却被迫要支付100来购买该物，如果他的工资只能从产品中买回他加进产品的价值，这就等于说，工人不能买回任何物品。”<sup>②</sup> 福尔卡德的意思是说，工人即使能收回他加进产品的全部价值，换言之，即使根本不存在利润和体现剩余劳动的任何剩余价值形式，工人也不能买回任何物品。实际上，福尔卡德根本没有理解蒲鲁东的意思。根据马克思，“蒲鲁东的愚蠢见解就在于，他以为工人用他（作为工资）所得到的货币买回的商品价值应高于包含在这些货币中的价值，也就是说，商品应高于本身的价值出售，因为出售时实现了利润等等。”<sup>③</sup> 针对福尔卡德认为“如果工人的工资不能从产品中买回他加进产品的价值，那么，工业就不可能存在了”的看法，马克思指出：“相反地，如果工资足以买回工人加进产品中的全部价值，那么，资本主义工业就不可能存在了。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和资本都不存在了。”<sup>④</sup>

福尔卡德说：“蒲鲁东忘记了国民资本的不断增长，他忘记了这种增长对一切工作者都是确凿无疑的，不仅对企业主如此，对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人也是如此。”<sup>①</sup> 马克思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废话。福尔卡德根本不佩“最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经济学家这一称号。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批判斯密的错误教条时又一次批判了福尔卡德对蒲鲁东的错误理解。马克思在肯定福尔卡德“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狭隘的角度提出的那个困难”的同时,指出福尔卡德以国民资本的不断增长为理由来解释“工人能买回自己的产品”是荒谬的。“如果一个化学家对于土地产品怎么会比土地包含更多的炭素这样一个问题回答说,这是由于土地生产的不断增长,人们关于这个化学家将说些什么呢?在庸俗经济学中,想要把资产阶级世界看成是最美好的世界的善良愿望,代替了爱好真理和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一切必要。”<sup>②</sup> 福尔卡德用“资本增长”这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并未能解开蒲鲁东的“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个谜。由上面的论述可知,这个谜是由马克思解开的。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一章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中指出,在国民收入理论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在重复斯密的错误教条。“蒲鲁东实质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把旧理论作了略有不同的表述。”列宁引出了蒲鲁东说明这一表述的数字例子:

“甲(指一切私有主、企业主和资本家)用一万法郎开办企业,预先把他付给必须为此而生产产品的工人。甲这样把自己的货币变成商品之后,他必须在生产终了时(例如以一年为期)重新把商品变成货币。他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谁呢?当然是卖给工人,因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企业主,另一个是工人。这些工人在早先因用自己的劳动生产产品而获得了满足其生活需要的工资一万法郎,而现在却必须偿付一万多法郎,即还必须偿付甲在年初就指望以利息和其他利润形式取得的附加额。工人只能靠借款来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54页。



偿这一万法郎,因此他就负债累累,陷于贫困。于是一定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或者工人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十分之九,或者工人只有把自己的工资偿还企业主,但是这样,企业主本身就陷入破产和贫困的境地,因为企业主得不到资本的利息,这种利息终究不得不由他自己来偿付。”

列宁在引用蒲鲁东的这个数字例子时这样写道: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困难,即如何实现额外价值,同样是瓦·沃·和尼——逊先生研究时所遇到的。蒲鲁东只不过用较特殊的形式描述了这个困难。他这种特殊的表述要使我国的民粹派同他接近,因为民粹派正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实现的‘困难’正在于实现额外价值(按蒲鲁东的说法是利息或利润),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从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来的糊涂观念不仅妨碍着阐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妨碍着阐明不变资本的实现,就是说,他们的‘困难’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整个实现过程。”<sup>①</sup>

## 6. 批判蒲鲁东所有权非经济起源的理论

在《1861—1863年手稿》中涉及资本的原始积累部分,马克思写有这样一段:

“[第四点。]蒲鲁东在他的《贫困的哲学》中论述了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问题,他把所有权理解为土地所有权。这种神话是在资产阶级以前的(资本主义以前的)[个人]同自己的劳动条件,首先同劳动的天然条件,从而同土地的关系中找到谜底的。他同样也完全可以把资本和雇佣劳动当作所有权形式而归之于非经济的起源。因为工人找到作为资本的劳动客观条件,资本家找到作为丧失所有权的工人即抽象工人的工人,这要以历史过程为前提,尽管[资本和雇佣劳动]会在某一天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再生产这种关系,既在广度上又在深度上发展这种关系,即发展构成资本和雇佣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1页。

劳动形成历史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不外是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而这些形式则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获得理论的或观念的表现。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以及这一历史的每一阶段,同样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自身运动的经济基础,不过这种情形实际上可归结为这样一种简单的同义反复:自古以来人的生活就以生产为基础,而人一旦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人的生活就开始以各种社会生产为基础,正是这种社会生产关系,我们也称之为经济关系。”<sup>①</sup>

这里的“[第四点。]”是针对前面三点而言的。第一点,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上既定的生产方式,进而探讨其存在的条件。第二点,强调资本的发展不是开天辟地就有的。它最先出现于16世纪和17世纪。第三点,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第四点,批判蒲鲁东的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理论。

第四点的原文,马克思摘自《1857—1858年手稿》,并作了一些修改。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批判了“蒲鲁东对所有权的起源问题的糊涂看法”。这里,对这涉及相同内容的两处论述作一比较。在《1857—1858年手稿》中,整个这部分的论述哲学味较浓。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称之为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的那种东西,“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因为,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在他之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sup>②</sup>“劳动的主体”、“自然的个人”、“自然存在”、“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在他之外的自然存在”等用语都是典型的哲学表述。而在《1861—1863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年手稿》那段论述中,马克思没有使用这些哲学化的表述。在论述资本和雇佣劳动形成史的历史过程时,《1857—1858年手稿》中这样论述道:“好样的蒲鲁东不但不可能,而且一定会同样振振有词地给作为财产形式的资本和雇佣劳动扣上非经济起源的罪名。因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工人方面作为跟他相分离的东西、作为资本出现,和工人在资本家方面作为丧失财产者、作为抽象工人出现,以及价值同活劳动之间发生的交换,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虽然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者本身再生产着这种关系,并且在它客观的广度上以及深度上都发展着这种关系),而这种历史过程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起源史。”<sup>①</sup>显然,《1861—1863年手稿》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更为简练。在论述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即为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时,马克思在两个不同时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表现出完全的视界融合,都非常突现人的社会性、经济关系。而这也恰恰是被蒲鲁东所忽略了的东西。

与《1861—1863年手稿》不同的是,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从系统发生学的角度详细地考察了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考察了从生产的原始形式、公社和以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解体的原因一直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从理论上强调以下几点:首先,生产的原始条件最初本身不可能是生产出来的,不可能是生产的结果。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sup>②</sup>再者,马克思论述了所有权的初始含义以及人的双重存在。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条件。生存的自然条件即表现为主体的自然又是客体的自然。在共同体中,所有权“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看作是与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自身的延伸。其实，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sup>①</sup> 原始的所有权可以为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所有权只有通过生产本身才能实现。实际占有从一开始就是发生在个人所处的各种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之中。

从孤立的人的发展出发来论述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是错误的。鲁滨逊之类的故事只是一种“美学假象”。人的孤立化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马克思说：“人的孤立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最初人表现为种属群、部落体、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作为孤立个人的人便只有依靠自己了，然而，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又使自己成为普遍的和共同体的生物。在这种共同体里，成为前提的是单个的人作为所有者（比如说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客观存在，而且这又是发生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的，这些条件把单个的人锁在这个共同体上，或者不如说，成为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sup>②</sup> 人们起初是在一定的基础上从事劳动。这种基础开始是自然形成的，然后就变成为历史的前提。再往后，这个基础即前提本身就被扬弃了，因为它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显得过于狭隘了，必然成为一种正在消灭的前提。

## 7. 蒲鲁东式的聪明

货币资本的流通是一个过程。只要货币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它们就是作为这种纯保存和增殖自己的货币额贷出的，因为这个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页。

货币额经过一定时间又带着利润流回来,并不断重复同一过程。它们只是作为商品资本被支出,而不是作为货币、商品被支出。“在考察整个过程时所表现出来的[资本]对自身的关系,在这里不经过起中介作用的中间运动,就单纯作为资本的性质,作为资本的规定性而加到资本身上。而资本就是在这种规定性中被出售的。但是,这种规定性本身只是这一过程和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运动的那些条件的结果。因此,进行斗争反对这种结果,只反对过程的结晶,而不触及它的根源——它的根源是雇佣劳动——,不触及过程,想用空话来摆脱它的结果,这是十足的蒲鲁东式的聪明。”<sup>①</sup> 这也就是说,资本是在脱离中介的情况下被出售的。蒲鲁东只是在不触及雇佣劳动的情况下反对过程的结晶。

这种蒲鲁东式的聪明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在反对货币资本流通过程的结果时,对银行寄以很大的期望。认为他们的新的银行组织会创造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实质是,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从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说就是: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而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如果流通的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又是以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把这些改变本身不是当作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是当作改造流通的逐步的结果。这一基本前提的荒谬足以证明,这种学说同样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sup>②</sup> 显然,蒲鲁东只是通过银行组织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手段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这样,蒲鲁东反对货币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本流通过程的结晶就只能是一种空想。

货币的不同文明形式也无法实现通过改变流通工具即流通组织而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货币的文明形式有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等。其中劳动货币就是包括蒲鲁东在内的社会主义者所推崇的，而劳动货币无法消灭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的不同阶段；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sup>①</sup> 蒲鲁东主义者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流通同其余的生产的关系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只是偶尔装腔作势地说几句。”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把货币流通和信贷完全混为一谈

与蒲鲁东式的聪明不同，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货币资本流通过程的结晶。资本的流通过程可归结为商品的形态变化，即归结为一系列的交换。如果把每个流通阶段看作整个过程的要素，从资本作为商品或作为货币执行职能的角度一般地来考察资本，那么资本的运动就必然表现为买或卖。如果考察整个过程，无论是从货币出发还是从商品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流回来是增殖了的货币额，同样，商品在完成了一定的周期以后被保存下来并且增殖了。这一切只有借助于货币、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中介系统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蒲鲁东之所以会用空话来摆脱生息资本流通过程的结晶，这就在于他没有看到，“在生息资本中，资本的运动只是被缩短了；中介过程被省略了，于是，资本，例如 1000，被确定为这样一种物，它潜在地是 1100，并在一定时期内转化为 1100……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4 页。

本现在是物,但作为物,它是资本。所以它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并列,作为特殊商品被出售,或者更确切些说,货币,商品现在可以作为资本被出售。这就是资本在它的最独立的形式上的表现。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它们一旦被贷出——或者处于生产过程中(因为正是它们给产业家带来同利润分开的利息),——不论它们是睡着还是醒着,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会在它们身上生长出利息。”<sup>①</sup>

## 第二节 《资本论》中对蒲鲁东的批判

### 1. 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的实质

一般价值形式给商品世界提供了一般的社会的相对价值形式。商品世界只有一种商品具有这种价值形式,即处于直接的社会的形式,而其它一切商品都不是处于这种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上面这一问题时,揭示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的实质。马克思指出:

“实际上从一般的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决不可能看出,它是一种对立的商品形式,是同不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分不开的,就像一块磁铁的阳极同阴极分不开一样。因此,设想能够同时在一切商品上打上能直接交换的印记,就像设想能够把一切天主教徒都变成教皇一样。对于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的小资产者来说,去掉与这种形式相联系的缺点,特别是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换的性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庸俗空想的描绘;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这种社会主义连首创的功绩也没有,在它以前很久,就由格雷、布雷以及其他人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354页。

更好地阐述过了。在今天,这并不妨碍这种智慧以‘科学’的名义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开来。没有一个学派比蒲鲁东学派更会滥用‘科学’这个字眼了。”<sup>①</sup>

早在 1859 年 2 月 1 日,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就谈到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它(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引者注)要保存私人的生产,但是私人产品的交换要加以组织;它要商品,但是不要货币。”<sup>②</sup> 马克思 1859 年 6 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从根本上打击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在蒲鲁东之前,布雷、格雷等人的社会主义坚持,“同时在一切商品上打上能直接交换的印记”,视商品生产为“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去掉商品不能直接交换的性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叙述了格雷的理论。格雷坚持“产品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在货币制度中发现的不是“劳动组织”,而是“交换组织”,并由“‘劳动货币’、‘国家银行’和‘商品堆栈’的‘有机’结构”组成。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理解货币是从商品本身中产生的,不理解货币产生的过程。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探讨了布雷的理论。从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直接劳动者的场合来看,布雷的“时间的等量交换”,私人交换也就有可能被废除。但由于商品的交换方式是同一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而生产方式是同阶级的敌对关系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sup>③</sup> 在布雷看来,“如果要顺利实现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改变人的性格;如果现在的制度没有条件和可能来改变这种性格,使人们达到合乎我们理想的更好的状态,那末显而易见,情况就必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5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17 页。



然会保持原状。”<sup>①</sup>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庸俗空想的描绘。”不过，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sup>②</sup> 然而，蒲鲁东只不过是“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实际上“只是一个小资产者”。

## 2. 蒲鲁东的“定理”

在《资本论》的草稿《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马克思在论述劳动的剩余给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时，在注中引用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下面这样一段话：

“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这个定理是经济学家们公认的。这个原理对我来说是普遍的和绝对的真理；这是可以当做全部经济科学总结的比例规律(!)的必然结果。但是请经济学家们原谅，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的原理，在他们的理论中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会得到任何证明。”<sup>③</sup>

《哲学的贫困》中首次对蒲鲁东的这一定理展开了批判。为了证明这一定理，蒲鲁东把社会人格化，将社会变成作为人的社会。在蒲鲁东看来，经济学家们根本不了解社会“这种集合体的个性”。他证明“劳动剩余”这一原理的根据是：该“原理产生于社会，社会因此以自己的规律加惠于个人”。蒲鲁东这种神秘主义的表述如果是指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多于没有联合的个人生产剩余的话，那么，前人早就说过了。马克思举出了萨德勒在《人的规律》一书中的论述：“全体等于各部分之和这一数学定理，如果应用到我们所考察的对象上来就会错误。至于劳动即人类生存的伟大支柱，那么可以说，共同努力的产品要远远超过个人的和分散的努力

---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4页。

②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所能产生的一切。”蒲鲁东自认为“劳动剩余”在作为人的社会中得到证明。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用事实并未证明这种人的生活所服从的规律是和确定作为个人的人的活动的规律相对立的。但蒲鲁东自认为他已用理论和事实证明一切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这一定理。根据马克思，蒲鲁东的“事实”就是“累进算法”，“理论”即为“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而蒲鲁东的“普罗米修斯”就是“社会”，即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尽管如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蒲鲁东还是激动地以教训人的口吻大声喊道：“我恳求经济学家们暂时摆脱心灵深处那些迷惑他们的成见，不要考虑他们既得的或者希望获得的职位，不要考虑他们为之献身的利益，也不要考虑他们所追求的称赞和诱惑他们虚荣心的声誉，反躬自问一下，到目前为止，以我所说明的前提和结果这一环节来说，任何劳动都必须留下一些剩余这个原理会出现在他们面前吗？”<sup>①</sup>

以上就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剩余劳动定理的批判。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对这一批判作了如下的概括：“蒲鲁东先生一点也不懂得，这个‘劳动的剩余’就是代表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的剩余产品。因为蒲鲁东先生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实际上看到，任何劳动都留下这样的‘剩余’，所以他就力图用劳动的某种神秘的自然属性来解释这个事实，并想以‘比例规律的必然结果’等冗长之词来招摇撞骗摆脱困境。”<sup>②</sup>《1857—1858年手稿》彻底揭露了蒲鲁东在论述剩余劳动问题上的神秘主义。马克思说：“蒲鲁东的公理是：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多么不理解。他所否认的属于资本的东西，都被他变为劳动的自然属性。可是，关键在于，满足绝对需求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留下了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多少，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因此，只要进行剩余劳动，就能创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剩余产品。目的是要消除[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本身;这样,剩余产品本身就表现为必要产品了,最后,物质生产也就给每个人留下了从事其他活动的剩余时间。现在这已经是没有什么神秘的了。最初,大自然的赐予是丰富的,或者说,顶多只要去占有它们就行了。”<sup>①</sup>

马克思在上面这段话中讲了四层意思:蒲鲁东根本没有理解剩余劳动;资本的属性被变为劳动的属性;自由时间为创造剩余产品提供了条件;消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定理的神秘性时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关于共产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变为必要劳动问题,即消除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本身。对于这个问题,《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了这样的论述:“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sup>②</sup>资本的文明之一是其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与以前的所有制相比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王国只是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自然必然性王国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sup>③</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7页。

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时,马克思这样写道:“在西欧社会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剩余劳动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sup>①</sup> 在这一段中,马克思加了这样一个注:“‘任何劳动都必须〈看来,这也是市民的权利和义务〉留有一些剩余量。’(蒲鲁东)”马克思在这里又一次提到了蒲鲁东的剩余劳动定理。并用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来驳斥蒲鲁东的剩余劳动的定理。根据弗·沙乌《土地、植物和人》一书,亚洲群岛东部一些岛屿上的森林中长着野生的西米树,“居民在西米树上钻个孔,确定树髓已经成熟时,就把树放倒,分成几段,取出树髓,再掺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从一颗西米树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 300 磅,有时可采得 500 磅至 600 磅。那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像我们到森林去砍柴一样。”假定这些居民为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劳动 12 小时,显然,良好的自然条件直接给予他许多闲暇时间。但要居民把这闲暇的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要这些居民“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因此,良好的自然条件并不能说明居民要提供剩余劳动。不管怎样,居民的“剩余产品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人类劳动的某种天生的神秘性质。”<sup>②</sup> 这再一次证明蒲鲁东的定理是与经济事实相悖的。

### 3. 蒲鲁东的集合力理论

蒲鲁东在《关于星期日的讲话》中首次提到了集合力理论,《贫困的哲学》中也有所提及。对这个理论最为详细的论述是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蒲鲁东说:“有人说,资本家已偿付了工人的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62 ~ 56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63 页。

动日；但为了确切起见，应该说资本家每天雇佣了多少工人，就偿付多少个劳动日，这与上面的说法就决不是一回事了。因为，对于劳动者因团结协调和群策群力而产生的庞大的力量，资本家并没有给予任何报酬。两百个卫兵在几小时之内把吕克索尔的方尖石塔竖到它的基石上；假如只是一个人，让他做上二百天，他能办得到吗？可是，在资本家的帐上，工资的总数没有什么不同。”<sup>①</sup> “一千个人工作二十天的一股力量是按照单独一个人工作五十年的同样的工资标准来支付的；但这一千个人的力量在二十天之内已经完成了一个人即使劳动百万个世纪也无法完成的工作。这样的交易是不是公允呢？我再说一遍，这是不公允的。虽然您已经偿付了所有的个别的劳动力，但是您没有偿付集体的劳动力。因此，始终存在着一个您所没有获得的而您却在非法地享受着集体所有权。”<sup>②</sup>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摘引了上面这段话。现据马克思的摘录，引出蒲鲁东的完整的原文。在上面这段话的前面还有这样几句：“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把他们分隔开来，你就能够控制他们；把他们分隔开来，你就能够发财致富；把他们分隔开来，你就能够欺骗他们，既可以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又可以嘲弄正义。如果把劳动者互相分隔开来，那么付给每个人的每天的工资可能还会超过他所生产出来的价值；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马克对蒲鲁东上面这段完整的话作了这样的评价：“蒲鲁东最先注意到：付给单个工人的工资的总和，即使在每一单个人的劳动都完全得到了报酬的情况下，也还是不足以偿付物化在大家的产品中的集体力量；因此，工人不是作为集体劳动力的一部分而被雇佣的。”<sup>③</sup>

蒲鲁东称上述这种现象为“计算错误理论”。劳动者由于分工协作所产生的集合力没有被资本家支付。受到资本家支付的是单

---

①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39 页。

② 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41～14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5 页。

个的劳动而不是结合的劳动。在协作的情况下,提高了生产力,必然造成同一劳动量相对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在这种情况下支付给一个工作日的工资同从前一样多。这样一来,就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所占的工资部分的费用便减少了。从而,资本家得到了超过其所支付的费用利益的利益。实际上,蒲鲁东讲的是协作。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也论述了这一问题。马克思说: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和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sup>①</sup>

这表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从这里可以看出,蒲鲁东的集合力理论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协作创造了一种生产力,即集体力。资本家支付的是单个劳动,而不向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独立形态的“协作”支付。然而,蒲鲁东用“计算错误”的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是错误的。因为作为单个的工人彼此不发生关系,在交换过程中已经出卖了劳动力商品是属于资本家所有的。在劳动过程中,工人成为协作者代表着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存在方。在生产过程中工人所生产出的生产力不属于工人所有而属于资本家所有。资本家支付的是一定的独立的劳动力价值,而不必支付一定的结合的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享受到“结合劳动的集合力”是符合价值规律的。蒲鲁东的错误在于没有把资本和劳动的两个交换过程区别开来。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 4. 劳动的价值

在《资本论》第六篇第十七章“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这一部分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劳动的价值”的观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曾对蒲鲁东的“劳动的价值”理论进行过批判。根据蒲鲁东,“人们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们认定劳动中所隐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倒因为果的比喻的说法。”<sup>①</sup> 针对蒲鲁东的这种说法,马克思批判道:“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事实只看作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人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sup>②</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六篇第十七章“劳动的价值或价值转化为工资”中,进一步推进了对蒲鲁东的“劳动的价值”观点的批判。《哲学的贫困》是从拥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观点来批判蒲鲁东的。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马克思在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蒲鲁东的“劳动的价值”的理论。根据马克思,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转向其自身的反面。说“劳动的价值”就如同说“土地的价值”一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使用“劳动的价格”时显得毫无批判性。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支配着和调节着劳动的偶然市场价格的价格只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劳动的价值。即便如此,也无法通过劳动的偶然价格进到劳动的价值。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只不过是谈论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并未确切地规定“劳动的价值”的内容。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功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0页。

一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毫无批判地采用‘劳动的价值’，‘劳动的自然价格’等等范畴，把它们当作所考察的价值关系的最后的、适当的用语，结果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同时替庸俗经济学的在原则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理论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sup>①</sup>

劳动的价值即为劳动力的价值，而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表现为自身的转化形式——工资。与在《哲学的贫困》中不同的是，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时的重大理论推进在于，明确地规定了“劳动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语……劳动的价值必定总是小于劳动的价值产品，因为资本家总是使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超过再生产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工资与剩余价值的关系就在于，“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途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sup>②</sup> 工资问题只有在确立劳动力商品的范畴的同时、完成商品价值理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才能得到全面而系统的说明。马克思的结论是：“‘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sup>③</sup> 正是通过长期艰苦的研究，马克思才发现了包括蒲鲁东在内的以往经济学家所没有发现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科学地说明了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的形式。同萨伊一样，而蒲鲁东只不过是“把价值了解为什么也不是……这样，就可以随便把任何东西都包括到这个范畴中去。”<sup>④</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8页。



## 5. 价值形式的特殊性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章“简单再生产”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当我们讲到社会的考察方法,也就是考察既包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也包括个人消费的社会总产品的时候,绝不可陷入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而把问题看成是,好像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要研究总体资本家。总体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的总和。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sup>①</sup> 在这里,马克思主张从整体上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而蒲鲁东运用的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抄袭来的方法”把握社会。蒲鲁东具体抄袭了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考察社会会失掉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这里的“独特”指的又是什么?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指出了这种方法:“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484页。

再也没有历史了。”<sup>①</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的第33个注中再次强调了资产阶级所采用的方法的非历史性。事实上,某些特有的经济形式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而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中,它们却变成了自然的必然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始终未能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斯密和李嘉图恰恰“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及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sup>②</sup> 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错误地把资产阶级这一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形式,从而淹没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这是资产阶级非历史主义方法的本质错误所在。蒲鲁东犯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错误。

价值形式的特殊性,或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式的个性为什么会被忽略呢?这必须从生产说起。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即社会个人的生产。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的规定。生产一般只是一个抽象。但只要这种抽象真正把共同点提升出来,就是一合理的抽象。这个一般,即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由许多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对于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1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

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马克思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没有生产工具,任何生产都无法进行。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任何生产都无法进行。资本是生产工具,即过去的、客体化的劳动。因此,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就完全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李嘉图就是把资本看作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的那种积累的劳动。”<sup>①</sup> 这就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从而把资本变成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变成了抽象的产物。马克思说:“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特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sup>②</sup> 当然,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资本始终是资本。而李嘉图的“积累的劳动”这一概念中已经意味着一定数量的体现着劳动的物品。要阐明资本概念,必须从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劳动出发。从劳动不可能直接过渡到资本。把资本看作是“积累的劳动”实质上是把资本看作是生产工具。从而资本也就成了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的、完全非历史的东西。

---

①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伦敦 1821 年版,第 49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2 页。

## 第七章

# 马克思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者的交锋

蒲鲁东虽于 1865 年去逝,但蒲鲁东主义仍有着一定的影响。1867 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取代了蒲鲁东主义。自 1867 年下半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住宅、政治、权威、政府等一些具体问题上继续与蒲鲁东主义者展开斗争,从而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有许多极其珍贵的东西即使在今天仍有着它的价值和意义。

### 第一节 马克思在通信中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 1. 批判民族问题上的蒲鲁东主义立场

《资本论》出版前夕,蒲鲁东主义仍然十分猖獗。1866 年 6 月 7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巴黎大学生中的蒲鲁东派(《法兰西信使报》)鼓吹和平,宣布战争是过时的东西,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把这一策略当做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

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而他们自己愈是厉害地叫喊‘社会科学’,就愈加陷入贫穷和愚昧的统治之下,他们简直太可笑了。在他们关于法国当前农业危机的论文中,他们的‘学问’非常令人惊讶。”<sup>①</sup>

马克思在上面这段话中提到的《法兰西信使报》(Le Courrier français)是法国左派共产党人的政治性周报,从1867年6月18日起改为日报。1861-1868年在巴黎出版;从1866年5月20日起由蒲鲁东主义者奥·韦莫雷耳任编辑。从这时起该报成为国际在法国的机关报,在该报上刊登过总委员会和地方各支部的文件;也刊登过保·拉法格和劳·马克思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法兰西信使报》是马克思在60年代常读的一份报纸。这份报纸经常转载或发表马克思的作品。但马克思对该报有时不严肃的做法表示不满。1867年9月4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在总委员会里发言反对与和平空谈家为伍。我的发言历时约半小时。担任书记兼记录员的埃卡留斯给《峰房》写了一篇报道,它只刊登了我的发言中的几句话。《信使报》转载时又把关于军队面向俄国的必要性和关于这些家伙的怯懦性的话删去了。”<sup>②</sup>9月7日,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法兰西信使报》毫无道理地篡改我寄给它的一篇关于许布纳尔的短评,把《tomber sous la subhastation》[‘被拍卖’]一语(拿破仑法典的用语)改为《tomber sous le marteau des démolisseurs》[‘陷入破坏者的铁锤之下’]。”<sup>③</sup>1867年10月19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信使报》上关于军事艺术的那篇无聊的东西,我没有读,可是我读了蒲鲁东论自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346

发生的文章！我想都是差不多的货色。”<sup>①</sup> 这里指的是《法兰西信使报》在 1867 年 10 月发表的努革斯《军事艺术和进步》和《比·约·蒲鲁东关于自然发生的一些未发表的信》两篇文章。马克思借助《法兰西信使报》获得一些重要材料。12 月 7 日，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这一束《信使报》你一定要寄还给我。我需要搜集这些材料，因为这是能够使我经常得到交易所情报的唯一报纸。”<sup>②</sup>

马克思在 1866 年 6 月 7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所写到的“巴黎大学生中的蒲鲁东派（《法兰西信使报》）鼓吹和平，宣布战争是过时的东西，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这句话，其背景是：1866 年 5 月 20 日《法兰西信使报》第 15 号上刊登了一篇针对普奥之间的战争威胁而写的呼吁书：《巴黎大学生致德意志和意大利大学生》。该呼吁书是在蒲鲁东思想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在 1866 年 6 月 5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讨论了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以各国工人名义起草的答巴黎大学生以及各国大学生和青年的呼吁书。马克思对该呼吁书的内容并不满意。马克思在 1866 年 6 月 19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的辩论中，对民族问题上的蒲鲁东主义立场作了全面的批判。第二天，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扼要叙述了自己的批判情况。国际总委会讨论的是目前的战争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料，“讨论归结到了‘民族特性’问题和我们对该问题的态度”。到会的有一些是法国人。马克思写道：

“‘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一切都应当分解成小‘团体’或‘公社’，然后它们又组成‘联合会’，但并不是国家。在人类的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相互性’向前发展的同时，其它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7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13 页。

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一切正是傅立叶期待于他的模范的法伦斯泰尔的。此外,所有用旧世界的‘迷信思想’来使‘社会’问题复杂化的人都是‘反动’的。

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 9/10 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sup>①</sup>

马克思在 1866 年 10 月 9 日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sup>②</sup> 这里日内瓦代表大会指的是 1866 年 9 月 3—8 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 60 名代表,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马克思写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参加大会的总委员会代表的指导性文件。掌握大会 1/3 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写了一份专门的意见书,提出了他们关于各项议程的广泛纲领来同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相对抗。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讨论共同章程和条例时,法国代表托伦对第 11 条“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出了修改意见,声称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是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实际上是针对马克思而提出的。托伦的声明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其他代表的坚决反击。克里默等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国际本身的存在就有赖于许多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他们特别指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0 ~ 23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30 页。

出马克思的功绩,认为马克思一生的目的就是谋求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托伦的修改意见终被否决。其实,委员会早在1865年3月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中,就反对只有工人才能成为工人组织中的负责人员的这种错误的蒲鲁东主义观点。

在日内瓦会议上,马克思提出的《指示》共有九点,其中作为大会决议通过的有以下六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缩短工作日、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合作劳动、工会、常备军。关于波兰问题,通过了约·菲·贝克尔的折衷性决议案。日内瓦代表大会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这次大会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此,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结果比他预期的来得好。不过,当时蒲鲁东主义的影响以及造成的祸害使马克思深感不安。他在10月9日的信中对恩格斯说:

“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不过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他自己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而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里却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愚昧、虚荣、傲慢、饶舌、唱高调,他们几乎把一切都败坏了,因为他们出席大会的人数同他们的会员人数是根本不相称的。在报告中我将要不指名地谴责他们几句。”<sup>①</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页。



## 2. 决定出版《资本论》法译本

德文版《资本论》正在出版过程中时,马克思就准备出版法文版《资本论》。1867年5月1日,马克思在致毕希纳的信中写道:“我到德国来,是为了把我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卷交给在汉堡的我的出版商奥托·迈斯纳先生”。马克思打算等书在德国出版后,“再用法文在巴黎出版”。致于为何要出法文版《资本论》,信中写道:“我认为,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不久前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以及在我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同巴黎支部的联系中,经常遇到蒲鲁东主义的最恶劣的后果。”<sup>①</sup>

1867年11月27日,席利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赫斯对《资本论》的评价很好,他打算给《法兰西信使报》写一篇文章来介绍这部著作。同时席利还告诉马克思说,赫斯建议同埃·勒克律一起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并予以出版。三天后,马克思在信中告诉席利,他将把译文作某些修改,并保留最后的审稿权。马克思写道:

“首先应该尽快地在《法兰西信使报》发表这部书(《资本论》——引者注)的一些片断……他(赫斯——引者注)拟定的题目——英国的工厂立法——最适于作导言。但是,在这里也必须把价值理论先谈上几句,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蒲鲁东把人们的头脑搞得十分混乱。他们认为,如果商品按照它本身的成本,即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加工资(即加在生产资料上的劳动的价格)出售,那就是按它的价值出售。他们不了解,商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也是一个同有酬劳动一样重要的价值要素,现在这个价值要素采取了利润等等的形式。他们根本不知道工资是什么东西。不了解价值的性质,而去阐述工作日等等——总而言之,阐述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6页。

工厂立法——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关于这一点必须先谈几句。”<sup>①</sup>

可见，出版法文版的《资本论》主要是为了在法国澄清被蒲鲁东搞乱了的理论。马克思对出版《资本论》的法译本非常重视。他希望以此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马克思不反对埃·勒克律参加，但持续了近三年的谈判没有导致任何结果。后来才弄清，原来勒克律是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领导成员之一。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资本论》第一卷在法国出版更为迫切，约瑟夫·鲁瓦被推荐为《资本论》的法文译者。鲁瓦的职业是中学教员，在波尔多市生活和工作。当他从龙格那里得知可以从事翻译《资本论》时，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此之前，鲁瓦翻译的费尔巴哈的《宗教·死与不死》一书于1864年在巴黎出版。鲁瓦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始自1872年2月，完成于1873年底。在翻译过程中，鲁瓦也关心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根据合同规定，全书交稿后译者得到一笔共1500法郎的稿酬。

1872年2月5日，马克思与出版商莫利斯·拉沙特尔签订了合同。拉沙特尔是一位进步的出版商和历史学家，曾多次为自己的出版物遭到迫害。1857年，他因出版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一书而被判处一年徒刑。他出版过的书籍包括关于出版业务的组织方法、关于招魂术的论文集、字典和百科全书等。计划出版中的法文版《资本论》共有九集。从拉沙特尔1872年10月1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1872年9月17日出版了第一集。此外，拉沙特尔在该信中还向马克思谈了许多出版方面的情况，该信全文如下：

“随信附上从出版之日（即9月17日）起到10月12日为止每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575页。

天出售《资本论》第一集的日报表。一共已出售了 576 册。

我们一不发任何广告,二不写文章,也不贴海报、布告甚至连商品说明书也没有,就取得这样的成就。没有,绝对没有发任何有关出书的消息,甚至连我通常登在其他出版物的软封皮上的那种简单的广告也没有。

我们应当感到满意。

现在我正为自己的《罗马教廷史》准备一批封皮,这本书一共要印 2.2 万册;我们也准备逐步为其他出版物印制类似这样的封皮,这样,《资本论》的销路就扩大了。但是书必须定期出版,譬如两周或三周出一集。

请您立即签署四分册或六分册的纸版,而且请您作出最大的努力,以免出版中断;必须签置头六分册稿件以便出版;虽然一集包括五分册,但每两分册是同时印刷的,第六册同第五册一起印,任何两分册都是这样。

听说您的传记在巴黎需要量很大。我估计您会委托您的朋友恩格斯来办这件事的。我们将把传记放在书的末尾,使书圆满结束。

昨天我收到了第八分册和第九分册的校样。错字很少;还缺第十分册第二集就能定形了;亲爱的老师,请您行个好,毫不拖延地把签置好的第五分册至第十分册寄来付印,以缓解订户合理的迫切心情。

请代我向拉法格先生和龙格先生,并请代我向您的女儿拉法格女士表示敬意,我希望家庭环境有助于她迅速恢复健康。

老师,向您和您的全体亲属问好。

莫里斯·拉沙特尔

西班牙的政治事件继续使我们感到吃惊,菲洛尔起义虽遭镇压,但革命随时可能在其他地方,在马拉格或是在巴塞罗马爆发。

祝公社和同盟的红旗永远飘扬!”<sup>①</sup>

1875年11月,出齐了法文版《资本论》的九集共计四十四个分册。1874年7月23日,马克思在致拉沙特尔的信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感到,世界到处,其中包括法国,日益需要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正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社会主义“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论述”。<sup>②</sup>

## 第二节 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的批判

### 1. 关于住宅问题:恩格斯与米尔柏格论战的概况

米尔柏格是一个蒲鲁东主义者,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在关于住宅问题方面,恩格斯与他展开了一场论战。米尔柏格所写的《住宅问题》的系列文章先后在1872年初的奥地利《人民意志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或转载。这些文章总共有六篇。《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在发表米尔柏格的《住宅问题》的文章时声称:米尔柏格的文章“尽管主要是针对维也纳的情况,特别是后两篇是专门研究维也纳市政委员会的提议的,但这对于普遍的利益毫无损害,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弊病。”

米尔柏格的文章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住宅缺乏现象,提出了一整套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反动的解决办法,他想“让德国工人领悟一下蒲鲁东的社会万应灵丹的奇效”。恩格斯于同年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一文,批判米尔柏格所宣扬的蒲鲁东主义,后又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第

---

<sup>①</sup> 转引自 A·B·乌罗耶娃:《不朽的著作》,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6~147 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412 页。

二篇文章《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对以艾·扎克斯的小册子《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解决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方法进行批判。1872年10月，米尔柏格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住宅问题——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驳恩格斯的批判。三个月后，恩格斯又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第三篇文章《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对米尔柏格的反驳再次进行了批判。在1872年和1873年，恩格斯的这三篇文章曾分别出过单行本。1887年，恩格斯把上述三篇文章集结成册再版，书名为《论住宅问题》。

## 2.《论住宅问题》第一、三部分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与米尔柏格的论战，是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之后，第二次公开地与蒲鲁东主义者的论战。恩格斯在这场论战中，集中地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关于住宅问题的错误观点，并进一步对蒲鲁东的理论观点展开了批判。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中说明了这次论战由他公开出面的缘由。他说：“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sup>①</sup>在批判中，恩格斯叙述了他和马克思的一些共同的理论观点，从而在理论上揭穿了那些自命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荒谬性。

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续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问世之后，蒲鲁东又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已作过论述，如《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战争与和平》、《论工作阶级的政治能力》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蒲鲁东提出了系统的社会改良方案。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5页。

贫困》的姊妹篇，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担负起了批判蒲鲁东的社会改良方案的任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在蒲鲁东提出他的实际的社会改良方案以前几年问世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发现蒲鲁东交换银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就由这本小册子来补充，可惜补充得很不够。马克思自己一定会把这一切做得好得多，令人信服得多。”<sup>①</sup>

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首先批判了蒲鲁东的学说。从根本上来说，蒲鲁东用法权领域中的永恒公平代替对经济现实的分析。恩格斯指出：“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sup>②</sup> 恩格斯还引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蒲鲁东的这种“永恒公平”的批判。“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他的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权。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现实的物质新陈代谢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力’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的新陈代谢，那末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末这个人对于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2页。

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sup>①</sup>

蒲鲁东对近代工业文明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大工厂生产的出现是一件不应当有的事。恩格斯指出:“小资产者蒲鲁东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如果这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么‘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式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进程摧毁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消灭了大工业一切部门中的单独劳动,并且日益消灭着小工业和最小工业各个部门中的单独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被征服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sup>②</sup> 与现代的工业文明相反,蒲鲁东渴望的是“永恒公平”,每个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实际上,两个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以便互相换取产品来供各自消费,这种单独交换已经逐渐被现代大工业所消灭。这就表明蒲鲁东的全部体系失去了根基。这同时也表明“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至于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十足收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42 ~ 243 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45 ~ 246 页。

人’并使‘永恒公平’得以实现就行了!”<sup>①</sup> 这表明蒲鲁东主义所追求的只是公平得胜,根本不顾及世界的实际存在状况。

早在 1847 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就给了蒲鲁东的观念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在 25 年后却在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中把蒲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这就严重地阻碍了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恩格斯理所当然地立刻进行了批判。

在恩格斯看来,住宅缺乏现象不是现代所特有的,几乎每一时代的被压迫阶级都面临这一问题。“今天所说的住宅缺乏现象,是指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里的住户愈加拥挤,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当然“要消除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sup>②</sup> 恩格斯时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住宅缺乏现象并非资本家把工人当做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社会革命力图消灭的根本祸害不是住宅缺乏现象,而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消灭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在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看来,“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sup>③</sup> 针对这一观点,恩格斯批判道:承租人和出租人,作为住宅问题上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他们之间反映出的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关系,而并非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关系。也就是说,在承租人和出租人那里,没有出现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的后果。“资本家迫使买到手的劳动力首先再生产出它自己的价值,然后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以前暂时保留在这个资本家手里的剩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4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37 页。

③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2 辑,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5 页。



价值。于是,在这里就产生出一些过剩价值;现有价值的总量就增加了。租赁交易时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论从承租人那里索去多少,这始终只是已经存在着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旧不变。”<sup>①</sup>可见,米尔柏格完全歪曲了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把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了。

由于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曲解了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单纯的经济关系,他必然认为“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权利根据来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五十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原先的费用就由于房租收入而得到了二倍、三倍、五倍、十倍和更多倍的补偿。”<sup>②</sup>在这里,米尔柏格忽略了两点,一是房租应该作出的补偿是多方面的,如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房屋修缮费用、住宅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等;二是房租应补偿地皮价值增长额的利息。如果米尔柏格认为因这种价值的增长是未经土地所有者干预而形成的,从而归社会所有,这就等于要求废除土地所有权。恩格斯认为这里问题的实质是忽略了“造成某种经济现象的真正实际条件,当然也就弄不清楚,为什么原先建筑房屋的费用在一定情况下竟会在五十年内以房租形式得到十倍的偿还。”<sup>③</sup>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没有从经济方面研究上述现象,而只是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律领域,回避对房屋究竟如何成为权利根据的说明。实际上,这不过是由经济条件引起的结果。只有在权利根据的形式下,社会才会认同这种经济条件。针对恩格斯的上述批判,米尔柏格反驳道,房屋是究竟如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0页。

②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1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2页。

成为“权利根据”的这一问题并不属他的论述范围。他认为恩格斯“像老虎等待着猎物一样地等待着一个机会,以便把他对蒲鲁东的满腹牢骚一下子倾吐出来……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应当渗透着权利观念,那么我也就是在描述现代社会本身,在这个社会里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权利观念,至少是缺乏革命的权利观念,——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sup>①</sup>

从米尔柏格的论述中可知,社会应当渗透着法权的观念,这被他称为“描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正是在于,前者是真实地描述某一具体事物,即描述经济关系,说明这些关系如何存在、发展,并从经济学上来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诸因素的发展。恩格斯说:“相反,蒲鲁东则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定(‘法权观念’不是他的而是米尔柏格的东西)来改造自己。我们加以证明的东西,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柏格却在说教和哀诉。”<sup>②</sup> 在蒲鲁东那里,“革命”变成了一种体现和实现其“公平”的神灵,并错误地把 1789 - 1794 年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这在蒲鲁东 1848 年以后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蒲鲁东总是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法权、政治、宗教。根据恩格斯,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称公平为“永恒公平”(justice éternelle 又译为“永恒正义”)。“后来永恒性就不再提起了,但实质上还是保存着。例如,在 1858 年出版的‘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这一著作中,下面一段就表现着这整整三卷说教的内容(第 1 卷第 42 页):‘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則,支配其他一切原則的原則,指导、保护、排斥、惩戒、在必要时甚至镇压一切叛乱因素的原則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吗?……这个原則在我看来就是公平。什么是公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2 辑,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05 页。

平呢？这就是人类自身的本质。从世界创始以来，它曾是什么呢？曾是虚无。它将来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一切。’”<sup>①</sup> 不难发现，蒲鲁东的“人类自身本质的公平”实即“永恒公平”，他的社会原则“是在任何冲突下人们所诉诸的最高裁判官”。这就决定了蒲鲁东在判断经济关系时不是依据经济规律而只是依据经济关系是否符合其永恒公平的观念。而米尔柏格要求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变化“都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这在其实质上与蒲鲁东的“永恒公平”是一致的。

在论述住宅问题时，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没有论述真正有关工人的重大问题，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问题。蒲鲁东本人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搞清楚。恩格斯指出：“非常可悲的是，二十五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义的精神食粮。假如蒲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还会在德国泛滥，那就加倍可悲了。但是对这点根本用不着担心。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已经比蒲鲁东主义先进了五十年，所以仅仅只要以住宅问题作为例子说明一下，就可以不必再在这方面继续操心了。”<sup>②</sup> 在这里，恩格斯论述的是蒲鲁东的思想在操罗曼语的工人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已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米尔柏格在反驳恩格斯时指出：“实际上，如果人们注意到罗曼语地区的工人的革命要求，就不难看出，蒲鲁东所规定的原则几乎到处都成为运动的活的灵魂。多年来，我们德国一直在为国家帮助和自助等口号而争吵不休，现在我们还非常喜欢争论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中制和联邦制等这些抽象的概念，这种情况之所以容易发生，是因为对这些东西一个人有一个理解，但是这些众所周知的东西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0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58 ~ 259 页。

被看作是朽木。人们看到,‘无政府状态’、‘组织经济力量’、‘社会清算’等原则(?!?)是怎样在那里发生了根,它们是怎样成了革命运动的真正体现者。”<sup>①</sup> 针对米尔柏格的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那里“蒲鲁东所规定的原则几乎到处都成为运动的活的灵魂”这一反驳,恩格斯批判道:“工人运动的‘活的灵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在于‘原则’,而在任何地方都在于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积聚。”<sup>②</sup> 米尔柏格认为蒲鲁东的“原则”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只形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宗派。对蒲鲁东所提出的“社会清算”、“组织经济力量”的社会改良方案,法国工人群众根本不愿理会。工人运动直接受蒲鲁东的“原则”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时。米尔柏格认为恩格斯在论住宅的第一篇文章的结尾带有惋惜的语调。对此,恩格斯指出:“如果我认为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在二十年内只是从蒲鲁东那里才直接或间接得到精神食粮是一种不幸,那末我认为这种不幸并不在于被米尔柏格称为‘原则’的蒲鲁东的改良药方在那里占有完全神秘的统治,而是在于他们对现存社会的经济批判受了完全谬误的蒲鲁东观点的传染,他们的政治活动也被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败坏了。”<sup>③</sup>

### 3. 恩格斯的《蒲鲁东的〈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摘录》

这一摘录是恩格斯在写《论住宅问题》一组文章时做的。恩格斯所摘的蒲鲁东的原著是1869年巴黎版《战争与和平》(La guerre et la paix)一书。恩格斯所摘录的是该书的第2卷。蒲鲁东主义者

---

①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1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8页。

米尔柏格在论述住宅问题时曾征引过蒲鲁东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恩格斯研究蒲鲁东该书与此有关。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书中对米尔柏格的观点所作的批判,上面已作过详细的考察。这里主要就恩格斯所摘录的内容及其评语作一分析研究。

关于蒲鲁东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时对该书曾作过这样评价,认为“《战争与和平》可以说是蒲鲁东的许多幼稚著作中最幼稚的一部”,米尔柏格以这本书来证明蒲鲁东似乎领会了德国的唯物史观,而该书根本不是一部唯物主义著作。

战争的原因。蒲鲁东认为:“战争的永恒的、根本的原因是生活资料的匮乏,或者说得高雅一点,是经济平衡遭到破坏……归根到底是贫困”。我们必然吃饭,这是一个严峻的规律。我们必须明智地适应它。“但是,为我们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造物主,也有他自己的目的。”恩格斯指出,蒲鲁东只有求助于造物主才能表达对于战争的见解。蒲鲁东依据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对自然状态的想象来说明人类的历史。蒲鲁东说:“起初,当人类还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时候,自然界毫不费劲地就满足了人的需要。这是黄金时代,是丰饶而宁静的时代。”人在文明阶段通过劳动所得的正好等于维持他的肉体和精神文化所必需的。如果总的财富因劳动而增加了,那么人口会增长得更快。“生产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结果毫无所得。”<sup>①</sup> 在恩格斯看来,“蒲鲁东的经济观点是最粗糙的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sup>②</sup> 其实质是马尔萨斯主义的。

财富与人口的关系。根据蒲鲁东,“在一个社会里,要在保持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财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造成劳动群众的新的需求,而这只有通过发展智力和情趣,换言之,通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8页。

提高文化修养才是可能的,劳动群众拥有了高度文化修养就会自然而然地摆脱无产者状态。”恩格斯认为蒲鲁东的这一论述“与马尔萨斯是完全相反的。”蒲鲁东的另外两个条件是:“(2)在不断完善劳动和工业的组织的同时,要使劳动群众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时间;(3)为此目的,应当消灭寄生生活。这三个增加财富的条件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过渡到越来越平均地分配知识、服务和产品。这是最伟大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平衡规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恩格斯认为蒲鲁东只不过“是大胆地抛出一个论点,简单地加以肯定。”<sup>①</sup>对观点的证明是不充分的。在蒲鲁东那里,人们的生产和消费的严格彼此制约被称为贫乏(pauvreté)。贫乏意味着不富足,而由于富足可能促使工作者腐化,因此应让人经常感到贫苦的刺痛。人类的进步和提高完全在于正义和哲学。事实不过是向由眼显示理性概念的符号。人在世上的作用完全是精神的和道德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蒲鲁东“满篇光是慷慨陈词和简单论断,而不是论证和阐发思想。”<sup>②</sup>

关于财富和价值,蒲鲁东这样写道:“财富和价值一样,与其说是某种实在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关系,也就是生产与消费、供与求、劳动与资本、产品与工资、需求与活动等等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类的、典型的表现是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日。”<sup>③</sup>恩格斯责问道,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从何而来呢?当然,不可能来自经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是来自“原则”。因为根据蒲鲁东,“原则就是我们对本身的价值和本身的品德的认识,也就是这样一种感情,它能转化为对自己的同类和整个人类的尊重并成为正义的基础。但包含着作为自在之物的正义的那个原则,迄今为止实际上却恰恰是对正义的否定;我们允许自己和自己亲近的人的事情比允许别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的事情要多。夸大自己和滥用自己的长处,就会迫使我们去破坏经济分配规律(在奖励劳动方面和分配服务和产品方面平等的规律)。”恩格斯在摘录了这段之后指出:“由此可见,在这里‘经济分配规律’是永恒的规律。破坏,永恒正义的破坏!也不可能是别的,因为蒲鲁东总是把人本身作为出发点。”<sup>①</sup> 贫困是对经济规律的破坏。蒲鲁东这种破坏实质上为心理学上的事实,它既根源于我们的意向的理想主义,又根源于人们所固有的夸大自身重要性的情绪和对他人重要性的轻视。破坏意识构成蒲鲁东思想的重要特征。他曾用“破坏和建设”(Destruam et aedificabo)这一格言来表征自己著作的特征。”<sup>②</sup>

根据蒲鲁东,体现着经济规律遭到破坏的贫困也会吞食掉富人。由于对金钱和享受的贪得无厌,“贫困完全可以控制住他(富人),推动他从事冒险勾当、狂热的投机、赌博和诈骗,而最后让他可耻地破产,作为他贪婪无度、践踏正义和自然规律的惩罚。”而没有富人的这种无限的贪欲就不可能从贫困中引出战争。恩格斯指出,蒲鲁东不知羞耻地声称:

“在发生了像 1789 年、1799 年、1814 年、1830 年、1848 年和 1851 年这样一系列革命之后,社会弊病……对政府有直接影响这一事实看来勿需证明了。思想在这里无疑起了自己的作用;但是思想有什么样的作用?它表现了什么?——利益。决定召开三级会议的究竟是什么?是赤字。制宪会议确定立宪君主制,不是为了使自己免被强行征收高额税又是为了什么呢?僧侣公职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剥夺。8 月 4 日改革是怎么一回事?剥夺财产。可见,革命的首要原因是贫困。从罗马平民上圣山到拿破仑第三给他的未来的大臣富尔德的关于贸易自由的信为止,一切变化——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保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2 页。

②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 11—12 卷,纽约 1968 年版,第 605 页。

劳动群众免受他们的寄生者的剥削和保证最低收入。”<sup>①</sup>

恩格斯认为,蒲鲁东用上述这段话来“说明为什么在每次革命中都包含着革命本身”。蒲鲁东用“利益”、“赤字”、“剥夺”来说明“革命的首要原因是贫困”。蒲鲁东在上面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关于贸易自由的信”,是1860年1月15日在政府正式机关报《总汇通报》上发表的拿破仑第三致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1860年1月马克思曾根据这封信写了《法国的状况》一文。马克思从这篇文章开始,写了一系列论述欧洲各国经济状况的文章。他在该文中指出,路易一拿破仑皈依了自由贸易,并打算宣布新的和平纪元的到来。路易·波拿巴给法国工业开的药方,归根到底只是取消羊毛和棉花的关税。政治经济学史表明,取消农产品原料的关税乃是十八世纪重商主义者理论中的主要点。其实早在1852年,路易·波拿巴在波尔多发表的演说中就宣布过“帝国就是和平”。蒲鲁东在9年后写了《战争与和平》一书。

### 第三节 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

#### 1. 政治与蒲鲁东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

政治是蒲鲁东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蒲鲁东在这个问题上总的观点是放弃政治,主张联邦主义。这一思想对蒲鲁东主义者产生深刻的影响。1872年8月25日,马克思在《国际代表大会》一文中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放弃政治的主张。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写于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马克思把这篇文章献给代表大会,是为要了解将在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争论。在各个国家中的协会委员应是否应当组织成为政党这一问题上,代表会议决议的拥护者和根本不想同政治发生任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何关系的所谓弃权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针对巴枯宁分子在1872年8月1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4期上竭力把国际内部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德国共产党人的“独裁者的”野心，马克思严正指出：“二十多年前，所有欧洲国家的流亡者发表了由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起草的《宣言》，宣言用最新的社会学说来看待社会关系，并且拟定了这样的政治斗争策略：在资产阶级这个社会阶级还在同等级制度或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进行斗争的国家里，如果资产阶级坚决主张进步的话，工人始终应当支持资产阶级。”<sup>①</sup> 1863年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试图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策略。奥地利的一些委员认为放弃政治是滑稽可笑的。国际中的比利时人和一部分法国人是蒲鲁东及其所代表的联邦主义原则的拥护者。1868年，巴枯宁出席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向集合者鼓吹“人人平等”和“废除国家”。他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巴枯宁分子竭力主张不同政治发生任何关系。他们的口号是“无政府万岁！集体主义万岁！”对蒲鲁东主义者这种放弃政治的主张，马克思以德国代表的口气予以还击：

“赫普纳向无政府主义者吉约姆大声喊道：‘你们街垒逻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放弃政治会把人弄进警察局。’

另一个德国代表用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有人把我们德国人叫做权威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是的，我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认为必须使性格和智慧的权威在我们为之而奋斗的那个社会中也得到承认……（转向弃权论者）：‘你们想反对集权的专制，但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走上了属于已经过去的历史时期的联邦主义。你们想推翻组织得很巩固的反动派机构，并为此在自己的队伍中强制推行无政府主义！’（热烈的掌声）。‘对历史进程毫无认识的联邦主义者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曾为反动派的事业效劳……人们引证蒲鲁东，他于1863年曾经建议对帝国放弃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页。

政治。这种弃权主义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成立一个庸人和背叛者的政府。我决不是谴责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三月十八日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它是被挑动起来的。法国得以保存共和国应当归功于它。但它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它的联邦主义的性质。”<sup>①</sup>

与《国际代表大会》一文处于同一时期的是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一文。该文是马克思应《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请求在1872年12月底至1873年1月初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集而写的。恩格斯也为这本文集写了《论权威》一文。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马克思称蒲鲁东的学生为政治冷淡主义。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典型话题是：“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sup>②</sup> 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主张工人不应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应该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但是永恒原则必须保持洁白无瑕！”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会把这看作是资产阶级空谈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辱。

政治冷淡主义的观点源于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指出：“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同盟和政治发动。既然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5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4页。

否弃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些错误是不可饶恕的。”<sup>①</sup> 19世纪初,当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英国已经具有非常明显的性质时,布雷仍然反对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就是错误的了。政治冷淡主义者的老师蒲鲁东是如何看待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的呢?马克思说:

“现在来谈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政治冷淡主义者——引者注)的先知蒲鲁东。虽然这位老师有勇气坚决反对同他的救世理论——互助论相矛盾的任何经济运动(如同盟、罢工等),但他本人还是以自己的著作和亲身参加鼓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他的学生却不敢公开反对这一运动。还在1847年,当这位老师的主要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出版时,我就驳斥了他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诡辩。但是在1864年,当奥利维耶法(诚然,这个法律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了法国工人以联合的权利)通过以后,蒲鲁东又回过头来在他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叙述了自己的观点,而这本书是在他死后才问世的。”<sup>②</sup>

政治冷淡主义者的老师蒲鲁东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大谈永恒原则。蒲鲁东的第一条永恒原则是:“工资数额决定商品价格。”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早已驳倒了这个传统的错误。蒲鲁东应该“知道英国工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能以低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业品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商品,而英国的工资却相对地高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sup>③</sup> 蒲鲁东的第二条永恒原则是:“准许联合的法律是极端反法学和反经济学的,是同任何社会和秩序相矛盾的”,即它是“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相矛盾的。”马克思批驳道,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8页。

表明蒲鲁东具有沙文主义者的气息。事实是这样,在英国早在四十年前就颁布了一项同自助竞争的经济权利极其矛盾的法律。随着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竞争的发展,这个同一切社会和制度极其矛盾的法律,甚至连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本身也被迫把它当做是某种必要的东西加以采纳。蒲鲁东所言的这种众所周知的权利只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无知兄弟们所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蒲鲁东的第三条永恒原则是:“因此,有人借口使工人阶级摆脱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首先侮辱整整一个公民阶级,即老板、企业主、雇主和资产者的阶级;他们煽动工人民主派鄙视和仇恨这些不体面的中等阶级的代表;他们宁肯要商业战争和工业战争而不要合法反抗手段,宁肯要阶级斗争而不要国家警察。”这一原则表明蒲鲁东在阻碍工人阶级摆脱“低贱的社会地位”。根据马克思,蒲鲁东谴责使工人阶级组织成同雇主、企业主、资产者这类可敬的人相敌对的阶级的联盟,这类人当然和蒲鲁东一样,宁肯要国家警察而不要阶级斗争。“老师宣扬经济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竞争——我们的惟一保障。学生们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惟一保障。”<sup>①</sup>

## 2. 哲学与社会主义

马克思 1867 年在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作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其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其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批判的基础。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这又得益于他在整个世界史上实现了革命,创立了唯物史观。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现代科学的社会主义正是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39 页。

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马克思终结了空想社会主义史，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如果说《资本论》的出版，表明马克思从理论上取代蒲鲁东的话，那么 1871 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从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痛恨联合的蒲鲁东来说，公社“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到 1891 年，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占居统治地位。恩格斯在 1891 年为西班牙文《哲学的贫困》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被马克思的书彻底打垮了的蒲鲁东理论，毫无疑问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就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但它仍然是西欧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冒牌社会主义者从中取得麻痹工人的空洞词句的一个巨大武库。”<sup>①</sup> 在对待蒲鲁东理论的态度上，恩格斯在 1887 年所写的《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中说：“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sup>②</sup> 马克思在逝世的前两年，仍强调自己在 1865 年《论蒲鲁东》一文中对 1848 年革命以后蒲鲁东这位战士表现出的“伟大品格”，以及蒲鲁东的“政治家的才华”“作了应有的评价。”

我们在研究马克思和蒲鲁东的理论发展过程中，是从比较马克思和蒲鲁东的不同哲学视野切入的。他们都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前者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后者始终未摆脱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陷入无政府主义。应该说，马克思成功地把握了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蒲鲁东表现出的只是方法上的思辨。如果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任何历史的批判都具有当代的价值。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中所受到的启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3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75 页。

在于,从实践和理论方面多维度地思考社会主义与哲学的关联。具体地说,这一批判引发我们更为现实地、理性地去反思、把握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科学与价值的关涉。具体社会存在中的个人价值,折射着道德、伦理倾向。构成生产力系统要素的科学具有社会动力学的意义。科学的昌盛与价值的失落并非恒久的二律背反。从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看,二者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社会主义无科学是乌托邦主义,但若缺少价值目标追求则无法达到人类最终摆脱奴役、实现自身解放之目的。受非理性意识牵导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大多为理性、科学的反对者。然而,科学绝非虚无主义的事业。它须臾不能离开理性和逻辑。科学地、历史地分析社会存在不难发现,构成历史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实即社会生活中的“阿基米德点”。马克思主义新式的个人前提彻底否弃了蒲鲁东孤立的人的存在。科学社会主义正确地设立了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不但不会重入旧本体论的巢穴,而且恰恰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质相契合的。科学与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同一主要体现在客观规律与主体活动的同一性。这实际上告别了黑格尔式的理性浪漫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其意指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属于后者。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应有说的人道要求。当今某些“聪明”的理论家重提“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这表明有人仍想以“博爱”、“自由”、“类”再加上被炒得炙手可热的“弘扬主体性”之类的价值悬设为基础来建构社会主义。问题是,仅视社会主义为康德式的“应当”,凭借道德调试、改良、调和社会矛盾来实现社会和谐则未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之道,无法从根本上变革现存社会制度。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决定了具有革命意

识的社会变革主体——无产阶级以从根本上扬弃整个旧的社会制度为己任。社会生活中历史积淀的意识形态因素造成的巨大社会贯性并非任何预先设置的人道主义程序所能调控的。的确,科学社会主义不但不将人道主义打入冷宫、悬搁起来,而恰恰为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目标展示了极为诱人的客观可能性。这正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谈人道如谈虎而色变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各种社会主义可以赋予各自不同的人道主义含义,但绝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作为意识形态嬗变的人道主义动机的历史昭示人们,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还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之“被抛状态”(Geworfenheit),都体现出人的辩证法:自由与受奴役。科学社会主义为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个性全方位拓展提供了现实的机遇和选择。不是借助人道主义的理论词句,而要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历史环境,在经济生活中寻求改革人的生存状态、使人从无序的价值悬设转向有序的价值实现的办法。

再次,社会主义学说与哲学。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社会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空穴来风,它诞生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超越哲学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新哲学的面世。但哲学的论证并不具备充当社会主义直接基础的品格,因为唯物史观本身必须以客观的经济基础为依托。如果片面夸大、凸现哲学功能,将社会主义直接奠定于哲学基础之上,势必重蹈蒲鲁东主义之覆辙,哲学就会沦为纯粹的“社会批判理论”。社会主义也就变为空中楼阁。主张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思想者,其结果只能是从哲学中获取一种暂时的精神安慰。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到马克思所批判过的蒲鲁东的社会哲学水准。的确,哲学并非是历史的清道夫。它本身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无视历史、政治、经济的研究而直接论证社会主义的越俎代庖行为实为哲学之贫困和悲哀。紧贴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对原著的解读做到“信、达、雅”,准确定位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

的功能,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显得刻不容缓。科学地阐释、界定主体性、价值、自由之类人的问题有赖于此。把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尺度,培养造就一代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才不致清淡。摆脱了动物意义上的人,超越了经济人之后,视劳动为自由自觉第一需要的“超人”才能成为社会普遍之人。这才有可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作出理性而又现实的把握,从而使人的生存状态得到不断提升。



## 结 束 语

本文主要研究了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马克思与蒲鲁东的理论关系问题。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提出的和研究的问题,都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由于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导致其理论形态的科学与非科学之分。自 20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科学技术革命,社会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不同于上一世纪的巨大变化。人类在更大规模上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不断拓展交往界面。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理论关系呈现出何种发展状况,这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这一课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但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理论走向为何,尚未见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也只是提出这一问题。

蒲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对本世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并未接受一般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恋爱和未行正式仪式的婚姻;主张妇女的责职是做家务,抚养孩子。这表明他与女权运动背道而驰。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被巴古宁视为“我们所有人的大师。”蒲鲁东的信徒索雷尔(Sorel)在本世纪初写出了《关于暴力的反思》(*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一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索雷尔被看作是法国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代表,甚至被视为意大

利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sup>①</sup> 在无政府主义的左翼中,蒲鲁东仍然产生十分持久的影响。除巴古宁外,还有后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如佩特·克罗帕特金、库斯塔夫·兰德尔和鲁道夫·兰克,他们都受到蒲鲁东的影响。虽然克罗帕特金拒绝了蒲鲁东的平等交换概念,但其互助学说仍可视为对蒲鲁东内在正义概念的进一步发展。<sup>②</sup> 以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库斯塔夫·兰德尔,对蒲鲁东作了一些颇具挑战性的思考:卡尔·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们认为,他们称蒲鲁东为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社会主义者,这是他们对这位最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所作出的最为严厉的斥责。这样讲既是准确的又是公正的。因为蒲鲁东对国民和他的时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居支配地位的小农和工匠,他们怎么能够在不等待大资本主义取得长足进步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呢?<sup>③</sup> 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近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理论可追溯到蒲鲁东。蒲鲁东坚持,如果市场机制辅之以反独裁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话,那么市场机制肯定会产生有益的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主张保留市场和货币作为微观经济民主选择的最有效的调节手段;依赖竞争的市场机制来交流商品,坚持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先知”蒲鲁东曾预言,如果拒绝联邦制,等待着人类的将是“千年炼狱”。不管怎样,20世纪已出现了种种大协作力量的发展,而这些力量已对公众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产生了影响。

以上这些,是我们思考本世纪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理论走向时应该给以关注的问题。当然,还不仅仅是这些。在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信息科技时代之际,在人类面临人口过剩、资源匱

---

① 乔治·利希特海姆:《从马克思到黑格尔》,纽约1974年版,第93页。

② 佩特·克罗帕特金:《伦理学》,纽约1925年版,第269~279页。

③ 库斯塔夫·兰德尔:《保卫社会主义》,圣·路易斯1978年版,第61页。

乏、不平等、饥饿、贫困、战争等全球化问题的今天,更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现行的世界体制与工业化、高科技、都市化和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以便避免社会原子化和生态的失衡。这恐怕是无政府主义者凭借一种拒绝占统治地位的权力意识形态的设想所无能为力的。而这实在是科学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长期、复杂而艰巨的、责无旁贷的任务。

## 主要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0卷,人民出版社1956—1985年版。
- 2.马克思:《资本论》(法文修订版第1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 2)第4部分,第1—2卷,柏林1976—1981年版。
- 4.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 5.蒲鲁东:《论人类秩序的建立》,巴黎1927年版。
- 6.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 7.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2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 8.蒲鲁东:《社会问题的解决》,巴黎1868年版。
- 9.蒲鲁东:《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巴黎1929年版。
- 10.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伦敦1989年版。
- 11.蒲鲁东:《交易所投机者手册》,巴黎1857年版。
- 12.蒲鲁东:《联邦的原则》,多伦多1979年版。
- 13.《蒲鲁东通信集》第2卷,巴黎1860年版。
- 14.《蒲鲁东言论辑录》,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15.《蒲鲁东传略》,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8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16.孙伯鍤:《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7. 刘林元:《毛泽东哲学思想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18. 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 1983 年版。
19.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0. 侯惠勤:《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磨砺——马克思主义著作精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21.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早期文本》,纽约 1972 年版。
22. 汤姆·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23.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1980 年版。
24. 《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25.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26.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2 辑,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27. 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28. 霍夫曼:《革命的正义:比·约·蒲鲁东的社会政治理论》,厄巴纳 1972 年版。
29. 爱德华·海姆斯:《比·约·蒲鲁东:他的革命生涯、精神及其著作》,伦敦 1979 年版。
30. 乔治·伍德科克:《比·约·蒲鲁东》,伦敦 1956 年版。
31. 白克·斯梯芬·文森特:《比·约·蒲鲁东与法国共和社会主义的兴起》,牛津 1984 年版。
32. 亨利·德·卢柏西:《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研究》,纽约 1948 年版。
33.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说史》第 1—3 卷,三联书店 1958 年—1960 年版。

34.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辛垦书店 1930 年版。
35. A·B·乌罗耶娃:《不朽的著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36. 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 1 卷, 伦敦 1953 年版。
37.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 纽约 1968 年版。
38. 津岛阳子:《〈资本论〉中对蒲鲁东的批判》, 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 1 辑,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39. 维·彼·奥尔金:《论空想社会主义》,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40. 汤在新:《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41.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本论〉哲学与现时代》,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42. 陈岱孙:《经济学说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43. 赵崇龄:《外国经济思想通史》,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44. 吴易风:《空想社会主义》, 北京出版社 1980 年版。
45. 《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译文集》,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46.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47. 孙伯鍈、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 2 卷, 第 2—3 章, 北京出版社 1991 年版。
48. 孙伯鍈:《卢卡奇和马克思》,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后 记

我于1996年春投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伯鍈先生门下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几度寒暑,在孙先生的悉心指点下,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深感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要义,首要的是要穿透性地读解其经典文本,做到“信、达、雅”。这是从先生处学得的治学之根。

记得入学之初,孙先生在松林楼给我们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精读课时,曾言要重视对马克思与蒲鲁东的理论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后来,我围绕该课题做了十余万字的读书笔记。在孙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写出了《马克思和蒲鲁东》这篇博士论文。文成之际,回想恩师对论文付出的辛劳和汗水,多年来对我真诚的关爱和教诲,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在本文即将付梓之际,孙先生又欣然应允为之作序。孙先生对我如此厚爱,我当不断拼搏,以更加忘我的工作和学习来回报他的栽培。在此,我同时对张异宾、刘林元、侯惠勤、林德宏等教授的指导以及江苏教育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还要特别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杨建平编辑对出版本书的大力支持。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江苏省“333工程”科研基金的资助。

最后,请允许我把论文献给理解、支持我的爱妻蒋宜婷。

朱进东

1999年5月25日于石头城